

第十一屆軍事政治學 學術研討會

國際安全的衝突與契機：
政治作戰理論的應用與
創新

論文集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日期：109年09月29日

時間：上午0830-1210

地點：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皓東樓綜合教室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70號)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 第十一屆軍事政治學學術研討會

目錄

目錄.....	ii
壹、研討會目的.....	1
貳、研討會議程表.....	2
參、議事規則.....	3
肆、研討會論文	5
第一場次：當前國際社會安全的影響-區域安全競合.....	7
情緒與國際衝突：以中共參與韓戰為例.....	9
北韓軍事挑釁：習近平的政策與立場.....	31
戰略文化與共軍心戰.....	47
第二場次：亞太區域安全的發展與影響.....	73
軍訓教官制度轉型與全民國防教育實施成效之研究.....	75
中共文化統戰現況之研究：以習近平時期為例.....	89
我國軍人不在籍投票可行性之研究：電子投票的適用性及配套措施.....	105
伍、筆記欄.....	145

壹、研討會目的

軍事政治學於 20 世紀末開始作為一獨立學門，其應用歷史相當久遠，側重軍隊於國內暨國外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特別是協助政府部門處理各類的國家安全議題，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經營並開拓此一學術研究領域多年，已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與能量，對國家安全貢獻實屬良多。

本研討會旨在跨時代解析軍事政治學於當代網路時代之應用，俾利供政府政策建議。因此，研討會主題訂以「國際安全的衝突與契機：政治作戰理論整合的應用與創新」，範圍涵蓋：軍事與社會、文武關係、軍隊制度、軍備發展、政治作戰、國防戰略、國防經濟、人才培育及軍隊福利……等現代軍事社會科學領域，期盼藉由專家學者之專題發表，引導問題討論與引介實務應用，俾各界人士更進一步地了解政治作戰與軍隊、國家及政治之關係，有助軍隊與社會關係之良性發展。

貳、研討會議程表

時間：109年9月29日(星期二)

地點：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皓東樓綜合教室

時間	活動			
08:30 09:00	報到、領取資料			
09:00 09:10	開幕式：政戰學院院長（開幕致詞）			
時間	主題	發表人	與談人	主持人
09:10 10:30	當前國際社會安全的影響-區域安全競合	情緒與國際衝突：以中共參與韓戰為例 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盧俊昇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系研究所博士生徐舜浩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袁易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袁易
		北韓軍事挑釁：習近平的政策與立場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博士生張玲玲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李明	
		戰略文化與共軍心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系博士生林靖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系研究所博士生張書屏	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唐欣偉	
10:30 10:50	茶敘（皓東樓穿堂）			
10:50 12:10	亞太區域安全的發展與影響	軍訓教官制度轉型與全民國防教育實施成效之研究 台北市立松山家商教官室中校教官、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田立德	中華戰略學會會員李承禹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退休教授洪陸訓
		中共文化統戰現況之研究：以習近平時期為例 政戰學院政治系博士候選人林冠萍 政戰學院中軍所副教授李亞明 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蔡明朗少校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退休教授洪陸訓	
		我國軍人不在籍投票可行性之研究： 電子投票的適用性及配套措施 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盧怡君 陸軍官校資訊系副教授程凱 陸軍官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憶綾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暨行政學系教授羅至美	
12:10	賦歸			

參、議事規則

一、研討會由各場次主持人引言及主持。各場次的時間分配如後：

(一) 研討會第一場次：09：10~10：30（80 分鐘）

主持人運用：5 分鐘

論文發表：45 分鐘（3 人，每人各 15 分鐘）

評論：18 分鐘（3 人，每人各 6 分鐘）

論文發表人回應：12 分鐘

(二) 研討會第二場次：10：50~12：10（80 分鐘）

主持人運用：5 分鐘

論文發表：45 分鐘（3 人，每人各 15 分鐘）

評論：18 分鐘（3 人，每人各 6 分鐘）

論文發表人回應：12 分鐘

二、時間控制由議事工作人員以鈴聲作提示：

(一) 發表及評論部分：限時結束前 1 分鐘，按鈴一響；時間到時，按鈴兩響，屆時請停止發言。

(二) 自由討論部分：限時結束前 30 秒鐘，按鈴一響；時間到時，按鈴兩響，屆時請停止發言，以利大會進行。

三、為避免干擾會議進行，請全體來賓將行動電話、呼叫器保持關機、靜音或震動模式。

肆、研討會論文

第一場次

主題：「當前國際社會安全的影響-區域安全競合」

時間：09：10 - 10：30

主持人：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袁易

論文發表：

1. 情緒與國際衝突：以中共參與韓戰為例
(盧俊昇、徐舜浩)
2. 北韓軍事挑釁：習近平的政策與立場
(張玲玲)
3. 戰略文化與共軍心戰
(林靖、張書屏)

情緒與國際衝突：以中共參與韓戰為例

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盧俊昇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系研究所博士生 徐舜浩

摘要

2000年起國際關係開始對情緒研究有顯著的興趣，許多學者開始重視情緒在國際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開始反思過往對於「理性與情緒的二分法與認為情緒是影響理性判斷的干擾因素」等觀點，但隨著腦神經科學的不斷發展，許多對於理性與情緒的觀念也開始慢慢轉變，這樣的觀念也開始影響國際關係，學者開始重新審視情緒的重要性，也為國際關係研究帶來一波「情緒轉向」。本文主要運用托德·霍爾(Todd H. Hall)的情感動力學與情緒話語分析，透過情緒描述話語、挑釁情緒話語與啟發性情緒話語，這三種情緒話語的分析來捕抓情緒影響決策的證據，並以韓戰為個案，分析中共高層決策過程中受到情緒的牽引與操控基層民眾的心理情緒以發起和支援抗美援朝運動，達成其預想的戰略目標。

關鍵詞：情緒、情緒轉向、韓戰、理性決策

壹、前言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情緒在世界政治的許多方面都很重要，但其作用令人訝異地卻很少受到重視，例如：恐懼是現實主義理論理解安全困境的關鍵基礎，卻很少有國際關係學者明確地指出這種情緒的作用，更不用說系統地對其進行研究，但這種情況在二十一世紀初發生重大的轉變。首先，已有國際關係學者關注到情緒的重要性，例如：喬納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和娜塔·克勞芙德(Neta Crawford)，Mercer(1996, 1)在一場學術會議中保留其未發表的論文〈國際政治中的情感途徑〉(“Approaching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rawford(2000, 116-136)在《國際安全》發表了〈世界政治的激情—情緒和情緒關係的觀點〉(“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一文強化了這樣的觀點，當時有幾位國際關係學者也開始爭論應該以不同的方式分析情緒的存在及其與國際政治的關係(Marcus 2000; Bleiker 2001; Linklater 2004; McDermott 2004; Lebow 2005)，但由於長期以來，情感被否定了其研究的正當性地位，所以在 21 世紀初期的學術工作主要在證明情緒研究是值得投入的，因為國際關係的實務問題與現有的國際關係理論一直隱含地依賴情緒 (Ross 2006, 197-222)，這一論點在認識論和理論上後來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Bially Mattern 2011, 63-86; Bleiker & Hutchison 2008, 115-135; Mercer 2010, 1-31; Sasley 2011, 452-476)。

慢慢地，一些學科最資深的學者也開始承認情緒的政治意義，例如：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在檢視認知和誤解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承認，他早期忽視情感是一個「重大錯誤」(Balzacq & Jervis 2004, 564-565)；另一位美國著名學者理查德·奈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認識到，一個「自主且理性的個人」的概念是「啟蒙運動的虛構」，他認為情緒對世界政治來說是「絕對重要的」(Lebow 2005, 283)；英國資深學者克里斯多福·希爾(Christopher Hill)承認「感受和直覺、在決策中的重要作用(Hill 2003, 116)，他們開始為國際政治中的情感提供了越來越複雜的理論，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加上在過去二十年中，由於國際關係學者的不斷努力，關於該主題的出版物持續不斷在增加，表明這一研究領域目前正在產生很大的共鳴。

隨著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對政治心理學感到興趣，尤其是在 9/11 恐怖襲擊事件和全球反恐戰爭等實際問題出現之後，引發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關於理性主義對戰爭解釋局限性的理論辯論 (Lake 2010, 7-52; Debs and Monteiro 2014, 1-31)；英國脫歐以及全球對自由貿易和經濟一體化的強烈反對，指出了公眾輿論在外交政策問題上的重要性，並說明為什麼公眾偏好與傳統理性選擇的經濟自利模式相關性如此微弱的問題 (Mansfield and Mutz 2009, 425-457; Rho and Tomz 2017, 85-108)；另外，在國際關係和政治科學中微觀研究途徑更廣泛地的興起，與上述的重大國際事件有關，因為大系統理論只能告訴我們「少數重要的事情」(Waltz 1986, 322-345)，其重要性已被微觀層次現象的關注所取代，部分是認識到宏觀層次的理論都依賴於微觀層次的假設 (Kertzer 2017, 81-97)，

由於微觀基礎方法依賴於社會科學的機制觀點(郭忠華、潘華凌, 2009: 4-5), 許多對因果機制感興趣的國際關係學者將心理過程視為更廣泛的因果鏈的一部分, 基於上述的原因, 讓國際關係學者更傾向於關注政治心理學。

以往對於戰爭的研究多半是以理性主義作為主要的理論分析來源, 儘管理性選擇理論可以適用於任何政治情境中, 尤其在把某些因素是否具有潛在因果關係的判斷上, 它透過簡化個體的能力與動機, 可以提出一個初步性的解釋, 或者說理性選擇理論較適合對某一情況類別進行一般性的初步分析,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理性選擇可以視為其他政治科學取向一種有益的補充, 但也因其理論假設, 人是理性的經濟人, 追求利益與效用的最大化, 因此也有其理論解釋的侷限性, 例如其解釋邏輯較偏向結構甚於個體的能動性, 忽視了微觀層面中, 個人的觀念與思想的作用, 因此本文主要透過韓戰的研究來檢視國際關係政治心理學途徑有何效用? 情緒於決策過程中是否能夠產生影響?

其次, 傳統主流的社會科學理論假定, 決策本質上是一個理性的過程, 但這樣的「理性假設」(assumption of rationality) 與現實中的決策過程有著很大的差異(胡懷國、馮科, 2016: 6-8), 國際關係對於各種決策模型與方法的開發, 拓展了我們對決策過程的理解, 這些模型讓我們意識到決策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個人的、政治的、制度的、文化的和情感的各種考量都可以對決策分析提供一個滿意的解釋(趙景芳, 2018: 120), 但也因為國際關係中對於理性的追求, 因此情感大多被視為「與理性的偏離」(Bleiker & Hutchison 2008, 116), 阻礙了早期國際關係學者對於情緒研究的重視, 而近 20 年來在國際關係學界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認識到情緒的重要性, 並試圖從理論上來說明情緒在國際關係上的作用, 並探索此一研究途徑可能開展的研究議程 (Bleiker & Hutchinson 2008, 115-135; Bleiker & Hutchinson 2014, 490-491; 郝拓德、安德魯羅斯, 2011: 40-56)。本文主要目的就是要呼應此一研究途徑, 透過不同於理性主義的視角來探討情緒在國際衝突中扮演的角色, 並採用韓戰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 並以國際關係政治心理學作為主要的理論依據, 借鑑國際關係政治心理學中認知心理學派對於情緒研究的基礎, 透過關注民眾與決策者的認知與情緒對政治、社會現象之間的雙向互動過程, 來研究中共參與韓戰的過程中, 情緒如何影響認知, 進而對戰爭的認知產生不同的影響。

貳、國際關係政治心理學的情緒研究

許多政治現象包含了情緒和感受, 而非單純的只是「冷」信息加工的「冷認知」[冷認知一詞相對於熱認知, 為了用以區別兩者的差異, 中國大陸文獻多將認知加工過程視為冷認知, 認為理性認知與情感是可以完全區分開來, 在理性認知過程中並不會受到情緒的影響; 而目前國際關係情緒研究的熱認知, 認為情緒可以影響甚至指導理性認知做出決定, 理性認知是與情感結合在一起的, 筆者在本文亦採用這樣的區別原則。]; 事實上, 所有政治概念都充滿著情感, 要嘛是積極的要嘛是消極的, 這就是一些心理學家所指的「熱認知」[熱認知這一詞語由羅伯特·埃布爾森(Robert Abelson)在 1960 年代初期介紹, 並且在關於情感的文

獻中已是司空見慣。參見 Robert Abelson, 1963. “Computer Simulation of ‘Hot’ Cognitions,” in Silvan Tomkins and Samuel Messick(eds.), *Computer Simulation of Personality: Frontier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NY: Wiley.]. 政治刺激經常引發強烈的情緒和感情，諸如喜歡、討厭、幸福、沮喪、憤怒、內疚、感激、厭惡、復仇、喜悅、不安全、恐懼、焦慮等等。本文首先定義各種情感詞彙的定義，避免造成辭意上的混淆；其次，國際關係最新一波政治心理學研究在很多面向與前不同，在過去 20 年中經歷了特別重要的變化，或代表了新生的發展，而主要集中在六個實質性的方向上，這些取向能使我們理解目前國際關係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主流趨勢分布；最後，由於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體多半為國家，如何將情感從個人層面的感受提升到國家或集體情感的體驗，郝拓德與安德魯·羅斯認為將情感動力學整合到國際關係研究中現有的個人行為體概念中，提出有關潛在集體層面的情感動力和政治策略以解決集體情感體驗的方法論問題。

一、情緒的定義

英語辭意上用來表示情感的詞彙有很多，有時會造成研究者對使用概念的混淆，因此需要定義這些用詞的精準概念，國際關係學者提出三個主要常用的術語—情感(affect)、情緒(emotion)和感受(feeling)—這些術語的定義是有爭議甚至是模糊的，所以在此需要來定義上述這三種常見的情感詞彙，情感(affect)指的是非反射性身體感覺，其位於意識之前和之外(Hutchison & Bleiker 2014, 490-491; Ross 2006, 197-222)；其次，情緒(emotion)被稱為「一些瀰漫性生理變化的主觀體驗」(Mercer 2014, 516)，並且具有「互為主體性和文化成分」(Crawford 2000, 125)；最後，感受(feeling)可以被定義為「有意識地意識到一個人正在經歷一種情感」(Mercer 2014, 516)，雖然在內部經歷過，但它們所附帶的意義在於認知和文化建構(Crawford 2000, 125)。

從這些簡要定義中可以明顯看出這些概念是如何密切相關的，部分學者選擇「將情緒(emotion)和感受(feeling)視為同義詞」(Mercer 2014, 516)，但其他學者則認為「只有感受(feelings)才能完全可用於意識」，而更偏好使用「情感」(affect)這個術語，來表達「體內引導的情緒(emotion)」(Ross 2006, 216)。因此，「情感(affect)和情緒(emotion)」以及「情緒(emotion)和感受(feeling)」之間的分界線似乎相當寬鬆的，在早期作品中，Crawford 將情緒(emotion)以更加綜合的方式定義為「個體將他人描述為感情的內在狀態，這些情緒可能與生物、認知和行為狀態以及變化相關聯」，從而考慮到所有三種感受(feeling)面向(Crawford 2000, 125)；Hutchison & Bleikmer 也以類似的方式強調「情感(affect)與情緒(emotion)可以被視為內在聯繫，因為情感狀態(affective states)是潛意識因素，可以構成並影響對社會世界更有意識的情感評價」(Hutchison & Bleiker 2014, 502)。儘管命名這些現象的概念用途多種多樣，但使用「情緒」(emotion)作為總稱，部分原因是「情緒研究(emotion)」已成為指定該領域的最常用術語，但也因為可以將情感現象可理解為一種—情感(affect)—情緒(emotion)—感受(feeling)的連續體。

二、國際關係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主流趨勢

國際關係在過去 20 年有著戲劇性的轉變，Joshua D. Kertzer & Dustin Tingley 分析了《國際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ISQ)從 2013 年起到 2017 年第一週止，這 4 年來所有稿件提交的分類，來顯示國際關係中政治心理學的研究狀況與分類情形，作為國際研究協會的旗艦期刊，ISQ 代表著 ISA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成員所開展的國際關係學者們所研究題材的多樣性與廣度，透過整個 ISQ 提交的每個分類的總體流行程度進行比較，可以系統地得到描述國際關係中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主流分布，並發現了 6 個主要的實質性變化，(一)從冷認知到熱認知的轉變，傳統上，IR 中的政治心理學家嚴重受到認知革命的影響，認知革命強調信息處理的研究 (Miller 2003, 141-144)，但是國際關係的心理學方法越來越關注情緒這個主題，無論是在種族衝突研究中 (Petersen 2002)，核擴散決策 (Hymans 2006)，還是更普遍的討價還價和外交領域 (Hall & Ross 2015, 847-879; Renshon et al. 2017, S189-S218)；(二)外交政策有關輿論研究方面，與傳統美國政治中的心理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目前主要集中於群眾的政治行為，而不是政治菁英 (Kinder 1998, 778-867)，但從學科發展史來看，國際關係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精英而不是群眾 (Jervis, Lebow and Stein 1985; Herrmann 1985)；(三)縮小菁英與群眾研究的差距，在國際關係政治心理學中，政治菁英與群眾政治行為的研究有著明顯落差，主要考量到政治菁英有其滿檔的政治行程，其落差自然反應在對這兩種群體的研究方法上。為克服上述原因，逐漸發展出一種國際關係中的精英實驗替代方式 (Mintz 2004, 91-104; LeVeck et al. 2014, 18536-18541; Renshon 2015, 659-695; Renshon et al. 2016)，它允許國際關係學者用研究群眾政治行為的工具來研究政治菁英行為；(四)翻轉個人分析層次 (The first image reversed)，在過去十年中，國際關係的心理學途徑的一個重要發展是「翻轉個人分析層次」的研究體系，其不研究個人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反倒著重在國際關係對個人的影響，對政治心理學而言，「翻轉個人分析層次」是將次領域的分析焦點，從微觀-微觀因果關係轉變為宏觀-微觀因果關係，這不僅產生更多較好的因果關係地解釋，且不用提供明確的理論原因，其強調了情境特徵對心理機制研究的重要性 (Tingley 2017, S165-S188)；(五)遺傳、生物和進化途徑的研究進展，也許是在過去二十年中，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中最顯著的差異變化。例如，Rosen (2005) 利用進化生物學的研究來探索我們的生物遺傳如何與環境特徵相互作用 (互動) 來塑造衝突行為和決策；McDermott (2009 et al., 2118-2123)，利用行為遺傳學來研究侵略的起源；Holmes (2013, 829-861) 利用社會神經科學來解釋面對面外交如何減少對他人意圖的不確定性；Johnson and Toft (2013, 7-38) 表明，如果不了解領土的進化起源，我們無法理解領土爭端在多大程度上經常被視為不可分割的問題；Tingley (2014, 35-55) 研究了臉部特徵如何影響在爭論各方之間建立信任的調解員的選擇。

上述的這些文獻涉及的研究層面廣大，但有四個重點：首先，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這場「神經生物學革命」(McDermott & Hatemi 2014, 92-123) 大部分發生在政治科學之外。

其次，在這些傳統的研究中不僅提供新的理論框架，而且提供新的方法論研究途徑，例如，Renshon 等人（2017, S189-S218），將皮膚電導測量引入討價還價的賽局，以顯示參與者體驗討價還價能力變化的生理機制；第三，遺傳、生物和進化途徑研究通常結合和顛覆（顛倒）分析層次，類似於上面討論的「翻轉個人分析層次」學術研究。例如，社會神經科學明確關注神經水平和社會環境如何相互作用（Berntson & Cacioppo 2004, 107-120; Holmes 2018）；最後，進化政治心理學研究途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框架，促進一種解釋性的心理學，而不僅僅是一種描述性的經驗規律分類，進化心理學不是由各種各樣的啟發式和偏見組成，而是其中許多的偏見實際上都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Petersen 2015, 45-78），例如，進化心理學不是將前景理論視為偏離理性模型的文獻，而是試圖解釋它們的起源（McDermott et al. 2008, 335-350）。

三、集體的情緒

通常只有個人才能夠體驗與感受到情緒的變化，但在國際關係研究中，通常研究主體多半為國家，如何將研究個體的情緒感受轉化為集體的情緒感受，不同的國際關係學者有不同的觀點，本文主要引用社會心理學與郝拓德的情感動力學來處理這個難題。

（一）個人的情感體驗

郝拓德與安德魯羅斯將個人層面的情感體驗分為：高強度的情感體驗與低強度的情感體驗，高強度的情感反應（使我們的意識充斥著感覺）對於其根據情況因素暫時劫持我們的思想、慾望、注意力和精力等能力具有重要意義，正如 Mercer 所言，強烈的情感反應（驚訝地放大）在改變美國的意圖和計劃，在朝鮮戰爭爆發時保護韓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Mercer 2013, 221 - 252）並產生溢出效果，儘管在最初的來源和隨後的目標之間缺乏認知聯繫，但仍會發生溢出，使它具有形成偏好，感知和行動的潛力。然並非所有的情感過程總是那麼明顯容易察覺，即使感覺和情感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反應，它們還是會在我們的判斷和行為中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低強度的情感體驗，即使是最簡單的決策我們也很難下決心，例如，一個經常引用的案例，該案例是一個叫埃利奧特（Elliot）的人，他的大腦受到損害，其感覺能力降低了，檢查他的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解釋說：「埃利奧特的推理阻止他將不同的價值觀賦予不同的選擇，並使他的決策前景無可救藥。」（Damasio 1994, 51），沒有情感，埃利奧特就沒有選擇或行動的動力，我們的感受是了解我們想要什麼以及我們想要多少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缺乏情感體驗，我們首先失去了確定想要的基礎（Mercer 2005, 77-106）。憤怒、恐懼和其他高強度反應可能會顛覆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但如果沒有以較低強度運行的情感動力，我們將很難過生活，低強度的情感反應通過將我們的觀念，態度和思想灌輸給主觀性思維來指導我們（Ortony., et al 1988），思考一下情緒對判斷的影響，人們要做出判斷，不僅要依靠外部信息，還要依靠主觀感覺上的反應，如「直覺」或「膽量」。霍爾和雅西·米洛認為，低強度的情感反應會改變領導者的真誠

判斷，在某些情況下，其影響要大於確切的證據(Hall & Yarhi-Milo 2012, 560-573)。

(二)個人情感的來源

Hall & Ross 認為個人情感的來源主要有三個，關注點、性格與鏡像。首先，當行為者意識到情境因素涉及重大關注時，可能會產生情感反應，我們所關注的——即目的、價值和目標，這些在被有意義地牽涉到情境中時會引發情緒；其次，性格本身並不是一種感覺狀態，而是一種特定的內在敏感性。正如尼柯·弗里達 (Nico H. Frijda) 所說：「被狗嚇到並害怕狗不是同一回事，這種區別對應於發生狀態（情感反應）與傾向或性格之間的區別」(Frijda 2000, 64)；最後，情感刺激的另一個來源是鏡像，情感狀態遠非純粹的內在狀態，而是以相對應的表現形式呈現外在表現形式，例如臉紅的臉或憤怒的眉頭，這些顯示反過來會影響那些接觸它們的人的情感體驗，當人們觀察他人的情緒表達時，他們的大腦會發起與所觀察到的情緒相關的神經和身體反應，透過這些鏡像過程，我們不僅可以接收他人的情感，而且可以依次模仿和傳遞它們(Ross 2014)。關注點、性情和鏡像並非情感反應的唯一來源，但這三個方面對於國際關係學者來說是最感興趣的，因為它們構成了關鍵的聯繫點，在這些聯繫點中，可觀察到的情境變量可以觸發情感體驗(Hall & Ross 2015, 856)。

(三)情感的集體動力

如上述所述，情緒大部分為個人所感受與體驗，儘管部分學者強調，國家是由具有影響力的個人組成的：正如雅克·海曼斯 (Jacques Hymans) 所說，「國家不是龐大的計算機器，他們是一群情緒化的人組成的等級組織」(Hymans 2010, 462)，即使這樣的觀點在嘗試擴大到集體層次時仍然必須克服個人的情感體驗如何具有集體層次？郝拓德和羅斯提出三種情感的集體動力，即上對下、水平橫向與下對上的集體情感動力。首先，通過分享關鍵的性格或關注點，個人可以自下而上地經歷情感反應，當與先前存在的群體身份有關的擔憂成為共同的情感反應的基礎時，這種過程就啟動了，Sasley 即是運用類似這種觀念的群體間情感理論，假設「該群體成為個人的一部分，然後該人不是作為那個個體而是作為一個群體的成員而做出反應，並且該群體的各個成員都匯聚在相同的情感上，因此我們可以說出一種「單一的」原型情感」(Sasley 2011, 454)。

儘管這種解決方案為個人之間的自然情感共鳴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但它忽略了橫向的情感傳播機制。由於共同的性格或憂慮，個體可能不僅分享相似的情感體驗，他們本身的情感體驗也可能會傳染(Stein 2013, 208)。由於人類既可以向外表達情感反應，又可以在內部反映他人的情感反應，所以我們可以通過社交互動分享情感經驗，不僅是身體表情，而且還有符號顯示，情感話語和選定的圖像，都可以促進情感狀態的傳遞。

除此之外，社會力量也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協調，這些過程可以通過社會期望和規範發生影響，自上而下的協調將行為者包容在賦予某些情感表達特權的話語和實踐中，也就是情

感的社會話語，充滿情感的公共表達和敘事方式可以增強特定的情感反應，同時勸阻其他人或將其政治化為屬於個人領域。例如，德國人對1914年戰爭的熱情比以前想像的要廣泛得多，其盛行的「神話」是由保守的民族主義新聞界的代表產生的(Verhey 2000)，這樣的表述既鼓勵了人們進一步表現出的熱情，又把親人被送往戰爭的恐懼和悲傷視為私人的，缺乏政治意義的旁觀者。

這三個途徑（自下而上，水平和自上而下）構成了集體情感體驗的可能來源，這種經歷需要在個體之間共享特殊的情感反應，並帶來所有伴隨的後果，引起兩個更具體的，在政治上很重要的現象：情感波動和新出現的集體團結。首先，集體情感體驗的途徑不是相互排斥的，並且在達成一致時，它們可以產生放大的反饋效應以產生情感波動，它是一種集體的、高強度的情感反應，能夠超越先前存在的目標和關注點，但是，這種高強度的情感反應很難隨時間持續下去，因此在沒有進一步刺激的情況下會消退，所以這些浪潮通常會達到頂峰（創造政治機會的窗口），然後消散。但是政治氣氛不會完全恢復到最初的水平，因為這波浪潮會使人的性格和擔憂改變。其次，集體情感體驗可能會激發新出現的集體團結，因為由下而上或水平傳播過程並非由預先存在的事物直接塑造，因此可能會發生共享的情感體驗，可以將他們與超越國家效忠的社會抗議運動或媒體傳播中的共同參與者聯繫起來，雖然我們不太可能找到成員均具有完全相同的情感反應模式的既存社會群體，但我們很可能會發現新興的情感表達群體暫時會引起政治上的團結。

從上面的文獻描述，我們知道之所以存在集體情感體驗，是因為個人和社會相互作用以創建共享表達和共鳴的途徑（由下而上、水平與由上而下），所有的這些集體現象都可以塑造政治角色所處的環境，為他們的行為提供機會、約束和壓力，我們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觀察集體情感的表達。

參、情緒與話語研究

介紹完如何觀察集體情緒後，那麼我們該如何研究情緒呢？托德·霍爾(Todd H. Hall)認為話語可以透過很多方式將它視為情緒，他提出了「情感動力」(affective dynamics)的概念，「其範圍包含體現心理過程的方式與影響人類思想和行為的感受層面」，而情緒是「社會上認可的，有正負效價反應的結構化情節，例如喜樂或恐懼……是情感反應模式化的子類別」(Hall & Ross 2015, 848)。

在這樣的情感動力與情緒定義下，Hall 提出了三種具體方法來論述情緒話語的作用，第一種以話語作為情緒的陳述、提供證據或洞察行為者的情緒狀態；第二種研究了情緒挑釁話語(Emotionally Provocative Discourse)的可能性，這種話語透過使用特定的符號、主題和敘述來引起聽眾的情緒反應；第三種是話語作為情緒的喚起者，對隨之而來的社會上甚至是政治上事件能有效運用情緒的能力。當然在實際面上，話語很少能夠完全地被劃分進這些類別當中，但每種話語分析都可以成為「情緒」的獨特方式。

一、情緒陳述話語

話語可以通過使用情緒術語來直接傳達個人的內部狀態（例如：「我很高興」或「我很生氣」）來表示情緒和情感動力，它也可以透過帶有情緒含義的術語或片語間接地表示情緒和情感，例如：個人受到侮辱而嗆聲「我要殺了你」，或者在失去親人後，「想要一個人靜靜」——然而，無論哪種情況，將話語視為情緒陳述都必須明確地將情感和情緒體驗的相關可觀察性予以理論化，也就是說，如果研究者能夠進入研究對象的內在感受狀態，就能夠識別它們並以一種直率的方式跟他們交流，那麼直接表達情緒就可以作為指示；而間接話語指標則還需要另一種情緒反應理論：例如，在受到侮辱或在失去重要的事物後，那種憤怒與落寞退縮情緒反應，它們可以分別對應於特定的、定型的情緒反應，例如憤怒或悲傷，但如果要在話語中發現這些情緒，無論是進行仔細的解釋性閱讀，還是簡單地對這些情緒單字編碼進行計數，我們都需要一種清晰的理論來說明哪些話語結構可以提供情緒在起作用的證據，此類主張就需要提供相關的歷史和社會背景為依據，才能更有效的支撐這些論點。

但是，能感受到情緒是一回事，如何表達則是另一回事（Hall 2015），因為人們可能會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感受，但也可能出於社會期望、表達某種形象甚至達到戰略或商業目的而宣稱自己的情感（Hall 2015；Koschut 2014），因此不僅必須關注話語內容，還必須關注是誰、何時、何地以及為什麼，例如：如果我們認為是憤怒之類的情緒引起了大規模社會或政治騷動，那麼在新聞爆發後，各大社群網路平台應該會出現大量的發文與討論，這暗示著某種情感可能是真實的，因為網路評論是匿名的，而且是依個人意願的發表自己的看法與意見，因此我們才有理由判定這涉及真實情緒。

二、情緒挑釁話語(Emotionally Provocative Discourse)

各種社會或政治事件的敘述、故事和描述，通常也會引起了受眾的情緒，例如在論述中納入一些情緒符號，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種族歧視、9/11、納粹德國…等等，這些具有挑釁性的故事特別容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因為這些挑釁的話語通常帶有強烈的情緒反應，或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文化背景，相對於某些族群或社群更容易激發他們的情緒，因此更容易捕捉到情緒影響的證據。

三、情緒啟發性話語

當情緒有效運用在隨之而來的社會甚至政治事件時，話語就具有情緒啟發性，這些情緒啟發性話語會引用情感以吸引、利用和控制它們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其目的不是要在話語中尋找情緒的證據或原因，而是要探究話語對象的情緒目的、含義和後果。

國際關係中的參與者通常是國家——是制度的參與者（Hall 2015）——它沒有物體軀體，所以不會「感受」到情緒，既然如此，那麼該如何捕捉群體的真實體驗呢？總體而言，群體的真實情感體驗過於複雜、短暫和混亂，以至於無法用單一的情緒標籤來充分表達，只能透過這些集體情緒背後的政治目的或是政治訴求來掌握，例如，增強統治正當性、吸引支持或影響和懲戒他人的行為。

肆、中共參與韓戰的情緒話語分析

一、情緒陳述性話語

中共在韓戰爆發後到抗美援朝前，中共社會各階層大概可以區分成三種心態類型，一是畏戰求安的心理；二是冷漠無所謂的心理；三是恐美、崇美與親美心理(侯松濤，2005：20-21)。

(一)畏戰求安心理

中共在建政後，大部分的民眾對於新生活充滿著憧憬，在經歷了8年的抗日戰爭與接續而來的國共內戰，多數民眾早已厭倦戰爭所帶來的苦難與動盪，強烈盼望能過著和平穩定的生活，因此可以想像在韓戰爆發之後，民眾多半展現出「厭戰」、「畏戰」、「反戰」的心態，對於解放軍來說也是如此，例如根據解放軍上將《楊得志回憶錄》裡面也有提到，「革命成功了」、「可以歇一口氣了」(楊得志，1993：490-491)。因此，在得知韓戰爆發後，多數的解放軍與共產黨幹部，多半都是恐懼、憂慮的情緒，希望這場戰爭北朝鮮人民軍能夠盡快獲勝，不要牽扯到中國來，但在仁川登陸後，解放軍與共產黨幹部的心情也就更加焦慮與不安起來，甚至當時謠言四起，如陝西許多地區謠傳「要變天了，國民黨要回來了」、蘇南一些地區謠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解放軍敗下來了，眼前起勁的人，將來要先殺頭。」、無錫、蘇州等地謠傳「世界大戰已經爆發，蔣介石要來過年，共產黨守不住，快逃阿。」、「你是替共產黨做事的，美國和國民黨來了就要殺頭，家屬也要殺」(侯松濤，2008：69)，在當時訊息傳播管道較少，對訊息的判斷能力較低，所以很多謠言就會加深一般民眾的恐慌、不安，以致於部分離朝鮮半島較近的東北地區民眾開始搬家逃跑，一些工人也藉故要求返回南部故鄉，也有一些青年工人逃避不上工，部分學校中學生申請退學，因為怕被抓去當兵。

(二)冷漠無所謂的心理

韓戰爆發後，中共多次向美國表達抗議，尤其是居住在東北地區鄰近朝鮮半島邊境遭受美軍到轟炸的民眾，也對美軍的行為非常憤慨。但上述的情形也僅是比較少數的個案，大多數民眾對於韓戰爆發並沒有強烈的感受，因為戰爭並不是發生在自己的國家內，不少民眾認為「韓戰爆發關我什麼事」、「美國打朝鮮，只要我們不去惹他，他也不要來轟炸我們」，也有不少人認為反正戰事離我們還很遠，就連一般對時事比較敏感的學生，也都沒有太多反應，甚至連一些共青團員對美軍已經登陸仁川都不知情，更不用說一般農村的農民了，他們只知道忙於農務根本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顯見當時大多數基層民眾的心態多半是冷漠無所謂的，因為當時百業待舉，財政與經濟狀況困難，各項民生物資短缺，土地改革剛開始推行，台灣、西藏、新疆等地區都尚未完成解放，政權尚未穩固，社會秩序也還不穩定，對大多數民眾來說只想要圖個溫飽而已，並不會想去關注離

自己還很遙遠的韓戰。

(三)恐美、崇美和親美心態

會有恐美、崇美與親美心態的群眾，多半是過去曾經接觸過美國的一些人士，例如一些基督教信徒、教會學校的師生、資本家、傳教士、外交官等等，這些人對於美國有較清楚的認知，知道美國的整體政治、經濟與國防實力，這些人知道美國的經濟實力強大、武器精良，而解放軍多是一些土包子，武器也都是當時美軍援助國民黨或是抗日戰爭期間日本關東軍所留下來的一些舊式武器，而美國當時一個軍就有火炮1500門以上，而中共解放軍才36門(龐松，2003：65)，當時部隊中一些官兵也覺得敵我裝備強弱懸殊，對美軍的飛機、坦克根本就束手無策，因此認為與美軍作戰根本就是一種殘酷的犧牲行為，在心理上形成一種很大的壓力與負擔，認為「鴨綠江是鬼門關，有去無回」(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總結編委會，1985：22)，何況當時美國還擁有核子彈，中共根本沒有辦法跟美國對抗，當他們知道中共要以志願軍的形式援助北朝鮮，開啟抗美援朝運動時，多半都是悲傷、沮喪的情緒，認為這些的行為根本就是以卵擊石、引火自焚的愚蠢行為。

可見當時韓戰爆發到抗美援朝前，民眾的情緒性陳述多半都是比較冷漠、事不關己或是比較恐懼與親近美國的心理與情緒，畢竟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多數民眾與解放軍多已飽經戰火的洗禮，能夠不要面對戰爭當然是最好的，加上韓戰的對手是美國，是經濟與武力都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而中共是剛新建立起來的政權，經濟、社會與各方面都還很不穩定，所以會有這樣的心理與情緒表現，其實都是相當正常的。

二、情緒挑釁性話語

韓戰爆發後，中共高層其實並沒有很在意這件事，其主要的發展重心仍在放在推動土地改革、盡快完成台灣、西藏與新疆的解放，並進行各項經濟建設，但在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後，中共毛澤東很快地公開譴責這一事件，認為美國違反當初公開的承諾，不干涉中共與台灣的政治糾紛，以至於中共無法解放台灣，完成統一大業，也無法終結其死對頭國民黨政權，畢竟當時中共並沒有建置海空軍，這些裝備仍需要跟蘇聯購置或請蘇聯支援才有可能進行渡海作戰，然當時中共與蘇聯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時，中共強硬的態度希望蘇聯能夠讓步，牽動了蘇聯對於東亞戰略安全的神經。

對蘇聯來說，史達林戰後的亞洲戰略涉及到中國的有兩個部分，首先即是把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中分離出來，形成廣闊的緩衝地帶以保障蘇聯的安全；其次是恢復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所有權益，其核心是確保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蘇聯戰後對華政策就是圍繞著這兩個目標，在中共獲取政權後，蘇聯的政策也隨著改變，但目標卻是始終如一。史達林答應對日作戰，是蘇聯實現遠東所有權益的基本條件，而為了讓蘇軍

盡快加入太平洋戰爭，以減少美軍傷亡，美國政府完全接受了史達林提出的條件(沈志華，1994：88-103)。

史達林認為打贏二戰，在遠東該有的權益，就是要收回當初日俄戰爭中失去的東北權益，以建立起屬於自己在遠東的勢力與不動港，這對蘇聯來說也算是一種洗刷當年敗給日本的一種恥辱，能夠拿回來對蘇聯來說，也是一種對民族主義榮譽的重振(某種民族自豪感)，在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當天發表的演說中，史達林說：1904年的失敗是俄國的汙點，而為了清洗這個汙點，「我們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斯大林，1962：438-439)，但此時毛澤東卻想要從蘇聯手中拿回屬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尊嚴，洗刷近代百年來的恥辱，這兩種民族主義情緒的對撞，最後史大林選擇了退讓，他給了毛澤東希望得到的民族主義聲望，但是相對的也種下了未來韓戰的遠因，因為史達林開始對毛澤東產生不信任感，史達林開始認為毛澤東就像是遠東的鐵托。

對毛澤東來說重新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具有兩項重大的意涵，一是證明中共建立的是一個割斷與舊中國一切法統聯繫的全新國家；二是如果可以拿回國民黨丟失的東西，則在全國民眾心中，或是在中國歷史上，為中共豎立起一個不可抹滅的貢獻，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向民眾解釋為什麼要向蘇聯「一面倒」的原因，也唯有如此才能夠穩固中共政權，並在民眾心中樹立起偉大領袖的形象(沈志華，2017：98)。因此毛澤東必須前往莫斯科尋求蘇聯的財政、經濟援助與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在與史達林的第一次正式會談中，史達林希望維持舊條約而毛澤東希望簽訂新條約，由於雙方的目標明顯不同，因此不歡而散，但毛澤東沒有放棄，選擇繼續留在蘇聯，12月24日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談，但仍讓毛澤東大失所望，因為史達林根本沒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事情，後來史達林避而不見毛澤東，這樣的作法讓毛澤東很生氣，讓他決定待在別墅裡面，什麼都不做，顯見雙方都不願做出讓步，最後在1950年元旦時，毛澤東決定向史達林施壓，『如果史達林繼續拒絕討論「實質性問題」，我就回國處理與西方國家的建交的事務了。』(沈志華，2017：98)，因為美國在1949年12月30日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2號文件《美國關於亞洲的立場》中確定，「美國應當通過適當的政治、心理和經濟手段利用中共和蘇聯之間，以及中國斯大林主義這和其他分子之間的分歧，同時謹慎地避免給人以干涉的印象」，至於台灣，其「重要性並不足以採取軍事行動」，「美國應盡一切努力以加強它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總體地位」，顯然，美國希望以犧牲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為代價和誘餌，改善中共政權的關係，防止中蘇結成同盟(沈志華，2016：133)，最終史達林在美國的聯中抗蘇的外交政策與毛澤東的堅持下做出妥協。

在簽訂了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史達林原本答應要給中共攻打台灣的各項武器訂單與奧援，也開始產生了變化，這些支援渡海作戰的海空軍武器裝備定單，從1950年2月一直延宕到6月25日韓戰爆發後，實際上都沒有執行((沈志華，2016：

143-148)，因此原本要支援中共解放台灣的各項武器、裝備與資源也就石沉大海，毛澤東想要解放台灣，徹底消滅國民黨殘餘勢力的願望也就落空。

而在北朝鮮方面，則出現了大逆轉，史達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請求，也就是同意讓北韓對南韓發起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願望，而且史達林與金日成已秘密完成協議，蘇聯出各項武器裝備，但倘若遇到各種的抵抗與困難，蘇聯不會出手幫忙，北韓必須要請中共毛澤東幫忙，因為史達林說他還有重大的歐洲戰場必須要經營，遠東的事務主要還是要靠毛澤東，從史達林的企圖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史達林打算給毛澤東一個教訓，史達林希望透過金日成發起韓戰，然後不出一兵一卒，甚至連戰略顧問都不准出現在戰場上，並且在韓戰初期人民軍快速推進時，阻止毛澤東對北韓人民軍的支援，導致後來北韓在關鍵的洛東江包圍戰中，遲遲無法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殲滅，以致戰場情勢逆轉，被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仁川大登陸逆轉戰局，這時史達林告訴金日成，你只能請中國出兵幫助你們，不然就是退入中國東北重整持續打游擊，這樣就可以達到史達林想要的戰略目標，將美國的主要目光從歐洲轉移到遠東，並透過中共的參戰讓美國身陷朝鮮半島，且不管韓戰是贏是輸，蘇聯都可以在遠東擁有不凍港與中長鐵路，另一方面也可以測試中共毛澤東對蘇聯的忠誠度。

從上面的史實發展來看，我們可以看到韓戰爆發的遠因，有一部分是因為毛澤東挑釁了史達林對於國家安全的需求與民族自豪感的追求，激起了史達林的不滿與報復，所以可以看到從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蘇聯對中共的態度也有明顯的差異，過往的許多優惠或是無償給予的裝備、器材與人員，都開始要收費或是必須貸款購買，才能獲得與使用。而毛澤東也清楚明白，史達林的態度轉變的原因，因此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如果今天韓戰的決策過程中，中共不打算出兵的話，一方面在社會主義陣營裡面，中共就失去了話語權，因為當初早在 1949 年 6 月劉少奇率團前往莫斯科時，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老大哥已經給予中共在亞洲主持共產國際事務的地位(師哲，1995：419-4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6：217-221)，但現在面對北韓的出兵請求，中共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拒絕的理由，因為北朝鮮人民軍在中共建政前，也幫忙中共四處打天下，在東北地區與國民黨內戰時更是協助中共退入北朝鮮，提供許多的戰略迴旋空間與物資，讓中共奠定未來革命成功的基礎(沈志華，2018：106-112)，加上當初金日成對於出兵統一朝鮮的問題上，也有來徵詢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當面允諾若是需要的地方，中共可以予以支援，所以無論站在同盟的道義或是曾經為共同理想打拼的革命情感，中共在情感層面幾乎沒有可以說不的立場；另一方面，如果中共不出兵也就坐實了史達林的猜想，毛澤東就是遠東的鐵托，並不值得信任，中共甫建立新政權，處於內部動盪不安、百廢待興，若沒有蘇聯的政治支持與經濟援助，中共政權是否能夠穩定發展實在很難想像，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情感的層面上，中共出兵發起抗美援朝已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事情。

三、情緒啟發性話語

在上述的情勢中，中共出兵抗美援朝勢在必行，那麼中共該如何轉換民眾的政治冷漠感喚起公眾激昂的民族情感與愛國情緒，以支持抗美援朝運動呢？我們可以看到中共透過「三視教育」與「訴苦運動」引發「中共民眾對美國的強烈憤慨與仇恨」，喚起民眾的愛國情緒與民族主義情感，藉以支援各項農產、物資、兵源與各項軍備所需。

「三視運動」主要透過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打破上述的恐美心理、掃除崇美心理與摧毀親美心理」，進而轉化為「仇美、蔑美、鄙美」的態度，用意識形態的方式，統一民眾對於美國的認知與立場，並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強民眾同仇敵愾的精神，其具體作法就是將美國形塑成帝國主義的壓迫者，是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也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是隻外強中乾的紙老虎，是可以被打敗的敵人(侯松濤，2007：41-42)。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認為恐美心理和崇美心理主要都是缺乏民族自尊心與自信的錯誤認知，因此必須從思想教育著手，因此三視教育不外乎就是從新塑造民眾對美國的一種錯誤認知，將美國醜化成偽善的帝國主義壓迫國家；是腐敗蔣介石政權與資本主義的最大支持者；是「特務、流氓、強盜的國家」，進而將美國形塑成世界上最墮落的反動大本營(侯松濤，2007：42)，慢慢地美國就被形塑成一種壞蛋的代名詞，像是「美國鬼子、美國赤佬」都成為當時流行的口頭禪，當時的美國形象就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也就是透過廣泛持久的宣傳教育運動，可以成為意識形態「內化」的直接手段或建立起基礎(蔣雲根，2002：104)，所以三視教育即使沒有完全轉化全體民眾的心理，也為這種心理的形成一種基礎，但光宣傳與講述有時很難打動人心，如果僅是講述與告知，有時很難形成一種共鳴，所以這時訴苦運動就顯得特別重要，藉由真人的親身說法，引發人們對相同遭遇的共鳴，激發人們共同的情感聯繫，形成一股激昂的情緒力量。

訴苦運動可說是抗美援朝的政治動員手段，區分成發起、深入和普及三個階段，發起階段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50 年底在南京發起，並在全國各地擴展開來，形成學生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當時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報導，在南京 64 個大、中學校的學生，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主，展開反侮辱、反毀謗運動，控訴美國帝國主義的罪惡，批判親美、崇美、恐美的錯誤思想」，這次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極大地發揮社會動援的功能，將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串聯起來，匯流成「反帝愛國鬥爭的怒潮」，有力地推動了各地抗美援朝的深入開展(姜曉麗、唐明勇，2011：39)。深入和普及階段，在 1951 年後達到訴苦運度的高潮，1951 年 3 月 14 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發出《為響應世界和平理事會決議並在全國普及深入抗美援朝運動的通告》，提出全國鄉鎮人民盡可能普遍召開小型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控訴美國與日本侵略的罪行以及美國、日本與國民黨特務迫害人民的罪行(姜曉麗、唐明勇，2011：39)，並在隨後的 1951 年「五一」節全國規模的遊行示威為中心，訴苦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得到大規模的運用。

訴苦運動剛開始，民眾的訴苦主要圍繞著日本帝國主義、地主惡霸和國民黨的腐敗等進行，所以共產黨主要的目標，就是如何將控訴日本的侵略暴行所燃起的仇恨指向美國，引導民眾控訴和仇恨國民黨和地主惡霸轉而控訴和仇恨美國，透過美國對於國民黨的援助與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扶植，轉化美國才是日本與腐敗國民黨的根本來源，加上當時美國轟炸東北地區造成民眾的傷亡，透過訴苦讓民眾藉由感性的傾訴轉化為理性的認知，強化了廣大民眾對美國的認知，培養民眾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國的心理，在這一過程中，共產黨就是為廣大民眾的訴苦提供動力、機會和場景，激發廣大民眾的情感共鳴。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由相同的社會地位、相似態度和價值觀的個人組成的群體，在相似的情景中很容易發生相互的情緒感染，一個人的情緒可以引發他人相對應的情緒的發生，而他人的情緒反過來加劇了這個人原有的情緒，循環反應，甚至激起強烈的情緒爆發」(周曉虹，1997：327)，訴苦運動之所以成效卓著，在於它能夠打動人心，能夠激發和波動廣大民眾的民族情感與愛國熱情。

透過訴苦，廣大民眾的民族意識逐漸強化，民族情感逐漸凝聚，民眾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感到深惡痛絕，進而逐漸改變當初的政治冷漠感，轉而強烈支持中共抗美援朝運動，以積極生產、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爭相入伍，立志當保家衛國的革命軍人為榮，中共一方面以民族國家的名義為號召，捍衛了民族主義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它也宣告了正確的愛國情緒應該怎樣表達，它透過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愛國主義和中共高層的期望，塑造了中共所想要的公眾情緒反應，明確喚起這種情緒還有其他目的，這種「官方的憤慨」開始得到宣揚、傳播和重申為基本常識，以便影響民眾對其他國家的正確認知，進而形成刻板印象，有利支援國家的各項戰略方針。

伍、結論

從上面的理論與個案研究，可以發現情緒與情感在政治與社會活動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情感與理性的二分法或是將情感當作是理性的干擾因素等概念已經過時，情感與理性可說是兩者不可分離的一個整體，有時反倒像是情緒為理性設立好目標，再透過理性的行動去達成目標，但在整個過程中，不管是國家領導者或是基層的民眾，情緒與情感都扮演的重要角色，影響著我們對於政治社會生活的種種決定。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一、專書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6，《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經驗總結編委會，1985，《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工作》，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沈志華，2016，《解密三十八度線：中蘇朝的合作與分歧》：台北：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 沈志華，2017，《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修訂第三版，全球防務出版公司。
- 沈志華，2018，《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周曉虹，1997，《現代社會心理學—多維視野中的社會行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懷國、馮科譯，2016，《人類活動中的理性》，譯自 Simon，1983，Reason in Human Affairs，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師哲，1995，《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郭忠華、潘華凌譯，2009，《心靈的煉金術：理性與情感》，譯自 Elster，1999，Alchemies of the Mind: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斯大林，1962，《斯大林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
- 楊得志，2011，《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 趙景芳譯，2018，《和平與戰爭之間》，譯自 Lebow，1981，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蔣雲根，2002，《政治人的心理世界》，上海：學林出版社。

二、期刊

- 沈志華，1994，〈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歷史研究》，第5期，第88-103頁。
- 姜曉麗、唐明勇，2011，〈情感認同：中共處理危機事件法寶—以抗美援朝期間的訴苦運動為例〉，《天中學刊》第26卷第3期，第38-41頁。
- 郝拓德、安德魯羅斯，2011，〈情感轉向：情感的類型及其國際關係影響〉，《外交評論》，第4期，頁40-56。
- 侯松濤，2007，〈抗美援朝運動的中「三視」教育〉，《黨史研究與教學》第6期，第40-45頁。
- 侯松濤，2005，〈抗美援朝運動與民眾社會心態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第2期，第19-28頁。
- 侯松濤，2008，〈試析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對相關謠言的應對與處理〉，《中共黨史研究》第5期，第68-74頁。
- 龐松，2003，《毛澤東時代的中國(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貳、外文部分

一、專書

- Damasio, Antonio. 1994.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Avon Books.

Hall, Todd H. 2015. *Emotional Diplomacy: Official Emo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errmann RK. 1985.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Hill, Christopher. 2003.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Houndmills: Palgrave.

Holmes M. 2018. *Face-to-face diplomacy: Social neuro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rvis R, Lebow RN, Stein JG. 1985. *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McDermott, Rose. 2004.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MI: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Petersen RD. 2002.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en SP. 2005. *War and human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s, Andrew A.G. 2014. *Mixed Emotions: Beyond Fear and Hatred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二、專書論文

Berntson GG, Cacioppo JT. 2004. "Multilevel analyses and reductionism: why social psychologists should care about neuroscience and vice versa." In *Essays in social neuroscience*, ed. J.T. Cacioppo, G.G. Berntson, MA: MIT Press. pp.107-120.

Bially Mattern, J. 2011. "A Practice Theory of Emotion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Ed. E. Adler & V. Pou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3-86.

Frijda, Nico H. 2000. "The Psychologists' Point of View." In *The Handbook of Emotions 2nd*, ed. Michael Lewis and Jeannette M. Haviland-Jones, New York: Guildford. pp.59 - 74.

Kinder DR. 1998. "Opinion and action in the realm of politics." In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DT Gilbert, ST Fiske, G Lindzey, New York: McGraw-Hill. pp.778-867.

Robert Abelson, 1963. "Computer Simulation of 'Hot' Cognitions," in Silvan Tomkins and Samuel Messick(eds.), *Computer Simulation of Personality: Frontier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NY: Wiley.

Stein, Janice Gross. 2013.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Decision Making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London: Sage. pp.195 - 219.

Verhey, Jeffrey. 2000. *The Spirit of 1914: Militarism, Myth, and Mobilization in Ger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N. 1986.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 RO Keohan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322-345.

三、期刊

Balzacq, Thierry and Robert Jervis. 2004. "Logics of Min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 Journey with Robert Jerv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30. pp.564-565.

Bleiker, R. 2001. "The Aesthetic Tur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Millenniu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3). pp.509-533.

Bleiker, R., & Hutchison, E. 2008. "Fear No More: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4 (S1). pp.115-135.

Bleiker, R., & Hutchison, E. 2014." Introduction: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6 (3). pp.490 - 491.

Crawford, Neta C. 2000.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 (4). pp.116-36.

Debs A and Monteiro NP. 2014. "Known unknowns: Power shifts, uncertainty,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68. pp.1-31.

Hall TH.and Ross AA. 2015. "Affective politics after 9/1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69. pp.847-879.

- Hall, Todd, and Keren Yarhi-Milo. 2012. "The Personal Touch: Leaders' Impressions, Costly Signaling, and Assessments of Sincer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 (3). pp.560 - 73.
- Holmes M. 2013. "Mirror neurons and the problem of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67. pp.829-861.
- Hutchison, E., & Bleiker, R. 2014. Theorizing Emotion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6 (3). pp.491 - 514.
- Hymans, Jacques E.C. 2010. "The Arrival of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Theory* 2 (3). pp.461 - 67.
- Johnson DD, Toft MD. 2013. "Grounds for war: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38. pp.7-38.
- Kertzer, Joshua D. and Dustin Tingley. 2018.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Paradigms" .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No.21. pp.319-339.
- Koschut, Simon. 2014. "Emotional (Security) Communities: The Significance of Emotion Norms in Inter-Allied Conflict Manag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0 (3). pp. 533 - 558.
- Lake, DA. 2010. "Two cheers for bargaining theory: Assessing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of the Iraq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35. pp.7-52.
- Lebow, Richard Ned. 2005. "Reason, Emotion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42. p.283.
- LeVeck BL, Hughes DA, Fowler JH, Hafner-Burton E, Victor DG. 2014. "The role of self-interest in elite bargain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o.111. pp.18536-18541.
- Linklater, A. 2004.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 *Aberystwyth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No.2. pp.71-77.
- Mansfield ED and Mutz DC. 2009. "Support for free trade: Self-interest, sociotropic politics, and outgroup anx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63. pp.425-457.
- Marcus, G. E. 2000. "Emotions in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1). pp.221-250.

- McDermott R, Tingley D, Cowden J, Frazzetto G, Johnson DDP. 2009.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MAOA) predicts behavioral aggression following provo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o. 106. pp. 2118–2123.
- McDermott Rose, Fowler JH, Smirnov O. 2008. "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prospect theory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olitics* No. 70. pp. 335–350.
- McDermott Rose, Hatemi PK. 2014.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neurobiological revolution: A review of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violence." *Millennium* No. 43. pp. 92–123.
- Mercer, Jonathan. 2005. 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1). pp. 77 – 106.
- Mercer, Jonathan. 2010. "Emotional Belief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4 (1). pp. 1–31.
- Mercer, Jonathan. 2013. "Emotion and Strategy in the Korean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 (2). pp. 221 – 252.
- Mercer, Jonathan. 2014. "Feeling Like a State: Social Emotion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Theory* 6 (3). pp. 515 – 535.
- Miller GA. 2003.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No. 7. pp. 141–144.
- Mintz A. 2004.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setting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No. 48. pp. 91–104.
- Petersen MB. 2015. "Evolutionary political psychology: On the origin and structure of heuristics and biases in politics." *Advance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No. 36. pp. 45–78.
- Renshon J, Lee JJ, Tingley D. 2017. "Emotions and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commitment proble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 71. pp. S189–S218.
- Renshon J. 2015. "Losing face and sinking cost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judgment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 69. pp. 659–695.
- Rho S, Tomz M. 2017. "Why don't trade preferences reflect economic self-intere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 71. pp. 85-108.

Ross, A. A. G. 2006. "Coming in from the Cold: Constructivism and Emo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2). pp.197-222.

Sasley, B. E. 2011. "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3(3). pp.452-476.

Tingley D. 2014. "Face-off: Facial features and strategic choice." *Political Psychology* No. 35. PP. 35-55.

Tingley D. 2017. "Rising power on the mi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 71. pp. S165-S188.

四、研討會論文

Mercer, Jonathan. 1996. "Approaching Emo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an Diego, California, 25 April, p. 1.

五、網路資料

Renshon, J, Yarhi-Milo, K, Kertzer, JD 2016 Democratic leaders, crises and war: Paired experiments on the Israeli Knesset and public. Unpublished manuscript. Available at.

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jkertzer/Research_files/DemocraciesWarCrises-website.pdf (accessed 20 September 2019).

北韓軍事挑釁：習近平的對應政策與立場

North Korea's Military Provocation: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and Stance of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張玲玲

摘要

中共針對北韓對美韓發動軍事挑釁，考量國家核心利益與安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社會內部穩定的關鍵因素，採取了「勸和、促談、降溫」、與北韓軍事發展切割、聯俄制衡美韓軍事合作、及採取「戰略明確」呼籲不得以軍事武裝解決北韓軍事挑釁問題。故其立場在於維持朝鮮半島現狀、但不支持北韓擁核，主張以外交、不容許軍事手段，配合經濟制裁、但維持在一定程度，掌握主導權、但不當調解者。

關鍵詞：北韓軍事、朝鮮半島、軍事挑釁、習近平

壹、前言

中共與北韓¹過去的關係最接近傳統盟國的定義，²現階段中共形容中朝是「保持傳統友好合作關係」、「不是盟國關係而是正常關係」。³中朝關係的維繫非僅因昔日「血盟」關係的歷史因素，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需求已逐漸取代或相形地更為重要。但從金正日時期開始，北韓對中共的政治與經濟高度依賴關係，就令中共領導人產生危機感；⁴尤其北韓核武對中國本身也造成威脅外，金正恩上台後的整肅行動、飛彈試射及反覆對美日韓的軍事挑釁…等，也使中共這位老大哥頻頻須接收國際壓力。

金正恩於 2011 年底接班後，慣用對美日韓發起軍事挑釁、似又有意回到談判桌的「和、戰兩手策略」，反覆操弄，影響著東北亞區域的和平穩定。而北韓軍事挑釁所引發的朝鮮半島衝突所存在根本性又難解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是中、美兩大國關係在此區域所連帶產生的競爭問題。⁵習近平 2013 年上台後，對於北韓與美日韓之間的軍事緊張，雖從未表明要主動擔任「調解者」角色，但都以三個「堅定」表明其立場，即中方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維護半島和平穩定、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強調「朝鮮半島不能有核、也不能生戰、生亂」。⁶不過在 2016 與 2017 年間，北韓加速彈道飛彈試射與核武試驗腳步，加上美國川普總統上台後對北韓態度轉趨強硬，並諷刺中共在北韓問題上發揮不了作用，甚至放話要自己動手解決，⁷公開質疑中共對北韓的影響力大幅削弱。

南韓方面，文在寅 2017 年上台後，以「新北方政策」對北韓伸出和平橄欖枝，舉行了史上第三次的兩韓高峰會，與金正恩共會面 3 次，並簽訂多項協議，以期改善兩韓關係及緩解軍事緊張局勢。但北韓在 2018 年 5 月 24 日爆破拆除豐溪里一處核實驗室相關設施之後，就無其他具體棄核行動；翌(2019)年迄今又是軍事挑釁頻頻，並公開對美韓發出軍事威脅訊息。

¹ 本文將「大韓民國、韓國」(正式名稱)統稱「南韓」，以便與「北韓」(北朝鮮或朝鮮為中國大陸慣用名稱)區別。

² 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韓國研究論叢(第 18 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年)，頁 16。Elizabeth C. Economy,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16.

³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同朝鮮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0 年 5 月更新，〈https://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_7/1206x1/t5543.htm〉。韓國朝鮮日報，〈王毅“中朝不是盟國關係而是正常關係”〉，《朝鮮日報》，2016 年 3 月 9 日，〈<https://tw.news.yahoo.com/%E7%8E%8B%E6%AF%85%E2%80%9C%E4%B8%AD%E6%9C%9D%E4%B8%8D%E6%98%AF%E7%9B%9F%E5%9C%8B%E9%97%9C%E4%BF%82%E8%80%8C%E6%98%AF%E6%AD%A3%E5%B8%B8%E9%97%9C%E4%BF%82%E2%80%9D-071358706.html>〉。

⁴ 吳雪鳳、曾怡仁，〈北韓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金正日主政以來的轉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5 卷第 3 期，2014 年 7 月，頁 97。

⁵ J. Michael Cole,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U.S., China, South Korea and North Korea Quadrilateral Relationship," *Prospect Journal*, No. 20, Oct. 2018, p. 2.

⁶ 文匯網，〈習近平：朝鮮半島不能有核也不能生戰生亂〉，《文匯網》，2016 年 2 月 6 日，〈<http://news.wenweipo.com/2016/02/06/IN1602060006.htm>〉。

⁷ "Trump ready to 'solve' North Korea problem without China," *BBC*, April 3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9475178>〉。

當面臨北韓對美韓發動軍事挑釁時，被認為有血盟、兄弟關係的中共，相對地也會接收到不小的壓力，故其內部一直有「挺朝」、「棄朝」或採「正常國家」外交關係等主張爭議。凡國家、包含中共定當亦是優先以自身國家核心利益為首要考量因素；其次，中朝關係上的地緣利益則明顯優先於經濟利益。⁸中國有官員認為北韓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堡壘，可以幫中國抵擋民主的南韓，以及南韓的盟邦美國，⁹但北韓對美韓發動軍事挑釁時，中共本身也可能面臨軍事與安全上的威脅。另一方面中共又須面對美韓及國際施壓或寄予厚望，中共是否必須調整其政策與立場？該政策與立場又是為何？這是本文想回答的問題。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內容除前言與結語之外，第二個部分先從文獻探討習近平時期在對應北韓核武飛彈試驗等軍事挑釁的政策與立場，梳理各學者專家所提出的不同論點；第三個部分分析論北韓軍事挑釁與意圖、以及美韓的反應；第四個部分從習近平時期中共考量美韓及北韓因素下的主要對應政策與立場，觀察是否可解釋前述文獻中學者所提論點及何論點較符合現實。

貳、文獻探討

中朝關係極具特殊性，理論難以完全解釋，藉文獻探討先梳理出在習近平時期，中共的對朝政策與立場。首先，中共一貫主張中朝關係仍要服務於中國政府的整體外交，亦即中共在朝鮮半島維護的最根本外交目標是朝鮮半島乃至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反對一切破壞穩定的因素，即中國政府當前在朝鮮半島採取維持現狀、和平共處的政策；¹⁰一直到胡錦濤時期以前，維持朝鮮半島現狀雖非最好的選擇，但是避免最壞政策的選擇。¹¹學者河凡植、Hong Nack Kim 也認為維護北韓共產體系的存續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¹²故中共對於北韓發動軍事挑釁行動，為中國自身國家利益與安全，不會有推翻金正恩政權意圖。

中國大陸內部與學者、民眾對於中共對北韓的政策一直有相當多的辯論，普遍有「有條件或無條件支持北韓、現狀維持、有限或積極制裁、視同正常的國家關係、棄朝論」等主要看法或主張；김흥규、귀슈씨엔以關鍵字搜尋「中國知網」、「百度」文獻並綜析(如表 1)，研究結果為儘管中共反對北韓的核發展，但在當前情況下中共仍不會放棄北韓，並認為習近平展現出的「友好政策」絕不僅僅是個別領導人的喜好，還是有與普遍的意識流形成聯繫。¹³

⁸ 河凡植，〈金正恩時期中朝關係的合作與衝突：以國家利益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57 卷第 4 期，2018 年 12 月，頁 11。

⁹ Elizabeth C. Economy,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17.

¹⁰ 洪停杓、張植榮，〈當代中國外交新論〉(北京：勵志出版社，2004 年)，頁 120。

¹¹ 丁樹範，〈中國對北韓核武的反應：維持分裂的朝鮮半島〉，《戰略安全研析》，第 19 期，2006 年 11 月，頁 10。

¹² 河凡植，〈金正恩時期中朝關係的合作與衝突：以國家利益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57 卷第 4 期，2018 年 12 月，頁 1。Hong Nack Kim, "China'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Under the Xi Jinping Leadership," *North Korean Review*, Fall 2013, p. 83.

¹³ 김흥규, 귀슈씨엔, "시진핑 시기 북중관계: 연구동향에서 엿보인 소용돌이와 전환의 갈림길," *국방정책*

表 1 習近平時期中國內部對朝政策的分歧

主要爭論	次層分歧 (文章數)
支持北韓論	有條件的支持北韓論 (1)
	無條件支持北韓論 (1)
維持現狀論	不可變更現狀論 (34)
	默認北韓核武論 (2)
正常的國家關係論 (實用主義)	有限制裁論 (30)
	積極制裁論 (15)
棄朝論	棄朝論 (8)

資料來源：김흥규, 귀슈씨엔, “시진핑 시기 북중관계: 연구동향에서 엿보인 소용돌이와 전환의 갈림길, ” 국방정책연구, 제 32 권 제 4 호, 통권 제 114 호, 2016 년 겨울, p. 55.

其次，歐巴馬政府同其他國家一樣，都認為中共對北韓有顯著影響力。國內學者劉德海認為歐巴馬、習近平時期，朝鮮半島國際政治的主軸已開始由地緣政治轉變到地緣經濟，中共扮演著主導的角色，並已使東北亞政治主軸也由戰略對抗走向經貿合作；¹⁴但是可從川普剛上台時對北韓的強勢作為，以及變化莫測的金正恩這兩位領導人之個人因素，使得中共的主導角色被削弱、戰略對抗色彩似乎已高過經貿合作。另劉德海也主張，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朝鮮半島政策的改變之一是不再允許與容忍平壤胡鬧，並展現中國該有的大國作為；其二，透過構建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主動參與治理北韓危機，而非被動的配合；第三是將朝鮮半島事務視為中國全球大戰略的一環，而非僅是東北亞的區域問題。¹⁵這樣的看法，適逢中美貿易戰持續、南海競逐及金正恩繼續威脅美韓之下，導致中美之間「競爭」大於「合作」、習近平一再包容北韓的情況，也迫使北韓問題成為中美之間重要的待解議題。

事實上，川普上台初期，也曾希望透過中共，對北韓核武試爆和彈道飛彈試射施壓，起初認為中共不夠努力，後來公開表示中共對於金正恩政權的影響力不如外界預期的大；¹⁶有部

책연구, 제 32 권 제 4 호, 통권 제 114 호, 2016 년 겨울, p. 74.

¹⁴ 劉德海，〈朝鮮半島的國際政治學：由地緣政治轉變到地緣經濟〉，《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第 25 期，2014 年 12 月，頁 118。

¹⁵ 劉德海，〈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朝鮮半島政策〉，《韓國學報》，第 34 期，2018 年 2 月，頁 131-132。

¹⁶ BBC, “Trump fears ‘major, major conflict’ with North Korea,” BBC, 28 April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9741671>>.

分學者也認為，北京沒有因為北韓核武與導彈危機的升級而付出相對努力遏止。¹⁷但仍有學者強調美國終究須透過中共對北韓發揮影響力，方能使朝核問題有解。如南韓學者이성환就認為中共制裁北韓並非要勒住北韓，而是要迫使北韓能同意無核化。¹⁸

再次，北韓是否是中共的戰略緩衝區？國內學者馬振坤則認為北京是採取「兩手策略」應對朝核危機。其理由為中共一方面以被動態度配合對北韓制裁，以避免被指責為助長朝鮮半島核危機惡化的幫兇，但另一方面仍維持中朝之間的基本友好關係。因中共擔心失去朝鮮半島核危機能對美國形成戰略牽制，因此現階段對北韓的政策仍以維持雙邊關係基本良好原則，在戰術運用上則始終採取「被動對美、主動對朝」的兩手操作模式，來確保其戰略利益極大化；¹⁹意味中共利用美國關注北韓對其直接的核威脅，在南海擴張勢力，使北韓問題成為中共在戰略布局南海時，轉移了美國介入或阻止的時機。²⁰

然中國大陸學者由冀則認為，北韓核試驗從根本性地挑戰北京的對朝政策，令北京無端受到連累，迫使習近平調整近年來對平壤實施的一套「對沖戰略」(offset strategy)；²¹並認為習近平現雖採取務實主義、將對朝戰略定位在「維持現狀」，但不像胡錦濤強調中朝的歷史淵源，並挑明北韓是「生亂」的來源，原來的「緩衝區」價值已縮水，故其對朝政策的調整正向「『北韓』是中共的負資產」方向移動。

綜上，中共現階段對朝主要政策主軸與立場仍是承襲江、胡時期的「維持現狀、和平共處」，不會「棄朝」。惟有幾點看法存有正反兩面或程度上的不同：第一、北韓具高戰略價值或是掣肘中共？第二、中共對北韓不具影響力或是解決朝核問題仍需靠中共？三、中共到底是主動參與或被動配合？另外，在美韓遭受北韓軍事挑釁所提出的抗議、要求與主張，是不是都會影響著中共對北韓的政策與立場？反之，中共對北韓的政策制定也反映了其他變項，即美中關係、南韓的中國政策以及北韓的行為？這些都是中共的對應政策所可能須考量的關鍵要素。

參、北韓軍事挑釁及美韓反應

美國國會研究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2008年曾發布《North Korean Provocation Actions, 1950-2007》報告，定義北韓「挑釁」的類型有「武裝侵略、違反休戰協定事項、間諜與武裝間諜滲透、船艦與航空器綁架、誘拐/綁架/恐怖活動(包含暗殺和

¹⁷ 賴怡忠，〈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對北韓政策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7年9月，頁12。

¹⁸ 이성환, “북중관계 변화의 동인과 시진핑시대의 대북정책,” *국제정치연구*, 18(1), 2015.6, p.256.

¹⁹ 馬振坤，〈中共對北韓政策方針及戰術變化〉，發表於「北韓第六次核試爆後的朝鮮半島情勢觀察」座談會(臺北：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2017年11月)，頁16。

²⁰ 李宸儀，〈美國全心關注北韓 中國悄悄布局南海〉，《上報》，2017年12月28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2085〉。

²¹ 即認同金正恩政權，繼續為北韓提供援助，以穩定朝鮮的安全態勢，同時加大對平壤的壓力，以阻止其進行新的核子試驗。由冀，〈管控朝鮮半島衝突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挑戰〉，《韓國學報》，30期，2017年1月，頁1。

爆炸)、對政治領導人/媒體工作者/機構的威脅與恐嚇,以及旨在推翻南韓政府的煽動行為、為阻礙重大談判取得進展而採取的行動、以及彈道導彈和核武器測試…等」。²²南韓軍方則將北韓挑釁區分「軍事」與「非軍事」挑釁。其定義「軍事挑釁」(Military Provocation)是「以軍隊、軍備、戰爭加諸於大韓民國的人民、財產和領土的一切危害行為」;類型包括以情報蒐集和造成社會動蕩為目的之「滲透」,以及旨在達成政治、經濟和軍事等特定目標的「挑釁」;通常與全面戰爭之前的「局部挑釁」(local provocation)混合使用。²³

一、北韓對美韓軍事挑釁樣態

北韓以「先軍政治」全力發展軍事,除了制定針對韓美聯軍的軍事戰略外,投注軍武研發,尤包括核武和彈道導彈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也持續加強常規武力。金正恩 2018 年也實施「軍改」。其「總參謀部」重組各軍司令部和情報局等機構,並建立「統合戰術指揮統制體系」(통합전술지휘통제체계, GS-2000)來強化其 C4I(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 Intelligence),以及遂行網路戰能力。²⁴陸海空三軍分別各約 70、60、40%以上兵力部署在平壤-元山一線以南,可以最少準備、最大軍力、最快速度向南發動突襲。

金正恩時期與以往不同的,還有生產和部署無人機與輕型飛機進行偵察和攻擊。另外,將「戰略火箭總部」擴編為「戰略部隊」,組建 9 個導彈旅,執行與中國火箭軍相似任務,為獨立軍事指揮中心。²⁵其軍事戰略維持在對美韓聯軍發動突擊戰、混合戰和快速戰為主,採「速戰速決」戰略,於突擊美韓聯軍後嘗試能盡早結束戰爭,故著眼於發展「非對稱」戰力,即核武、彈道飛彈大規模殺傷武器。

因地緣與國力因素,北韓針對美國的軍事挑釁主在威脅以核武、導彈攻擊美軍基地或美國本土等。²⁶而高麗大學北韓研究所서우진博士整理北韓 2009-2018 年對南韓軍事挑釁的 199 件案例類型 頻次以對南韓領海挑釁 118 例(59.29%)為最多,依次為飛彈發射 46 例(23.11%)、地面挑釁 11 例(5.53%)、迂迴滲透 10 例(5.02%)、領空挑釁 9 例(4.52%)和核試驗 5 例(2.51%)。另從軍事挑釁類型發現其主要特徵,係以核武和導彈試驗發起軍事挑釁,造成黃海上的「北方限界線」武力化、軍事衝突不斷,及使兩國之間戰力形成「不對稱」。²⁷其他「有形軍事挑釁」手段尚包括、火箭、衛星試射、軍演、火箭攻擊、網路攻擊和小型無人機滲透等。在「無形軍事挑釁」部分,主要有網路攻擊、心理戰等。

²² Hannah Fischer, *North Korean Provocation Actions, 1950-2007*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7), Summary.

²³ 합동참모본부, *합동. 연합작전 군사용어집* (서울: 합동참모본부, 2014), p. 74.

²⁴ 대한민국국방부, *2018 국방백서* (서울: 대한민국국방부, 2018), pp. 21-22.

²⁵ 대한민국국방부, *2018 국방백서*, p. 25.

²⁶ Shinichi OGAWA, "North Korea's Nuclear Development,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Regime,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Utpal Vyas & Ching-Chang Chen & Denny Roy, *The North Korea Crisis and Regional Responses* (Hawaii: East-West Center, 2015), p. 31.

²⁷ 서우진, "김정은 시기의 북한의 대남 군사도발의 유형과 변화 양상," *Journal of North Korea Studies*, Vol. 5 No. 2, 2019.6, pp. 127-128.

綜上，金正恩時期重大的軍事挑釁在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試驗和試射，其戰略挑釁對美韓壓迫性程度也是最高。如 2012 年發射大浦洞和 2014 年飛毛腿導彈、2016 年發射 SLBM（北極星導彈）以及大浦洞（光明星 3 號）與舞水端導彈、2017 年兩度發射 ICBM 級導彈（火星 12 型、14 型）。另 2006 年首次核試後、至 2017 年，在京畿道豐州市豐溪里的地下設施總共進行了六次核試驗；金正日掌權 17 年期間進行兩次、金正恩在位 5 年內就進行了四次（2013 年進行第三次、2016 年第四、五次、2017 年第六次核試驗）。

其次，金正恩於 2009 年確定接班後，北韓對南韓的軍事挑釁強度也明顯加大。如 2009 年「大青海戰」²⁸、2010 年天安艦被魚雷擊沉和砲擊延坪島事件、2011 年黃海海上砲擊與侵犯北方限界線等，到今（2020）年炸燬兩韓聯合辦公室大樓…等。另外，透過無人機偵察取代對領空的挑釁手段。再次，是「對南韓網路恐攻」，²⁹最嚴重事件是多次駭走美韓聯軍重大作戰計畫及潛艦「冷發射」（Cold Launch）技術。³⁰與金日成、金正日時期多運用傳統的迂迴滲透方式比較起來，金正恩多採取直接軍事挑釁手段，此原因除了應是隨技術進步之外，與其意圖密切相關。

二、北韓軍事挑釁意圖

金正恩在國際譴責與制裁下仍執意對美韓進行軍事挑釁，除了具有「軍事層次」之意圖，主要欲達其「政治意圖」，且政治意圖遠大於軍事意圖。首先，在軍事意涵上，應有故意施壓美韓進行反制之意圖。

北韓故意挑起事端，迫使美韓進行反制，北韓可再藉「正當」理由發動更大挑釁。北韓有時雖主張繼續改善兩韓關係，卻又透過改變朝鮮半島局勢、並根據其政治目的製造軍事緊張，同時迫使南韓政府針對北韓不得不採取應對政策。³¹如南韓政府為了應對 2016 年北韓第四次核試驗時，便恢復向北韓實施心戰廣播，北韓也相應重啟；³²接著次月又因國際經濟制裁，北韓發射遠程導彈，進一步加劇緊張。

2016 年第五次核試時，也是將壓力轉向南韓，並訂定 2017 年為「戰鬥完成準備年」，將美韓視為頭號公敵，號召北韓民眾同仇敵愾；甚至公開宣布推動「追加核武發展和投射手段

²⁸ 2009 年 11 月 10 日，北韓警備艇越過黃海「北方限界線」，於大青島東方海域以火砲攻擊南韓海軍艦艇。

²⁹ 北韓「對南網路恐攻」於 2000 年初期引入，最典型的的就是 2009 年 7 月「D·DOS 攻擊事件」。양해수, “북한 도발행태의 변화에 따른 도발의도 분석,” *한국군사학논총*, 제 7 집제 1 권, 2018. 6, p. 9.

³⁰ 重大事件有 2016 年北韓人民軍網軍駭走儲存在南韓軍隊內部網絡中的最新行動計畫《5015 作戰計畫》、《3100 作戰計畫》（軍事 2 級機密），內容不僅有應對北韓的地面作戰行動，「先發制人」攻擊行動的部隊部署及「斬首」計畫，這些計畫韓美聯司司令部均已完成簽署，為北韓人民軍網軍所為。류승연, “北해커에 군사기밀 유출됐다...미 국방부 “해킹 여부는 보안사항, 확인해줄 수 없어,” *서울경제*, 2017. 10. 11, <<https://www.sedaily.com/NewsView/10M9CGMDV>>.

³¹ 양해수, “북한 도발행태의 변화에 따른 도발의도 분석,” *한국군사학논총*, 제 7 집제 1 권, 2018. 6, p. 27.

³² SBS 뉴미디어부, “북한 대남 심리전 수위 높아·최진방 긴장감 '고조,’” *SBS 뉴스*, 2016. 2. 12, <https://news.sbs.co.kr/news/endPage.do?news_id=N1003411936&link=ORI&cooper=NAVER&link=COPYPASTE&cooper=SBSNEWSEND>.

戰力化」，發射多種彈道導彈，包括「北極星 2 型」洲際彈道導彈 (ICBM)。2017 年第六次核試驗時，順勢宣布編成「國家核武裝部隊」。

「軍事層次」的另一個意圖是要建立「不對稱」戰力，以利未來作戰能速戰速決。北韓自 1958 年開始，以朝鮮半島核威脅理由發展核武，但美國 1991 年撤出部署的戰術核武後，即使核威脅消失，北韓仍以美國的核威脅作為核發展的理由。儘管面臨強大的經濟制裁與壓力，但北韓仍堅持核發展，並在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之後，藉由六次核試驗試圖證明它是擁核國家。³³原因也在於北韓冷戰時期的多種武器系統已經過時，加上目前經濟困難，難以超越韓美同盟的實力。故再加上低成本的網路作戰力量，以確保相對於高價常規武器的「不對稱」戰力，以保有局部優勢。

其次，北韓透過軍事挑釁欲達其政治意圖大致有四項：

(一)維護金氏政權

北韓過去對南韓發動軍事挑釁，最大目的在於確保北韓政權的存在與強調其正統性。北韓勞動黨章程前文即指明，³⁴北韓是代表朝鮮半島正統的國家，南韓是美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須解放南韓且予以合併。故北韓維持赤化朝鮮半島意圖、使其完全共產化，並讓金氏家族永遠掌握政權。³⁵其次，金正恩因其非「世子」身分，故以軍事績效來鞏固政權與維護其領導權威。

(二)提升國家地位

北韓自 2000 年中期開始，其軍事挑釁行為集中在「核開發與網路挑釁」的主要目的，是藉「不對稱」戰力最終以達到與韓美「權力平衡」，迫使韓美須與其談判，最終能與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及獲得美國保證金氏政權鞏固，³⁶或者能在談判桌上佔據有利的制高地位，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三)解除經濟制裁

金正恩於 2018 年元旦致詞中，堅持其「核武發展與經濟建設並進路線」(핵·경제 병진노선)的正當性，強調在大規模生產和實際部署核彈頭的同時，會發展經濟、兼顧百姓

³³ 美方首次於 2018 年 12 月底駐日美軍司令部官方影片中，將北韓、中國及俄羅斯同列「3 個宣布擁核國家」。

³⁴ 北韓勞動黨章程前文內容：「為了使美帝國主義侵略武力撤出南韓，終止其殖民統治，積極支持和聲援南韓人民為爭取社會的民主化和進行生存權鬥爭，完成統一祖國、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統一發展而鬥爭」。

³⁵ Barbara Starr, "Pentagon's damning assessment of Kim regime made public," with summit in balance, CNN, May 23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5/23/politics/pentagon-north-korea-assessment/index.html>>.

³⁶ 河凡植，〈金正恩時期中朝關係的合作與衝突：以國家利益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57 卷第 4 期，2018 年 12 月，頁 5。

生活，³⁷但事實上，北韓在受到制裁、又將有限經費大量投在軍事武器研發狀況下，國民生活條件普遍都極為惡劣。故金正恩極力企圖在兩韓關係中發揮主導作用，並以外交活動或軍事挑釁施壓的「兩手策略」，迫使南韓能要求美國能讓北韓解除或減緩經濟制裁及被國際孤立的困境。

(四)分化韓美同盟關係

2000 年中期以後，北韓的核開發與網路攻擊，的確曾引起韓美同盟關係之間的不和諧。首先，對於北韓核開發問題，美、韓的對應過程中存在著爭議。北韓 1993 年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NPT)之後，南韓對美朝之間的談判表露出不滿，因美國「軟著陸」政策推遲了處理朝核問題，南韓擔心美國會犧牲南韓的安全利益。到了 1998 年，韓美決定在朝核問題上保持密切的合作，但對朝政策與立場仍未能達成一致，美國保持其轉向遏制和施壓政策的態度，與南韓「陽光政策」形成扞格。

北韓 2006 年首次核試驗時，小布希政府主張要採「先發制人」、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南韓擔心因此遭到北韓報復，又再導致美國會真正付諸軍事行動。最終，「先發制人」沒有實行、也未能阻止北韓核試驗，並成為美朝衝突根源。

現在文在寅政府基本上與美國都維持在無法認同北韓擁核的立場，不過金正恩會利用韓美歧見製造分化。如 2018 年金正恩特別警告美國整個大陸都在其攻擊範圍內，但對南韓卻藉平昌冬季奧運釋出善意。³⁸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在其回憶錄中也提及南韓擔心被邊緣化。另外，北韓藉駭取南韓軍方內部網路的韓美作戰計畫，讓美方怪罪韓方疏失，也是分化手段之一。

三、美韓反應

(一)施壓與交往

金正恩之政治或軍事意圖，歐巴馬、川普與朴槿惠、文在寅都一清二楚，但是國際現實、國家利益與安全、國內民意…，都是民主國家的美韓對北韓軍事挑釁反應的考量因素；雖然美韓時任的領導人與其執政黨的意志會有一定的主軸，但因為民主政治體制架構，國家的基本政策會維持在一定的原則。基本上，美國採軍事嚇阻、經濟制裁「施壓」北韓，另以經濟援助與北韓「交往」的戰略。美國一直希望金正恩能進入「無核化」談判議程，迄今均未能實現。

歐巴馬執政時期，華府對北韓的政策為「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希望藉由制裁讓平壤當局就範，迫使其放棄發展武器的野心；實質上此亦即「施壓與交往」的雙軌政

³⁷ 이민정, “北 김정은 2018 년 신년사, ” *중앙일보*, 2018. 1. 1, <<https://news.joins.com/article/22250044>>.

³⁸ 同上註。

策，並要求北韓在進行對話或談判之前先改變行為方式。但是，北韓還是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挑釁，挑戰了「戰略忍耐」政策的有效性。結果終未能遏制北韓持續核武發展。³⁹在第三次核試爆後，歐巴馬政府對北韓逐漸失去耐心，態度轉為強硬；並且與習近平通話，表示願與中方加強合作。⁴⁰

川普對於北韓核武問題則採取「極限壓力與交往」(Maximum Pressure and Engagement) 戰略。川普以軍事手段、號召國際社會制裁平壤，對北韓施以「極限施壓」。如 2017 年是朝鮮半島走在「戰爭邊緣」的一年。北韓宣告首次成功發射了可以攻擊美國本土的 ICBM，金正恩甚至稱可將微型化的核子彈頭設置在 ICBM 之上，並將發射 4 枚火星-12 號洲際飛彈攻擊美國關島基地。川普立即表示美國如受攻擊，北韓將會嘗到美國空前未有的「憤怒與火力 (fury and fire)」回應。⁴¹隔兩年內的三次「川金會」，也算川普與金正恩「交往」的手段之一，中共方面都以「正面」回應。惟美方終究無法以單極模式阻止北韓停止軍事挑釁，甬論廢核、無核化目標，故仍須藉由中共對北韓施壓或勸誘。

(二)強化美韓合作

美韓軍事同盟是對應北韓軍事挑釁非常重要的力量。如在美韓聯合防禦系統的基礎上，南韓軍方可保持穩定的監視態勢，透過韓美合作和操作聯合情報資訊，可及早發現和警告北韓的挑釁。不過南韓為了應對北韓核武與導彈的威脅與挑釁，於 2017 年部署美方的薩德 (THAAD) 反飛彈系統，引發中共強烈反彈與抵制。

其次，南韓目前在美國協助下，正全力推動「國防改革 2.0」，著重尖端武器系統研製，以預先建立針對未來戰爭的軍事防禦力量。另外，透過「戰時作戰指揮權」移轉的過渡時期，將及早建立由南韓軍方領導的聯合防禦系統，為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安全局勢做好準備，以保持牢固的防禦態勢。尤其積極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整合到國防領域，以蓄積精實國防力量，落實國防自主，美軍都予以相當的幫助。

而美韓加強國防軍事合作，目的在於防備北韓的軍事挑釁之外，也引發中共認為美國是藉北韓軍事挑釁問題，特意加強在東亞的軍力部署，以增加圍堵中國軍事崛起的力量。

(三)要求中共控管北韓

由於中共向來被認定是北韓最堅實的盟邦，國際社會多認為北韓擁核是「中國外交的失誤」，意味著中共沒能「控制住」北韓。所以國際間、尤其美、韓一再透過各種管道與喊話，

³⁹ Changsop Pyon, "Strategic Patience or Back to Engagement? Obama's Dilemma on North Korea," *North Korean Review*, Vol. 7, No. 2, FALL 2011, p. 73.

⁴⁰ 〈習近平歐巴馬通話 談北韓核問題〉，《中央社》，2016 年 2 月 6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602060208.aspx>>。

⁴¹ 李明，〈川普政府因應北韓挑釁捉襟見肘〉，《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9 期，2017 年 9 月，頁 15。

要求中共能好好控管北韓，發揮影響力。

肆、中共對應政策與作為

對中共而言，北韓的核武飛彈發展加劇中國大陸周邊局勢緊張，也損害中共的核心利益；⁴²檢視金正恩 2009 年任國家安全保衛部長、2016 年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元帥」頭銜、迄 2018 年，199 件挑釁事件中，挑釁強度最強、涉及或牽動美中日韓多國安全利益，即核試驗及飛彈試射。中共基於國家安全問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傳統聯繫和經濟關係四個要素，與北韓有著「特殊關係」，⁴³而面對北韓軍事挑釁連帶的壓力與威脅，不得不採取針對性的對應政策。

一、仍以「勸和、促談、降溫」為主軸

中共以往的立場概括起來是「勸和、促談、降溫」，除了一直強調朝核問題原則上應由朝美雙方協商解決，對於通過多邊方式解決問題的態度並不積極。直到第一次朝核問題出現後，才轉變成積極組織和參與解決北韓核問題。⁴⁴因為在胡錦濤時代，著重內部發展的需求，使其需要和平的外在環境，故強調「和諧社會」政策，⁴⁵中共對朝政策是以國內政治為基點，以維持朝鮮半島現狀為目標，並以歸避危機為導向。⁴⁶習近平上台後，北韓軍事挑釁頻次與強度也隨著金正恩增加，習近平雖調整戰略、舉措較趨強硬，但始終以堅持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為基調，以維護中國大陸的戰略利益。

二、與北韓的軍事發展切割

雖然中共與北韓的關係仍能維持最小形式的利益，在歷史與地理上還是形成著「戰略交往」(Strategic relationship)，⁴⁷但中共針對各方交相指責中共沒能好好控管北韓、表面上配合國際與美國制裁北韓，但私下持續大規模援助北韓部分。中共曾藉由《環球時報》駁斥「中國連串外交失誤才導致北韓脫軌」的看法，並認為國際都過於誇大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並稱「新中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從來就不是『大哥』與『小弟』的關係」，並主張「中國沒有能力主導半島事務」、「不可能對朝鮮提供美國對以色列那樣的庇護」、「並非朝鮮經濟

⁴² ZHENG Jiyong, "The North Korea Problem and China: Interests, Debates, and Roadmaps," in Editor's Utpal Vyas, ed., *The North Korea Crisis and Regional Responses* (Hawaii: East-West Center, 2015), p. 100.

⁴³ Masahiro Hoshino & Shunji Hiraiwa, "Four factors i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under Xi Jinping and Kim Jong-u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20 Apr 2020, pp. 9-10.

⁴⁴ 朴柔峯，〈論朝核問題中的中國外交戰略選擇〉，《國際問題研究》，2009年9月，頁197。

⁴⁵ 丁樹範，〈中國對北韓核武的反應：維持分裂的朝鮮半島〉，《戰略安全研析》，第19期，2006年11月，頁10。

⁴⁶ 由冀，〈管控朝鮮半島衝突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挑戰〉，《韓國學報》，30期，2017年1月，頁2。

⁴⁷ Carla P. Freeman, *China and North Korea: Strategic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from a Changing Chin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15.

的「金主」，也非其發展所需技術和機會的壟斷者」，甚至「直到上世紀 90 年代初朝核危機第一次爆發之前，中國的力量一直比俄羅斯、英國、法國要低不少」。中共雖然確實援助北韓，但所謂「大規模援助」都是「想像出來的」，「中朝之間是一種平等關係」。⁴⁸

三、制衡美韓軍事合作

中美兩國互疑嚴重。中共認為美國利用朝鮮半島問題控制南韓強化其在半島的軍事力量，故美國不願朝核問題澈底解決；而美國則認為中共也不願真正解決朝核問題，因中國可利用此點牽制美軍。

習近平 2017 年 7 月前往德國參加 G20 峰會前，先行訪問俄羅斯並與總統普丁會晤。兩國元首就朝鮮半島等局勢，稱雙方要保持戰略協作，勸和促談，妥善應對，推動各方通過對話談判妥善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並針對美韓聯合軍演、南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一致表達反對立場，⁴⁹並由外交部長王毅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4 日在莫斯科簽署《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聯合聲明》，⁵⁰該聲明內容完全包含了中共對朝鮮半島問題的主張與立場，其中第三條「雙方以中方關於朝鮮暫停核導活動和美韓暫停大規模聯合軍演「雙暫停」倡議、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雙軌並行」思路以及俄方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分步走設想為基礎，提出共同倡議」，即在聯俄制美韓的軍事合作。

四、採取「戰略明確」(Strategic Clarity)政策

中共究竟有無暗中提供北韓核武技術？一直具爭議性。⁵¹對於北韓不斷發動軍事挑釁，中共當然視規模大小、國際反應、是否損及自身利益予以回應，但不變的政策，就是對於北韓擁有核武採取「戰略明確」政策，即維持「不支持」立場；相對的，對於美韓日其他國家的對應政策，則維持嚴正表明「不同意軍事武裝介入」北韓軍事挑釁問題。

伍、中共立場分析

中共 2011 年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明確界定「核心利益」的內容，包括「國

⁴⁸ 環球時報，〈社評：朝鮮走上擁核道路，是中國的錯嗎〉，《環球時報》，2017 年 9 月 7 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557d>〉。

⁴⁹ 新華網，〈習近平對俄羅斯、德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 G20 峰會〉，《新華網》，2017 年 7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cnleaders/xijinpings/xjpcfl707/index.htm>〉。ETtoday 大陸中心，〈習近平會見普丁 雙方一致反對南韓部署「薩德」〉，《ETtoday》，2017 年 7 月 4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704/958839.htm#ixzz6TeB5B2Hp>〉。

⁵⁰ 人民日報，〈中國外交部和俄羅斯外交部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7 年 7 月 5 日，版 22。

⁵¹ 參見牧野愛博著、林巍翰譯，《金正恩的外交遊戲—你不知的北韓核武真相》（臺北：八旗文化，2018 年），頁 24。該書主張北韓的核武技術非來自中共，是派遣人員至蘇聯學習，並從獲得 IRT-2000 型研究用核子反應爐。

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六項內容。⁵²北韓的軍事挑釁主要會影響到中共的國家核心利益有兩項：國家安全、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也就是核威脅中國大陸安全，及若朝鮮半島爆發戰爭，將會影響社會安定與經濟。

中共雖然一再表明不支持北韓擁核，但美國卻認為中共已不如往日對北韓有制約能力。習近平的第一任期均未像過去領導人訪問北韓，直至 2019 年方首次訪朝，並宣傳此行是「鞏固中朝友誼，推動朝鮮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⁵³各國之間缺乏互信，應是無疑。

根據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是在謀求最大利益的前提下，一國外交政策固然是經由理性的決策過程制定，並依照利益的大小排列政策選項的優先順序。然而由於決策者自有其他考量，最終作出的決策往往未必是最佳的選擇，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政策選項付出的代價太高、預期獲得的利益太低，決策者絕對不會考慮。⁵⁴習近平為了國家利益與安全，只能選擇付出代價最低、可能獲得利益較高的選項。

一、仍維持朝鮮半島現狀，但不支持北韓擁核

從「意識形態」來看，儘管有學者認為北韓對於中共是負債、負面影響，甚至認為中共已不重視北韓是否與中共一同站在共產主義陣線，北韓從 2002 年開始不見「共產主義」一詞到了 2013 年 3、4 月開始又陸續於《勞動新聞》出現，但於 6 月首次修改規範層級高於憲法和勞動黨章程的《樹立黨的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簡稱《十大原則》)，以「主體革命偉業」替代了「共產主義偉業」…等「去共產主義化」舉措，金氏家族唯一領導體系比起共產主義理念更為重要。金正恩委員長對習近平總書記深表感謝，表示習近平總書記關注朝鮮社會主義建設，關心朝鮮經濟民生發展，堅定了朝鮮黨和人民對自己事業的信心。⁵⁵美中關係激烈對抗之際，中國幾乎找不到幾個國家能夠出來向它表示支持，金正恩 2011 年上台以來首次透過勞動黨國際部出面為北京說話，批評美國。⁵⁶

⁵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1 年 9 月 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855789.shtml>〉。

⁵³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譜寫中朝友誼新篇，維護半島和平穩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2019 年 6 月 21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9/0621/c1001-31174589.html>〉。

⁵⁴ 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辭典》(臺北：五南，2009 年)，頁 105。

⁵⁵ 新華社，〈譜寫中朝友誼新篇，維護半島和平穩定—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談習近平總書記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人民網》，2019 年 6 月 21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9/0621/c1001-31174589.html>〉。

⁵⁶ 美國之音指出，北韓《勞動新聞》2020 年 6 月 4 日發表朝鮮勞動黨國際事務部發言人的聲明，痛批美國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的對中言論(針對中共硬推「港版國安法」)，稱其為「無稽之談」，還將美國比喻為被中國遮擋住的落日。自由時報，〈金正恩上任首次！美媒：北韓罕見為中國說話、砲轟美國〉，《自由時報》，2020 年 6 月 6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189010>〉。

二、主張以外交手段緩解，但不容許軍事手段解決

金正恩在 2013 年第三次核試驗、2016 年第四、五次核試驗及發射衛星、2017 年 4 月 25 日北韓人民軍建軍八十五週年紀念日，舉行大規模閱兵與火力演習、首次試射彈道飛彈橫越日本上空及聲稱氫彈試爆的第六次核試驗時，期間美國對聯合國表達不滿，川普也曾和金正恩隔空對罵、比較誰的核武按鈕大，甚至公開宣稱要「摧毀北韓」，中共除了對雙方呼籲對話以外，⁵⁷本身也增加中朝邊境的軍隊數量，更提升到最高一級的戰備，朝鮮半島危機處於戰爭邊緣。⁵⁸中共雖有公開指責，但仍呼籲各方冷靜，並透過談判解決。目標仍是維持外在和平環境，北韓政權穩固。

中共針對現階段針對半島局勢持續升級，陷入「制裁-核試-再制裁-再核試」怪圈，主張「雙暫停」倡議和「雙軌並進」思路，即北韓暫停核導試驗和美韓暫停大規模聯合軍演，並行推進實現半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進程，積極勸和促談，維護半島和平穩定。⁵⁹不過這樣的提案，並未受到相關各方積極地回應。⁶⁰

其次，中共認為美韓利用北韓軍事挑釁理由加強軍事合作強度。如 2017 年 10 月針對韓美決定修改《導彈協定》以提升南韓彈道導彈射程與無人機搭載重量及敲定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時間，以及在 2014 年前制定有針對性的聯合核威懾戰略，中共呼籲朝韓雙方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相互間的問題，堅決反對朝鮮半島發生武裝衝突。⁶¹

三、贊同經濟制裁、但不贊成過激制裁並暗中支援

中共本身也會面臨北韓核武也有可能也會受到威脅感，尤其若有「核擴散」疑慮，更將危及近北韓區域安全。或者考量北韓若發生戰事或動亂，可能面臨大量難民流入中國大陸東北，造成內部混亂、社會不安與經濟負擔。

2017 年 7 月北韓兩度發射洲際彈道飛彈，中共難得同意聯合國安理會祭出最嚴厲經濟制裁。另又同意針對第六次核試爆的新一輪制裁決議。但卻反對美國原主張對北韓全面禁止運輸石油和凍結金正恩政權的海外資產。應擔心影響金正恩政權的穩定度、迫使金正恩採取更

⁵⁷ Simon Denyer, "China to Trump: That speech on North Korea was really unhelpfu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0,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china-finds-trump-threats-to-north-korea-unhelpful/2017/09/20/07bac374-9d75-11e7-b2a7-bc70b6f98089_story.html>.

⁵⁸ 洪耀南，《中共百年 看習近平十年》（臺北：新銳文創，2017 年），頁 81。

⁵⁹ 孫奕，〈習近平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新華社》，2019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2/23/c_1125378479.htm>。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朝鮮半島核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9 年 4 月，<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cxbdhwt_673311/jbqk_67331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王毅：希望朝美領導人會晤為實現半島無核化、建立半島和平機制邁出實質性步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8 年 6 月 12 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6/12/content_5298098.htm>。

⁶⁰ 李明，〈川普政府因應北韓挑釁捉襟見肘〉，《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9 期，2017 年 9 月，頁 17。

⁶¹ 鐘聲，〈維護朝鮮半島安全需要冷靜克制〉，《人民日報》，2012 年 10 月 26 日，版 3。

激烈的報復手段。

習近平與川普多次為了北韓繼續進行的核子武器和彈道飛彈試驗通話，習承諾致力於以聯合國安理會有關北韓的決議「對北韓施加最大限度的壓力」，但屢傳中國、俄羅斯…等國違反制裁向北韓輸送石油、燃油等石油產品，違反了美國和聯合國的制裁。⁶²

北韓希望中國能幫忙緩解對朝的經濟制裁，但未實現「無核化」進程前，美國不可能送上這份大禮的，即使中國加強與北韓經濟交流與合作，也離金正恩的「解除制裁」根本目標相去甚遠。⁶³因此，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勢必也受到限制。

四、意圖掌握主導權，但不願當「調解者」介入

北韓軍事挑釁問題雖然使中共頭疼，但也不全是壞事。因為讓美國糾纏在一場複雜的外交冒險中，並且要依賴中共作為通向平壤統治者的橋樑，但非「調解者」角色與責任。危機也在美國與其南韓及日本盟友之間製造緊張局面。緊張氣氛也會凝聚北韓軍隊對統治集團的忠誠，有助於支撐金氏政權。⁶⁴如此一來，符合中共不希望北韓政權動盪的期望，二來可以讓中共有繼續主導未來可能恢復六方或四方談判，可作為具有影響力的外國勢力。

陸、結語

中共對應北韓軍事挑釁的政策與立場，首先，從建構主義視角可觀察到，中共受到國際壓力的關鍵因素，為了遵守國際規則、履行承諾，故贊成並配合制裁北韓。另也因國際壓力，中共為了承擔安撫北韓的角色、避免北韓再採報復行動，始終採取「勸和、促談、降溫」政策，並不同意採取過激制裁手段，此時便扮演著北韓的「朋友」身分。

其次，「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構中共與北韓的身分認同，使得北韓仍未拋棄共同的意識形態，繼續同中共走在社會主義路線上。中共在北韓問題解決上，能建構與北韓共同的利益，仍含有成為「安全共同體」的可能性。而北韓以低強度軍事挑釁、並遊走在戰爭邊緣，也不可能自己提出或同意「永久棄核」下，中共雖身為鄰居大國，也憂心會影響國家利益與安全，但始終堅持以外交談判代替軍事手段，也因為是崛起的大國，故自許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即便受到國際壓力，還是想成為朝鮮半島「永久和平」的推手，故主張以外交談判的和平方式為宜，惟保持不介入調解、仲裁的角色。

再者，從中共的戰略考量順序是以美中關係為優先，其次才是北韓、南韓。也就是大國

⁶² Joby Warrick and Simon Denyer, "A 'massive' spike in oil smuggling has eased the economic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1,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a-massive-spike-in-oil-smuggling-has-eased-the-economic-pressure-on-north-korea/2018/09/20/1f6b684a-bc35-11e8-8792-78719177250f_story.html>.

⁶³ 박병광, "롤리코스터 같은 북·중관계," *월간조선*, 2020. 6, p. 24.

⁶⁴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16.

關係處理好，其他小國問題即可順勢或較容易解決。中美共同利益即解決朝核問題，故習近平與聯合國、美國共同制裁北韓，再個別與兩韓加強關係。這是中國合理化自己的「大國」行為，這一特徵是「建構主義」無法完全解釋的部分，須回到「現實主義」重視大國關係、權力平衡及結盟需要予以解釋。中共始終都不希望朝鮮半島發生戰爭。

最後，美韓、甚至加上日本的合作力量消長，勢必影響中共的勢力延伸範圍。中共與北韓維持「兄弟」關係，仍是對中共較有利。而至於個人層次部分，年底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為何，並不會使北韓停止進行軍事挑釁，但其結果、即領導人所採取的北韓政策將會影響北韓軍事挑釁的強度與頻次，當然也牽動著中共必須調整其對應舉措，以符國家核心利益與安全。

戰略文化與共軍心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系博士生 林靖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系研究所博士生 張書屏

摘要

本文以共軍為利益團體的角度出發，探討對共軍心戰戰略文化的形成及對於共軍心理作戰的影響，採用戰略文化與心理作戰將產生彼此建構的觀點，認為共軍的心理作戰與戰略文化，受到利益團體、保守主義、黨的領導與科技發展等項影響、展現戰略文化與心理作戰的交互建構性。

然而其戰術性心理作戰，隨著中共國際地位的提升與作戰成本的上升因素影響下，共軍為了保持利益，漸漸偏向戰略性心理作戰模式發展，而孫子兵法內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先勝」、「後發先至」與「上兵伐謀」，給予共軍發展心理作戰戰略文化底蘊，最後本文提出共軍如何實施心理作戰，須維持的共軍利益核心，中共內部其他單位發生矛盾的行為，共軍新型態的心理作戰模式為何，作為本研究的貢獻。

關鍵詞：戰略文化、政治作戰、心理作戰

壹、前言

現實主義學派的學者，帶著特定框架去解構世界的國際政治，分別為無政府狀態、生存是國家存在的主要目標，為了確保這個目標，需要具備個別軍事力量，成為彼此傷害或是摧毀提供了資本、國家之間無法確知其他國家的意圖及大國是理性的行為體，而從古典現實主義者摩索根（Hans Joachim Morgenthau）、卡爾（E. H. Carr）、華茲（Kenneth N. Waltz）到較為現代的米爾頓海默等現實主義者，⁶⁵對於國家之外的行為者的不信任與對於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成為該學派的特色。

自由主義流派的學者，認為國家是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行為者，國家之間存在的差異將會影響國家間的合作關係，但好的國家間會存在合作關係，而合作的觀點將成為自由主義流派內的核心，其中國際建制主義者認為，國家之間的合作，不是單一霸權加給個別國家的，如同基歐漢認為能從制度與法規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家之間的權力追逐，以合作的方式來修補現實主義者對於國際間國家的競爭狀態。而吉爾平（Robert Gilpin）則認為國際中應該存在特定霸權，而其他國家則享受該霸權國家帶來的穩定與經濟利益。然而國家之間的合作，存在理性選擇的侷限，如同基歐漢（Robert Keohane）用以分析國家間的互動時，認為國家的行為在合作上，存在自願性與政治及道德上的義務差異。⁶⁶

然而在前述的研究者觀點上，存在物質因素為競爭或合作的核心觀點，在建構主義者認為存在非物質因素來影響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首先便挑戰了現實主義者認為的無政府狀態。而溫特認為無政府狀態存在至少有三種狀態，而非單一狀態。而面對理性的觀點上，溫特（Alexander Wendt）也認為必須將意願與信念納入行動動機。⁶⁷

現實主義學派的學者，在國際政治內的國家行為時，為了簡化變數彼此的關係，常常將國家視為一個個體，用如此的角度不但有助於強化國家行為與國家間的關係外，更能夠反射國家中心主義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強度。從自由主義學派開始，出現權力分散的討論，從國家為中心轉換到將權力交給國際組織或建制上，影響國家權力的分散想像，從國家為中心的角色漸漸分散到國際建制或組織，而使得國家之間的競爭，從外交與安全領域，擴散至合作與談判等後現代色彩，到了建構主義，開始認為權力的本身會受到實踐的影響，加入了文化或者規範等其他實踐因素，一再挑戰國家中心主義的國家對外行為。

傳統上將國家視為一個整體的來討論，是為了簡化國家行為僅由國家主體控制的單一性，但事實上國家也是很多組織集合起來的個體，再做成對外的決策或行為時，受到許多不同組

⁶⁵ John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而、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頁 58-59；77-79。

⁶⁶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7-68

⁶⁷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3-115

織行為來主導或影響，美國學者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用以分析古巴危機時，便指出影響國家決策的區分為理性能動者模式（Rational actor model）、組織行為模式（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odel）及政府治理模式（Governmental politics model）等三種模式，⁶⁸認為國家對外行為即使具有單一性，但在行為產生的過程中，非單一而是隨者決策組織的不同，而產生不同決策的結果，使的觀察國家產生行為時，必須要參考不同的政治組織或面對事件發生狀況的過程，才能具體掌握國家決策的行為。

而英國學派中對於國際政治的分析架構，也運用國際組織、國家及人等三個層次來討論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建構主義內透過國際社會的角度，著重於文化對於國際事務的影響。部分研究學者，對於跨國組織或國際企業等其他非國家為中心的行為者的研究，產生對於國際政治的國家中心主義產生更多元性的討論，這些都是脫離傳統上國際政治將國家視為一個整體，挑戰國際行為中的國家中心主義，更甚者含括非國家的組織的行為理性與影響國際政治的方式，產生更多元的國際政治討論角度。

對我國來說，中共研究含有更深層的意涵且具有多重的意義。兩岸有歷史、文化、軍事、國家發展、地緣政治及兩岸交流等層次的豐富意義，在軍事層面，中共對我的威脅甚鉅，如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2019年1月《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重申未放棄武力犯臺選項。中共於國防報告書中，指稱我放棄兩岸交流，⁶⁹且中共的軍事戰略原以「積極防禦」為核心思維，在2015年調整為「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之戰略方針，向外表達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及打贏戰爭決心，由「被動反擊」逐步走向「主動先制」。⁷⁰於此戰略轉變下，加上我國位於第一島鏈的中心位子，基於中共崛起、地緣政治及中共戰略轉變等多重因素，中共現今對於我國防衛固守的軍事戰略上及軍事及經濟支持下的的地緣政治，已經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故研究中共的軍事行為的特殊意義朝揭在目。

而中共國家對外的行為上，研究的領域甚廣，要選擇何種行為才能夠凸顯中共對外的決策的單一性並非可由國家理性主導，而是具有組織競爭與組織理性的色彩，於是本研究將共軍視為一個利益團體，具有獨特的組織文化，而共軍對外的行為上，採取心戰行為來凸顯與外事單位的不同，加以討論共軍的組織文化與行為，與中共在外事部分所產生的矛盾，去論證國家整體的理性外，存在組織間的競爭，再者論述共軍的心戰行為已經跨越到外事行為，但如同部分研究指出，限縮於軍事領域部分。最後則以相互建構性來討論，文化對於共軍的影響，提出構成因素的思考，成為本研究的貢獻。

本文在本體論上，以共軍的組織及行為為核心，認識論上採取實證主義的研究途徑，加以強

⁶⁸ Allison, Graham T. Zelikow, Philip.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Little, Brown Boston, 1971.) pp. 4-6

⁶⁹ 丁揚，〈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社》，2019年7月24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檢索日期：西元2020年6月9日）。

⁷⁰ 國防部，〈中華民國108年國防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2019），頁30。

化共軍的獨特性以及如何影響中共的對外行為，而在方法論上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歷史分析法，試圖勾勒出屬於共軍的利益及戰略文化，作為本文的研究貢獻。本文認為共軍具有獨特的戰略文化以影響其對外的行為，其來源自物質、歷史與世界觀等因素影響到戰略文化的形成。在認識論上將從孫子兵法內，敘述共軍心理作戰的脈絡，並且對與後發經驗內的與物質及非物質因素，與戰略差異等層次，導出不同於西方文化下的心理作戰行為，而戰略文化的特殊性，再返回影響方法論層次內討論。就本體論的角度而言，本文認為文化間交互觀點，將是形塑戰略文化差異的原因，且會影響心理作戰選擇，形成共軍特殊的心理作戰戰略文化。其層級包括了戰略性心理作戰及戰術性心理作戰等項，而其中戰略性的心理作戰，便是結合了外事行為的心理作戰，賦予戰略性心理作戰更豐富的意義。

貳、心理作戰與戰略文化

一、戰略文化

什麼是戰略文化，就本文而言戰略文化就是一組偏好，會影響戰略的產生及後續作為。為何要研究中共戰略文化，很重要的一個動機就是因為中共被認為是獨特的，如果不考慮中共的戰略文化，將不能瞭解中共的戰略行為。⁷¹中共在選擇性學習美國為首的西方戰力時，拒絕接受其軟體（政治、經濟及文化），未來提升軍力之後，仍在美國或西方列強中獨樹一格。⁷²舉例來說，以象徵主義角度解釋，中國古代用兵的目的，在於維護朝貢體系存續與天朝形象等，而並非是現實主義的考量，因此有獨特的戰爭目的。⁷³以「拿來主義」結合中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概念，認為西方世界將中共類比為蘇共犯了根本上的錯誤，並且認為王朝統御及宮廷政治才是中南海的體。⁷⁴中國人對於國際關係的看法，部分是延續著他們在人際關係上的規範。⁷⁵以上討論的各點，實際上便是顯示在相同物質等級或條件下，中共本身顯示出不同於西方的文化特性，更延伸出中共戰略文化上確實存在異於西方的特性，並且足以影響對外的行為。如果在文化的核心影響下，將產生戰略行為受到文化影響的結果。當能夠掌握這個脈動後，便可以解釋及預測共軍的心理作戰行為。

共軍的本質上是黨軍，結合政治學相關研究，本文將其視為政治利益團體。從習近平上台後便更新了對於共軍的要求，隨後產生：「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前述即成為習近平時代的共軍存在與價值。起因於共軍本身的黨軍身分，故在軍事的期許即「打勝仗」

⁷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xi-xii.

⁷² David Lai, "The Agony Of Learning :The PLA' S Transforma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Carlisle : U. S. Army War College, 2012》, PP. 338

⁷³ Jonathan R. Adelman & Chih-Yu Shih,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war in Chinese politic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3), p. 27-30.

⁷⁴ 范疇，《2020 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臺北：八旗文化，2019 年），頁 212。

⁷⁵ 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年），頁 182。

外，中共還賦予了其他的文化因素及政治偏好，在近代史上也存在相關的案例，例如韓戰或越戰時，美國等國家追求的國家利益，不是作戰勝利而是更高的層次利益，故不能排除國家利益中確實包含作戰勝利，但作戰勝利不能涵蓋國家利益。國家軍事力量受到軍事戰略或戰術行為的影響，故研究軍事力量及軍事威脅的同時，應該重視現階段的軍事戰略或戰術行為，這樣的觀點也代表軍事戰略確實受到當時國家戰略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或偏好，將影響到戰略行為的選擇。而軍事戰略又受到政治的指導與決定，就軍事戰略上的意義只有唯一的利益，便是貫徹國家戰略。然而在共軍更存在「軍隊國家化」表示，代表軍隊是屬於國家的政策工具，中共要求共軍又紅又專，「專」（專業能力）是職於軍事戰略及作戰勝利的目標上，然而共軍除了這一層考量外，還需要擔負起「紅」（政治可靠），即為服從黨的領導，在這樣的時空下，突然會有軍隊到底是屬於黨還是屬於國家的辯論，當然中共內部也透過一系列的論證，認為共產黨能夠代表人民的先進利益，如江澤民時期的「三個代表」說。共軍避開是維護黨的利益還是國家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產生不同與民主國家，軍隊是維持國家利益的觀點，代表在共軍內文化並非只有作戰勝利或國家利益，更被賦予黨軍與維護中共利益的想像。

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建構主義者認為，觀念和物質因素並非並列的關係，而是在某些觀念中，觀念將會建構利益，於這些觀念就不能和利益並為相同地位。⁷⁶對於國家來說，除生存之外，還必須要有其他三種利益：1、有能力控制資源分配與選擇。2、保護國家的資源基礎。3、對自我有良好感覺的需要，對尊重和地位的需求，也就是集體身分。⁷⁷這個觀點揭開了在物質因素之外，團體內確實存在非物質的因素，也如同軍隊打仗的士氣必須要被維持，而士氣的維持一部分維繫在物質因素，這樣的觀點同於前述的本體論討論部分，學者瓦達佛斯（Aaron Wildavsky）必須認為士氣本身獨立存在且可以被影響。國家就不能單純由物質來支配，必須要有物質之外的其他因素來影響。如同自我利益是對於自我實現的偶發性認知，這些需求是在具體情境中和他者的關係所激發，自我利益是由文化構建而成的。⁷⁸所以當共軍在實施心理作戰的時候，也將會有被文化建構的利益，而這些部分將會限制或約束其心理作戰行為必須符合文化特性，而這樣的角度也能解釋為了即使作戰勝利的目標之下，也會有戰略退卻或轉進等與作戰勝利略有不符的行為產生。而共軍的心理作戰作為是否有如此的狀況也是後續檢證的項目。

斯耐德（Jack Snyder）使用了「戰略文化」這個概念，來分析冷戰時期美蘇兩大軍事強權之間的戰略偏好差異。戰略文化是由戰略共同體之間共享的信念、對感情的制約，以及行

⁷⁶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3-115.

⁷⁷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n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id, & A.F.K. Organi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1) pp. 238-240.

⁷⁸ Aaron Wildavsky,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s: Uses and limita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6, Issue 2, (1994), pp. 131-159.

為模式等構成的整體。⁷⁹對而學者江憶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指出，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在聖王賢君的黃金時代，會以強調仁慈公正及高尚的政府安全論述的孔孟范式，強調以提供對手合法性及物質財富來使潛在敵人臣服，以加強其中國對外政策的例外論點，但實際上中國是以強調備戰及強現實政治的范式，透過《武經七書》中，關於進攻性、先發制人的戰略偏好排序上，顯示出較高的一致性，意指中國在軍力強盛的時期的戰略文化，會比軍力較不強盛時期更具有進攻性，⁸⁰黃浩恩認為戰略文化呈現國家如何應付外來威脅的行為模式偏好，⁸¹而這樣的思想也繼續融入 1949 年後的中國，繼續影響中共對外的衝突管理模式。後續本文以江式對於戰略文化的將有序性戰略及戰略文化對於行為之間的關係，如同卡氏認為環境結構會影響認同，而認同將會影響政策，而政策也會重新建構問話和制度的結構。⁸²

楊仕樂 (Yang Shin-Yueh) 也對於中國的戰略文化做出解構及分析，認為中國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及文化道德主義，是有其特殊物質主義的背景，但結果與西方部分觀點無異。⁸³認為戰略文化是政軍菁英們所分享有關戰爭與暴力的共同理念，其中包括大戰略及戰略層次。林廷生 (Ting-Sheng Lin) 認為戰略文化並非獨立的因果關係，而是有助於理解戰略偏好選擇的意義脈絡，認為在海洋戰略下的中共海軍，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及維護中共的主權，並非以擴張主義的進攻型海軍為目標。⁸⁴學者譚傳毅認為共軍受到毛澤東的影響，好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戰略指導，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偏好，從政治目的出發、透過謀略影響戰爭目標，實施攻擊或防禦內容的威懾，以支持政治目的。⁸⁵並與孫子兵法的奇正相呼應。學者雷霆 (David Lai) 認為中共也存在「後發先至」的傳統，即是以估算的反應與遲疑行動取得戰略決勝，可以追溯自《孫子兵法》。而在 2019 年的新時代的國防，仍強調「防禦型的國防」。⁸⁶但僅存在戰略層次，戰術層次受到毛澤東十大軍事戰略影響甚深。⁸⁷與楊氏認為中共內部存在不同於西方的戰略文化觀點相同。

⁷⁹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 p.8.

⁸⁰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Katzenstein PJ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79-180

⁸¹ 黃恩浩, 〈爭論中的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51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頁 95-127。

⁸²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d, & A.F.K. Organi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1) pp. P18.

⁸³ 楊仕樂, 〈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 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8-230。

⁸⁴ 林廷生, 〈解放軍的現代化與戰略文化:「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與解釋架構〉,《全球政治評論》,第 50 期,2015 年,頁 49-70。

⁸⁵ 譚傳毅,《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攻與防》(臺北:時英出版社,1999 年)頁 33。

⁸⁶ 丁揚,〈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社》,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

⁸⁷ 金虎,〈毛澤東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www.mod.gov.cn/big5/education/2015-09/09/content_4619684.htm。

戰略文化的是一組價值，而這個價值來源於世界觀、歷史或物質等因素，且會影響到後續戰略的進行或選擇，將會在團體內形成偏好。再者，戰略文化除了和戰略會產生交互影響的結果，產生物質與非物質間的關聯外，也會持續性的交互影響，進而去產生特定的偏好，就本文而言認為戰略文化會影響到共軍心理作戰手段的選擇，當然也會影響到國家戰略的制定，這一個層次將放在戰略性心理作戰來討論，但著重在共軍的部分，達切合研究主題的目的。最後，戰略文化有其脈絡性，可能會產生跨越時間或個體之間的比較，但不外是有無影響到戰略的制度或行為的選擇。

二、心理作戰

心理作戰在我國戰爭史上，並不是新穎的觀念，早在中國歷史內的楚漢相爭時，便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及「楚歌四起」的著名故事，代表心理作戰在我國歷史中並非新穎的概念，而文化中更偏好「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及心理作戰目的，相關的研究也使的心理作戰的定義愈加明顯。

美軍相關的心理作戰規範與討論如次：心理作戰是對外在群眾傳達所選擇之資訊和指示器，以影響其情緒、動機、客觀理性和最終的外國政府、組織、群體和個人的計畫性作業⁸⁸。心理作戰是計畫性地傳達選定的訊息與指示物給外國的閱聽人，來影響他們的情緒、動機、目標，最後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行為。⁸⁹根據計畫執行的作戰行動，將選定的訊息即指示傳達的給國外群眾，以影響其感情動機、目標，最後影響國外政府。⁹⁰首先美軍的心理作戰，呈現出不同於我國文化下的美軍的概念，存在計畫性的作為，並且影響的目標從個人、組織、群體出發，落向該國政府行為，其核心不僅於個別戰場上決勝，而是企圖將個別戰場的勝利，最終結合成為美國政府的勝利，再者，影響的標的則為受眾的情緒、動機、目標等，綜上可以觀察到，重視計畫性、並且清楚揭示影響的目標與最終的目的，以符合科學化的要求。

我軍相關的心理作戰規範及討論如次：運用一切足以影響心理的方法，從精神意志上致勝敵人的戰鬥行為。⁹¹運用一切足以影響心理的方法，打擊敵人的心理，動搖敵人的意志，促使敵人心理情緒發生變化，精神意志隨之崩潰，引導其歸向我方的一種無形而最重要的戰法。⁹²心理作戰是攻心作為，以目標對象的心理為戰場，以智慧為武器，以情報為依據，從精神意志上去主導，轉化或鞏固目標對象的心理與行為，使有利於我作戰。⁹³心理作戰是以心理學原則做基礎，以情報為依據，有計畫地運用各種方法，以摧毀敵軍士氣，瓦解敵軍作戰意志，

⁸⁸ U.S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2-5.3, Doctine for join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 (U.S: Alabama 1999). P1-1

⁸⁹ 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Doctine for join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U.S: Washington DC, 2003). P1-1

⁹⁰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美國國防部軍語詞典》（臺北：國防部，1995年）頁517-518。

⁹¹ 國防部，《國軍軍語詞典》（臺北：國防部，2004年），頁3-1。

⁹² 國防部，《國軍軍事思想》（臺北：國防部，2003年）頁5-22。

⁹³ 國防部，《政治作戰要綱》（臺北：國防部，2007年）頁3-9。

以達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一種戰法。⁹⁴雖然本文並非比較美軍與我國相關思想的差異，但可以見到我國的心理作戰思想，偏重於哲學的層次，不強調目標與作法，而偏向是哲學層次的思考，而心理作戰的目的為使敵人來歸等層面，與美軍最終目標是影響該政府的作為不同，最後強調在精神意志上去致勝敵人，這樣的概念包含的心防作為的部分，必有戰略文化上的意義。

在對敵實施，武力打擊的同時，開展高強度的心理作戰，瓦解對方，鞏固己方，實現兵戰心理作戰一體化，促成戰爭形勢轉化，才能奪取戰爭主動，保證以劣勝優總體戰的實施。應當從戰略高度認識此一問題，從力量建設到戰法運用，從技術手段到心理作戰謀略，從平時戰備到組織實施，從心理作戰進攻到心理作戰防禦等方面，儘快建立起具有我軍特色的心理作戰理論體系。⁹⁵代表在中共面臨國際情勢丕變，作戰態勢轉變時，確實要發展屬於中共特色的心理作戰方式，該階段還沒有辦法確認中共是否將採取「拿來主義」，但可以確定中共對於拿來主義，並不是相當熱衷。中共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紀載當還沒有心理作戰的詞彙時，相似的概念是「瓦解敵軍工作」，以「不採取資產階級慣用的造謠污蔑、欺騙行詐等手段，而是宣傳革命真理與戰爭的正義性，揭露對方的反動面貌，促使敵軍官兵覺醒」。⁹⁶該觀點加入了「義戰」為核心的宣傳內容，但以現今的觀點，對於敵人而言都有戰爭的理由，而做出後續所謂欺騙與威攝等，與義戰的觀點有無衝突，尚待商榷。然在兩次波斯灣戰爭帶給中共軍隊的啟示後，共軍的心理作戰也產生了質量上的變化，走向從傳統的「統一戰線」、「指揮謀略」、與「瓦解敵軍」觀點，到其後的「大心理作戰」、「第四種戰爭」、「大戰略背景下的心理作戰」，顯示其心理作戰的研究圈正逐漸形成。⁹⁷與其俱進的中共確實走出自己的心理作戰文化。遲振海、汪玉軍認為心理作戰就是利用各種手段對敵實施心理攻擊和瓦解、對己進行心理防護和激勵、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政治和軍事目的的一種有效作戰樣式。⁹⁸王建華編著的《信息技術與現代戰爭》書認為「所謂心理作戰，是指以人的心理和思維為目標，運用心理學的原理，通過各種方式施加刺激和影響，迫使其心理活動受限制於某預定的範圍，從而實現在心理上摧毀敵人意志的一種作戰方式」。⁹⁹沈偉光在《新戰爭論》書中指出：「心理作戰，主要體現為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即通過信息傳播，從精神和心理上腐蝕瓦解對方的人民及軍隊，求得不戰而勝或少戰大勝。心理作戰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既在平時也在戰時進行的戰略性心理作戰，一種是通常在作戰地區進行的戰術性心理作戰」。¹⁰⁰在這裡可以得知中共部份學者也運用了執行及影響層級外，也將時間作為劃分標準，來區分心理作戰存在戰略與戰術層級的不同。張魯征認為心理作戰是以各種形態的資訊媒介作為武器，對敵人從

⁹⁴ 國防部總政戰部，《國軍心戰手冊》（臺北：國防部，1994年）頁1。

⁹⁵ 解放軍報，〈心理作戰已經扣響戰略大門——新軍事革命與心理作戰學術研討會〉，《解放軍報》（北京市），1998年3月10日，第6版。

⁹⁶ 孫波、李慶洲，〈心理作戰〉，《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II）（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頁1115。

⁹⁷ 郭雪真、洪陸訓，〈中共心理作戰的研發與戰備〉，《復興崗學報》，第89期，2007年，頁5。

⁹⁸ 遲振海、汪玉軍，〈心理作戰、心理武器、心理訓練〉，《解放軍健康》（濟南市），2003年5月，頁14。

⁹⁹ 王建華編著，《信息技術與現代戰爭》（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4年），頁85。

¹⁰⁰ 沈偉光，《新戰爭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25。

思維、情感、理智到觀念、立場、態度等全部心理要素進行攻擊，造成敵方意志和士氣崩潰，指揮決策紊亂，軍心動搖，戰鬥力受損的作戰樣式。¹⁰¹童天認為現代心理作戰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經濟和軍事目的，以綜合國力為基礎，運用以資訊技術為核心的高技術手段，從全局上爭取人心、遏止對手、團結自己的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國際鬥爭手段。¹⁰²郝唯學、趙和傳認為心理作戰是根據軍隊戰略意圖和作戰任務，運用特定信息和媒介，通過理性宣傳、意志威懾和情感引導，對目標對象的心理及行為施加影響，促進政治、軍事鬥爭目標實現的作戰行動。¹⁰³雖然郝與趙氏認為心理作戰是理性宣傳，但這個理性宣傳又與意志威懾及情感引導有所衝突，應僅指理性宣傳為手段及方法上的理性，也就是方法論上的科學化，而並非宣傳內容的理性，就宣傳內容上應該採後說，以意志威懾和情感引導為主，方能動搖個人意志。李小光，周守珍認為心理作戰研究應包括組織、群眾、信息與媒介，環境及效果，並且指出近十年的研究心理殺傷減員，已經從二戰期間的 7%至 8%提高至 25%。¹⁰⁴宋華、黃正東、陳乙敏認為心理作戰已經更細分為震懾性、謀略性及利誘性心理作戰，隨後的發展將會朝向資訊化及全景式的心理作戰方式，並且干擾敵人的 C⁴ISR，破壞對方資訊系統和資料庫；利用電腦網路系統對敵方國家首腦、軍隊決策者和某一作戰行動的關鍵人物實施「資訊綁架」或「信息欺詐」，¹⁰⁵達到作戰勝利的目的。

共軍對於心理作戰的認識，不同於美軍的不同文化觀點，本文認為中共相關研究認為心理作戰是一種防禦性的工具及心理作戰應該結合入軍事或國家戰略作為的特色，然結而既然結合入國家戰略作為，便會產生出使用時期的問題，如果在平時如何使用心理作戰，而名稱還能叫做心理作戰，如果換湯不換藥之下，能不能認為以國家力量的作為，都很難排除非心理作戰的新維呢？再者，就心理作戰程序及方法上，中共認為心理作戰的決勝戰場在於心理層面無誤，關鍵在於如何使用時，也談論到要特定信息及媒介，最後影響對方的心理，但為什麼要影響對方的心理，最後的目的是什麼便沒有清楚描述，或許也是為了保持爾後運用的主動性，但就本體論上而言，將會產生模糊效果，也就是未釐清心理作戰的目標下，就不容易形成強而有力的效果了，其次，本文認為中共並沒有獨立於單獨使用心理作戰的思想，並非認為共軍沒有將心理作戰排除在特定物質條件去執行，而是期待發揮更佳的效果為前提下，認為心理作戰不能獨立於其他條件之下，這點與美軍的思想是截然不同，而近於我國的心理作戰思想。然而在心理作戰的結果上，應該是有受到美軍兩次波斯灣戰爭後的影響，漸漸地脫離了哲學層次的思考，而走向了效用的分類，所以才會產生三種不同結果的心理作戰差異，但核心為以敵人的心理與改變的敵人的認知為目標戰場，但於此即使面對謀略性的心理作戰的概念下，必須由研究者自行結合戰略或戰術層級的差異後，才能導出不同效果的心理作戰

¹⁰¹ 張魯征，〈對提高軍隊心戰能力的思考〉，《軍隊政工理論研究》（南京市），2001年6月，頁59。

¹⁰² 童天，〈心理作戰在現代戰爭中的運用〉，《飛航導彈》（南京市），2005年，第10期，頁17。

¹⁰³ 郝唯學、趙和傳主編，《心理作戰講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頁10。

¹⁰⁴ 李小光，周守珍，〈預備役部隊心理作戰運行機制探析〉，《華南國防醫學雜誌》（廣州市），第28卷第5期，2014年5月，頁481。

¹⁰⁵ 宋華等，〈現代心理作戰致傷特徵與思考〉，《華南國防醫學雜誌》，第18卷第3期，2004年，頁11。

結論，我國也有類似的問題，因我國六大戰的概念，也是一個整體不可劃分，即使劃分也會產生六戰總體運作及交互影響的思想，結合層級化的思考，產生了國家層級的政治作戰與軍事層級的政治作戰，而其運用與方法上又非詳細揭櫫，或需要相關研究者解釋後，才能清楚明白，本文認為這點上我國與中共的心理作戰概念，同時兼具心防與心理作戰例證。而美軍因為屬於攻勢現實主義的攻勢戰略，其心理作戰是計畫性的作為，然而在戰略溝通興起後，足見美國的心理作戰概念也產生一定程度的進化與成長。最後要討論到的便是心理作戰中的欺詐，到底與義戰及聲譽的關係，在共軍稱為資訊詐欺或情感引導，我國概可稱為精神意志主導或改變，美軍概可稱為影響動機情緒及目標，但不論其名詞為何始終繞了改變敵人心理意象為目標，可是差異性則在於強調「假」與「詐欺」等，此點與我國及美軍略有不同，代表各自的戰略文化也略有不同。

參、共軍心理作戰與戰略文化

策略（Strategy，我國翻譯為戰略）角度言之，從薄富爾的著作「戰略緒論」中，提出戰略區分層次的思想¹⁰⁶，引申為戰略執行上為了集中資源及產生特殊目的與發展方法，必須要區分層次或功能以應系統性思考。

而共軍重視宣傳具有重要關鍵，從口號到編成歌曲，再再都是利用心理作戰場決勝，其中《紅星照耀中國》對外國媒體及西方各國影響更是深遠。¹⁰⁷在「人民戰爭」的作戰思維中，宣傳更成為爭取「先勝」的重要工具。到今天中共重視宣傳的程度，除了從學者的研究中可以觀察到外，從政治局常委中設了專門類別來管理中共的宣傳工作，¹⁰⁸便可以知道宣傳工作對於中共政權存在的重要性。

一、共軍的組織與文化

共軍是中共內部的一個利益團體，¹⁰⁹具備了利益團體全部的條件及共同分享一套價值與觀念，並與其他利益團體處於爭奪資源的競爭狀態。1941年編於我政府軍的共軍（新四軍）拒絕我軍事委員會要求其將部隊撤向長江以北的最後通牒，但也沒有服從中共中央當時自延安發布的命令來渡過長江，導致該軍與我方交戰後被摧毀了一個師。¹¹⁰共軍在中共建政的過

¹⁰⁶ Andre Beaufre 著，紐先鍾譯，《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 (臺北：麥田出版，1999)，頁 188。

¹⁰⁷ 矢板明夫 著，鄭天恩譯，《人民解放軍的真相：中共 200 萬私軍的威脅、腐敗與野心》(中國人民解放軍 2050 年の野望-米軍打倒を目指す 200 万人の「私兵」) (臺北：八旗文化，2019)，頁 80-82。

¹⁰⁸ 目前由王滬寧擔任，而且王還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加上其與習近平關係，便可以知道習近平對其信任及對於宣傳工作的重視。

¹⁰⁹ Isaac B. Kardon and Phillip C. Saunders, "Reconsidering the PLA as an Interest Group"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4-35

¹¹⁰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

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並且回塑共軍對於自己的認知。中共成立之初將武裝力量稱為紅軍，強調以軍扶共的政策，如中共長征初始將紅軍編成兩個軍團為主體的長征隊伍，掩護在後的軍委縱隊及中央縱隊。¹¹¹而學者方萬德（Van de Ven, Hans J）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文化運動是帶有軍隊色彩。¹¹²加上共軍在文化大革命中呈現的特殊地位，指明共軍在中共內的保守及特別意義，賦予共軍對內的穩定及鞏固心防符號。共軍為了維持自己的利益，在各軍事議題上擁有自主權的體制面慾望，¹¹³而這樣的態度常常也跟中共內部的文職官員有所衝突，¹¹⁴故以共軍為利益團體的觀點，其與同組織內的其他利益團體產生競爭，以爭取後續的資源分配，而在對外行為上，目前主要的競爭對手就是中共外交部。中共對外行為制度上由中共外交部及共軍內的前總參謀部等負責，¹¹⁵在共軍觀點內，因中共外交部是正部級，其位階低於共軍總參謀長，於是在面對共同問題時，共軍內部評論中共外交部的層級不足，而這樣的差異是非常在意，而且認為外交部只是一個行政部門，在戰略問題上短視且政策不連貫，只重視雙邊及多邊利益。¹¹⁶從這樣的評論中，認為共軍與中共外交部之間產生利益團體的競爭時，共軍在某些議題上與中共外交部持不同立場。2011年因美國販售武器給我國，中共外交部就認為應該要斷絕「中」美之間的軍事交流，而共軍認為應該要避免為了維持中共核心利益，應採取巧妙的手段來保持彈性及調整空間的方式因應，而不是斷絕軍事交流。¹¹⁷共軍與中共外交部的互動，共軍內部沒有任何組織具有權責定期且通報將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共軍相關活動。¹¹⁸中共外交部卻負有部國軍劃屬與軍隊負有的職務。¹¹⁹而更早的研究指出，共軍與中共外交部的溝通協調，交由中共中央外事領導小組負責，即共軍派高層軍官參加政策討論，但彼此政策的歸屬及分工，被認為無法清楚釐清，而且共軍對於外交部採取有關本身利益的行為時，或是被認為有削弱或損及在國際間影響力或聲譽的行為，導致共軍內存在不同

4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40-67.

¹¹¹ Jonathan Dermot Spence 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Third Edition)）（臺北：時報出版，2019年），頁220-222。

¹¹² van de Ven, Hans . Harold,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298

¹¹³ Isaac B. Kardon and Phillip C. Saunders,” Reconsidering the PLA as an Interest Group ”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 ed , PLA Influence On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44-45

¹¹⁴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W. Harold,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Routledge) Asian Security 9, no. 2 (May-August 2013), PP. 111-131

¹¹⁵ 還有武警部隊（PAP.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及後續成立的海軍單位。

¹¹⁶ Eric Hagt, ” The Rise of PLA Diplomacy”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 ed , PLA Influence On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P. 235-236

¹¹⁷ Eric Hagt, ” The Rise of PLA Diplomacy”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 ed , PLA Influence On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P. 237-238

¹¹⁸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Role in China’ s Foreign Policy and Crisis Behavior,”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 ed , PLA Influence On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P. 147-148

¹¹⁹ 如負責國際軍控、裁軍、防擴散等領域工作，研究有關國際安全問題，組織軍控方面有關條約、協定的談判。

的聲音。¹²⁰ 2007年1月11日共軍試驗的反衛星武器，擊毀了位於太空中的中共衛星，美國政府與中共政府確認時，中共政府的反應非常冷淡，隨後才由黨營媒體宣傳及中共外交部12天後才確認此事。¹²¹ 在2010年6月8日環球時報，解放軍報刊播共軍對美韓在黃海將實施軍演發表嚴厲措辭的內容後，中共外交部才在同日呼籲雙方冷靜克制，避免緊張情勢升高，並且隨者後續輿論發酵，又在6月22日再次呼籲各方保持冷靜，採取克制避免做出始緊張惡化並傷害商去各國利益的舉動。¹²² 2008年溫家寶指揮成都軍區的兵力，意圖使成都軍區兵力馳援汶川地震，但卻只有圓鋤十字鎬等工具，但後續被某些共軍幹部認為不懂軍隊。¹²³ 2011年1月殲20戰機的首度試飛，當時中共領導人胡錦濤與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Gates）面見時，被問到該戰機試飛活動時，卻展現出一無所知。¹²⁴ 於此本文歸納出共軍基於利益團體的影響下的戰略文化便是在對外行為上主動爭取績效、以利資源競爭，甚至有時會出現近乎脫序的行為。在在證明共軍在中共外交事件中或部分政策上，確實成為外國與中共外交部斡旋或討論的議題。¹²⁵

學者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認為共軍將運用傳統概念下的關係性「關係性實力」（Relational Power），持續影響中共在相關性的政策上，去符合共軍的利益。¹²⁶ 而在中共又紅又專的政策下，共軍被國內文人轉向專注於國防相關方面的議題以遠離中共的國內政治，達到「黨指揮槍」。而學者辛西亞（Cynthia A. Watson）認為，這樣的專業化將會產生共軍在自身利益受到攻擊的時候，認為這些利益與中共無關，軍方仍必須有所行動。¹²⁷ 意指共軍即使在未能判明該行為對於中共是否只有利益下，仍會有所行動。從1974年1月14日西沙海戰的時，便開始非中共計畫性的在南海內發生衝突，隨後中央軍委會才將指揮權統一由廣州軍區調度，並且到19日才由鄧小平名義上下令還擊。1967年9及10月中共與印度的邊境衝突中，在沒有經過中央軍委會核准下，共軍部隊向正在搭建鐵絲網的印度士兵開火，造成了

¹²⁰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RAND, 1998》, PP. 31-33

¹²¹ James Mulvenon, "Rogue Warriors? A Puzzled Look at the Chinese ASAT Tes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oover Institution), no. 20, (Winter 2007), PP. 1-2

¹²² 中共外交部,〈2010年6月22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舉行例行記者會〉,《中共外交部》,檢索日期:西元2020年4月25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710763.shtml。

¹²³ Nan Li, "The PLA and the Party-State"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P. 127-128

¹²⁴ Elizabeth Bumiller and Michael Wines,〈Chinese Army Test Jet as Gates Visits〉,《The News Youk Times》,檢索日期:西元2020年4月25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1/01/12/world/asia/12fighter.html>。

¹²⁵ MIHIR BHONSALE, "Understanding Sino-Indian Border Issues: An Analysis of Incidents Reported in the Indian Media", 《New Delhi: ORF, 2018》, 2018年2月, P. 14

¹²⁶ M. Taylor Fravel, "The PLA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Insights from China'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P. 250-251

¹²⁷ Cynthia A. Watson, "The PLA and the Taiwan Issue"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2-213

印方 36 人的死亡。¹²⁸1988 年時共軍海軍提出要佔領南海的九個島礁計畫，隨然後續被中共中央拒絕，¹²⁹並且在總參謀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違反了不率先開火的指導方針。¹³⁰，在部分行動中共軍認為沒有權限或責任要與中共內部其他單位協調的說法。¹³¹而這樣的維持共軍利益的行為，已經成為了共軍的戰略文化。

二、共軍對外的行為與利益

而心理作戰如何影響共軍的戰略文化呢？學者李楠（Nan Li）認為共軍需要利用軍方媒體宣傳保守主義，以推行共軍的保守主義立場。¹³²以符合共軍的利益，如由《解放軍報》社於 1993 年創立《中國國防報》，現由中共中央電視台 CCTV-7 發送軍事節目，以推行對於共軍有利的話題。¹³³而《解放軍報》對於部分議題而言，的確偏向更保守的立場，而這樣的立場，也加固了戰略文化的想像，如對於南海的問題，傾向於用傳統海疆線來形成歷史主權說法，而《人民日報》包含其他行為者，比較偏好保持模糊空間。¹³⁴2016 年 6 月 17 日習近平到塞爾維亞的首場活動，就是到被炸的中國大使館舊址，憑弔 3 名罹難者。¹³⁵同一日環球時報，也以「這一天是屈辱的一天，而且是中國人就不能忘記等民族主義的詞彙」，來彰顯共軍的保守立場及戰略文化。為何共軍重視將國家安全與軍事價值觀融入社會，乃因為心理作戰的概念產生，除了心理作戰外，還有心理防禦的工作，而人民就是心理防禦的主要目標，更產生用 APP 的方式，讓人民更容易進入國防教育。都是為了推行有利共軍利益團體的政策，該模式便是運用媒體來形塑共軍形象。

在該模式存在後，共軍運用媒體的管道對於發揮關係性的影響力。2010 年 7 月 1 日時任副總參謀長的馬曉天中將就對於香港鳳凰電視台表示，中共極端反對美韓將進行的海上演習，因為這項演習的地點，過於接近中國領海，隨後中共智庫研究者支持該論點的投書隨之而來，

¹²⁸ 王誠漢，《王誠漢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482。

¹²⁹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534 - 535。

¹³⁰ Xu Ge, "Steel Anchors Consolidating Maritime Frontiers: Record of the Republic's Naval Battles" (Beijing: Haichao chubanshe, 1999), pp.300 - 301.;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1997), p.126

¹³¹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in Policy and Crisis"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 148

¹³² Nan Li, "PLA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6-78

¹³³ Nan Li, "PLA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9-80

¹³⁴ M. Taylor Fravel, "The PLA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Insights from China'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 263

¹³⁵ 中央社，〈中國使館被炸 20 週年 官媒：現在誰還敢炸？〉，《聯合新聞網》，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800887>。

後續連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公開反對這些演習。¹³⁶2010 年中共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也公開呼籲北京當局怎麼不能坐視美韓在黃海執行軍演。¹³⁷ 2010 年時中共國防部發言人曾經表達中共對於東海問題上，將會保持「相對應的措施」，¹³⁸ 共軍越來越常利用內部研究機關所做分析，如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設，由中共空軍指揮學院所提出。¹³⁹ 以及容許軍官在重量級報紙上撰寫各種立場及擔任電視評論員等方式，設法影響國安議題的公共討論內容。¹⁴⁰ 彭光謙、羅援、王洪光、楊毅，其中不乏出現與中共不同的政策聲音，¹⁴¹ 本文認為戰略文化影響心理作戰的前提下，出現兩種特色：一、共軍運用自己的媒體，像其人民播送與國防有關訊息，達到屬於中共特色的強化心防作為，但這樣的模式確實是心理作戰的模式。二、共軍偏向比中共其他文職部門，表達更強硬的對外政策（包含對我國的政策），¹⁴² 三、中共在符合關係性實力影響範圍下，利用對外發聲的管道，爭取有利共軍做中共內部資源分配及爭取相關議題話語權，來達成間接影響中共對外政策目的，均為共軍的戰略文化。

三、共軍心理作戰的戰略文化

霍普夫 (Ted Hopf) 認為文化間的相互建構性是重要關鍵，即兩個個體之間會相互影響，產生相互建構的結果。¹⁴³ 延伸來說，便是戰略文化也會形塑心理作戰，而心理作戰也會影響戰略文化，達到彼此影響的結果。

共軍心理作戰初期發展時，戰術性心理作戰是以瓦解敵人戰志為主，如共軍在國共內戰太原戰役時期，印發了心戰傳單，以通俗的「十不得詩」給予我守軍心理震懾，使我軍有 25% 的敵人向共軍投降。¹⁴⁴ 而傳單這樣的狀態，早在共軍編制尚未出現前，於共產黨上海暴動

¹³⁶ Michael D Swaine &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Part Two: The Maritime Peripher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oover Institution), No. 35 Summer 2011, PP. 12-14.

¹³⁷ 人民網-軍事頻道，〈羅援少將深度剖析中國反對美韓黃海軍演的五點依據〉，《人民網》，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42969/58519/12132612.html>。

¹³⁸ 閻紀宇，〈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 納入釣魚台〉，《端傳媒》，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6012>。

¹³⁹ Michael D. Swaine, "Chinese Views and Commentary on the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ese-views-and-commentary-east-china-sea-air-defense-identification-zone>

¹⁴⁰ Jacobson and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weden: SIPRI, 2010》, P. 14.

¹⁴¹ Bonnie S. Glaser, "The PLA Role in China's Taiwan Policymaking,"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85-186.

¹⁴² Bonnie S. Glaser, "The PLA Role in China's Taiwan Policymaking,"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90-191.

¹⁴³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Ted Hop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S.), Vol. 23, No. 1, 1998, p. 199.

¹⁴⁴ 宋華等，〈現代心理作戰致傷特徵與思考〉，《華南國防醫學雜誌》（廣州市），第 18 卷第 3 期，2004 年 5 月，頁 13。

時，就運用傳單來爭取外國人及上海民眾支持。¹⁴⁵而部分文獻指出，共軍配合作戰期程實施心戰喊話，如 1968 年 3 月 15 日共軍於中蘇珍寶島衝突中，對於部分佔領該島的蘇軍官兵喊話，要求撤出該島，但未獲蘇軍理會。¹⁴⁶且在 3 月 2 日第一次衝突期間，對於島上的蘇軍官兵多次發出警告，要求退出島嶼，也未獲得回應。¹⁴⁷在經過喊話無效後，立即升高衝突，而共軍為了珍寶島衝突後的宣傳需要，先行拍攝了中蘇邊境衝突的電影，作為蘇聯侵略的證據。¹⁴⁸但這部電影不僅是記錄 1968 年中蘇的衝突，而是自中共建政以來相關中蘇衝突畫面。1979 年中越戰爭後，中共以小說拍攝了「高山下的花環」及「不該凋零的玫瑰」，用更通俗的方式凝聚民族主義與實施心理作戰。在越南戰爭內，共軍於戰鬥前，反覆對宣傳越南地區霸權主義者對中共的「三視」（仇視、鄙視及蔑視），組織學習戰鬥動員令及戰時立功條例及閱讀越南侵柬埔寨反華罪刑材料、觀看排華展覽，廣泛開展有利共軍作戰的革命英雄主義教育，放映戰鬥故事電影片，教唱《殺敵立功》等歌曲，來落實戰前思想教育。¹⁴⁹共軍也喊話的方式，對於越軍展開心理攻勢，¹⁵⁰對於越南俘虜，則於戰俘營以電影、講演及廣播等心理作戰管道及方式，來對雙方的俘虜及戰鬥的人員實施心理作戰，擴大報導交換俘虜時有利敵軍言論，¹⁵¹作為凝聚民族主義與心理作戰之用。共軍心理作戰模式，起源於國共相爭，經過韓戰、臺海中、印、中蘇及越南戰爭期間的洗鍊，對於心戰，心防以及思想的滲透，以存在純熟及固定戰略文化。2010 年 9 月 10 日到 25 日共軍參加哈薩克、俄羅斯，吉爾吉斯及塔吉克等國家，於哈薩克內歐塔市（Otar）北方 20 公里舉辦的馬提巴拉克（Matibulak）訓練區和平使命多邊軍事演習，於夜間肅清敵基地的科目中，編成一個戰車連、兩個機步排和 05 式心戰車輛，擔任中央主攻隊伍。¹⁵²2017 年共軍與印度在邊境衝突中，也採用了科技升級後的效果，將共軍與印度邊防軍隊的推擠畫面及共軍編運部隊之畫面，作為凝聚與鞏固彼此的民族主義的心理（防）作戰素材。¹⁵³中共的心理作戰模式，仍然以訊息包裝後搭載管道或媒體，最後影響受眾的行為，為共軍發展迄今的心理作戰形態與模式，其中科技的成長作為重要因素，然而其先勝的戰略文化引導下，必須超越戰場與戰場空間的限制，於平時就需要持續宣傳，持續影響受眾的心理，如 2001 年中共的大外宣計畫一般，在承平時就爭取及形塑對於中共有利的認知。

¹⁴⁵ Steve Smith "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 - 1927," 《England, Routledge, 2018》, PP. 158.

¹⁴⁶ 國防研究院敵情研究所編，《「匪俄關係與其動向之研究」參考資料彙編》（臺北：國防部敵情研究所，1969 年），頁 30

¹⁴⁷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出版社，1994 年），頁 123。

¹⁴⁸ 齊辛，《珍寶島事件真相（增訂本）》（香港：集思圖書公司，1969 年），頁 73-74。

¹⁴⁹ 倪創輝，《十年中越戰爭》（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 年），頁 90。

¹⁵⁰ 倪創輝，《十年中越戰爭》（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 年），頁 601。

¹⁵¹ 倪創輝，《十年中越戰爭》（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 年），頁 610-615。

¹⁵² 郭建躍等，〈打響聯合反恐新戰役 “和平使命—2010” 實兵演練〉，《人民網》，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076/52982/12801864.html>。

¹⁵³ 陳正健，〈中印邊界爆衝突 兩軍互推砸石塊〉，《自由時報》，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27689>。

然而在戰爭成本提高且大國義戰的國際趨勢下，共軍在先勝的心理作戰戰略文化及物質性轉變下，發生新式心理作戰模式，給予共軍學習與轉化新的心理作戰模式。1988年黑海發生的蘇軍軍艦碰撞美軍軍艦，給共軍很好的學習機會。2001年美軍與共軍就在南海發生的碰撞事件，便是共軍飛機近距離靠近美軍EP-3電偵機，並隨後發生碰撞事件，導致中共內部其他單位，被動捲入與美軍與美國的糾紛。2017年7月23日發生美軍EP-3電偵機，也遭到共軍殲10戰鬥機貼近飛行，最近達到91公尺的距離。¹⁵⁴2018年9月30日美國飛彈驅逐艦「迪凱特號」(USS Decatur)在執行南海自由航行政策時，遭到中共飛彈驅逐艦「蘭州號」逼近，最近達到41公尺，險些發生碰撞事故。¹⁵⁵2019年1月7日麥康貝爾號(USS Mc Campbell)於南海執行航行自由行動時，中共海軍研究院研究員張軍社則表明，如果美國執意執行相關的政策，「兩國軍艦肯定會近距離接觸，很容易發生誤解或誤判，甚至碰撞。如果發生碰撞，根本原因在美國」。¹⁵⁶2004年中共海軍漢級潛艦進入宮古水道且被發現，導致日本對中共抗議引發外交事件。¹⁵⁷2013年2月時，共軍曾經與日本在釣魚台的問題上，發生過共軍用火控雷達鎖定日本在同一海域的單位。¹⁵⁸2015年美軍雷根號航母遭到在日本海域遭到中共潛艦尾隨，早在2006年時美軍小鷹號航母，也發生過中共潛艦在其防禦海域內浮起的事件。¹⁵⁹

共軍改變開火開炮等傳統威懾方式，而又尋找如開火般的威懾效果，採用的新形態心理作戰模式，便是以自身接近壓迫或採取攻擊姿態給予敵人最大又不亞於開火的壓力，以能發揮威懾的效果，達到改變敵人認知的心理作戰模式為優先。在1988年之前，共軍對於維護主權的衝突並非採取接近壓迫的方式來解決糾紛，而在於1988年後美蘇軍艦發生過海上碰撞事件後，共軍便擺脫以開火方式而改採用進逼壓迫的方式，逼迫對方更改原本的意圖。共軍近期產生的新形態的壓迫接近的心理作戰技巧，在面對近期「中」美摩擦日漸，共軍仍保持這樣心理作戰模式，本文認為新的共軍心理作戰戰略文化已形成。

肆、共軍心理作戰發展

克勞賽維茲(Clausewitz)的名言：「政治是軍事的延伸」。但就核心上缺乏政治與軍事關係的探討，本文認為探討政治與軍事的互動關係，有助與利用文化層面去解構與探討彼此

¹⁵⁴ 上報國際中心，〈中國殲10東海上空攔截美國EP-3 險重演南海擦撞事件〉，《上報》，檢索日期：西元2020年4月25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1451。

¹⁵⁵ 自由時報即時新聞，〈美艦在南海遭中艦進逼險撞 兩艦衝突畫面曝光！〉，《自由時報》，檢索日期：西元2020年4月25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69084>。

¹⁵⁶ 黃子暘，〈嗆美艦再入西沙 中國：如果發生碰撞 責任在美國〉，《新頭殼 newtalk》，檢索日期：西元2020年4月25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1-10/192680>。

¹⁵⁷ 王崑義，〈中國潛艦入侵日本海域事件對台海安全的啟示〉，《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8期，頁116-119。

¹⁵⁸ Martin Fackler，〈Japan Says China Aimed Military Radar at Ship〉，《New York Times》，檢索日期：西元2020年4月25日，<https://www.nytimes.com/2013/02/06/world/asia/japan-china-islands-dispute.html>。

¹⁵⁹ 李信漢，〈2006年來首見 中國潛艦逼近美航母〉，《自由時報》，檢索日期：西元2020年4月25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29688>。

互動，如政治影響軍事時，將帶來軍事是具有政治目的的結論，也代表軍事與政治不能分割的狀況。盧梭（Rousseau）在其社會契約論中的《全民意志》中提到「宣傳的戰爭是一種民主的工具」¹⁶⁰。不但說明戰爭的工具性外，更將宣傳與民主做出結合，指出宣傳實際上就是民主之事，而民主就是眾人之事下，政治將有具有眾人之事的引導工具性，代表政治將會影響眾人之事，而眾人之事也會形塑政治。

本文先前試圖描述與解釋共軍在心理作戰與戰略文化的通則，並且認為共軍在戰術性心理作戰發展成熟後，為了鞏固共軍利益、反映戰爭成本高漲與國際局勢丕變，已經轉向發展戰略性的心理作戰，以維持共軍的利益，接下來便作進一步敘述與解釋與預測未來共軍的心理作戰發展。

一、共軍先勝思想與心理作戰

本文認為共軍的心理作戰與戰略文化的互動，從孫子兵法觀察到共軍現階段的心理作戰戰略文化。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論點，可引做共軍心理作戰概念來源，而共軍戰略文化討論內，對於「不戰而屈人之兵」議題。學者楊世樂指出中華文化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存在中國國力較弱的時期。意指當中國政權之國力強盛後，仍會採取與西方相同的攻勢主義，而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應對，成為一種招撫四方的溫和形象。孫子兵法中的「先勝」、「後發先至」與「上兵伐謀」也給了共軍心理作戰思想引導，共同形塑中共偏好威懾作戰的戰略文化。當進入核子武器時代後，共軍便產生偏好核子威懾戰略思維，使的核子武器的心理作戰成為影響共軍軍事戰略的重要因素。¹⁶¹而核子威懾因為其特殊性，不容易施展，隨後則演變出偏好可運用於實戰中的「常規威懾」。¹⁶²常規與威懾如何結合傳統戰爭型態，中共面對「信息化條件下體系作戰」作戰形態，結合孫子兵法中的「先勝」及「上兵伐謀」戰略觀點，要求常規作戰必須要符合威懾，首先必須要取得「先勝」，¹⁶³隨後中共要求共軍作戰能「遠戰速勝、首戰決勝」，但為了取得勝利，不能將戰場限於戰時，而心理作戰扮演了先驅而超越了作戰時期，而進入平常時期達到勝利，必須走在前頭的超限戰模式。

為了解釋共軍的自利行為，乃以利益團體的觀點出發，認為共軍是中共內部的利益團體。必然發展出共軍文化與利益，為了維持團體利益，對外的行為具體化便是資源的爭奪與競爭行為，並且指出共軍受中共以黨領政約束，中共領導人便給共軍各種資源，以換取共軍的效忠，¹⁶⁴共軍透過心防作為，以心理作戰的模式，強化在內部群眾以強化國防教育的地位。透過軍隊符號的播送，強固中共人民對於共軍信心，達到中共穩定的統治依據，此時的我者與他者的劃分，則是共軍與中共內部非共軍的團體與成員，使其成為中共內部穩定與保守力量。

¹⁶⁰ J. F. C. Fuller 著，紐先鍾譯，《戰略指導》（The conduct of war）（臺北：麥田出版，1999年），頁214。

¹⁶¹ 王春樹等，《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懾理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127。

¹⁶² 陳崇北等，《威懾戰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頁104。

¹⁶³ 蘇彥榮等，《軍界熱點聚焦-高技術局部戰爭概論》（北京：國防大學，1993年），頁39。

¹⁶⁴ 江澤民時代的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與有償服務，胡錦濤時代堅持加快及全面等對共軍的建設，習近平的三個要求與強軍夢。

而在對外的情勢方式，則透過科技進步與局勢的掌握等方面，主動運用傳播媒體的力量，表達屬於共軍的立場，於是可以見到民主國家專業軍主義內，軍隊甚少干預外事或表達立場的狀況在共軍身上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則是共軍屢屢強調屬於共軍的立場及心理作戰的戰略文化；而在局勢的掌握中，共軍代表中共內部的強硬力量，使的中共外交部部分時候甚至變成問題的解決者，而產生共軍與中共外交部立場不同的情事，更有甚者以唱雙簧來表達中共內部「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思維，更甚者會產生中共到底能不能控制共軍的想像，在中共與共軍的互動中，對於部分共軍的要求，中共高層會很快採取行動，防止敵對行為的擴大。¹⁶⁵如 1950 年時毛澤東反對粟裕提出占領中華民國控制下的福建與浙江沿海島嶼，及 1959 年時中共否決當時於印度前線指揮官，要求對印度陣地發動攻擊的請求，以及 1988 年共軍海軍要求對越南在赤瓜礁爆發衝突，而中央軍委會否決當地指揮官要求衝突及與擴大控制權的求。¹⁶⁶1967 年中共高層對於武漢軍區七二〇事件處理及事後擴大青年下鄉政策，以轉換文革對於共軍的影響，可以觀察出來中共高層對於共軍的重視。就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與組織上來觀察，共軍爭取外事話語權，確實讓外界觀察到不同於民主國家的狀況。而共軍將以自己的方式跟上時代的變遷及科技的進步，以支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運作。

二、外事競爭與共軍戰略文化

文化的受到物質、環境與歷史等因素的影響，進而透過時間的淬鍊後，再回過來影響文化的本身。而被影響的層面及方向，從學者道爾 (Robert A. Dahl) 在權力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power) 內描述的令 B 做出 B 不願做的事加以檢證。¹⁶⁷而權力的本質不容易觀察，但只要觀察什麼改變了，就可以瞭解權力的邊緣。¹⁶⁸而共軍受到戰略文化的影響，本文認為從物質、環境及歷史等因素便可以解釋，共軍在心理作戰戰略文化上的轉變。在戰爭成本高漲及國際情勢丕變之下，共軍必然發展不同與往的心理作戰模式。

共軍在 1949 年前心理作戰戰略文化受到游擊戰、人民戰爭及運動戰的影響，心理作戰目標是人民群眾，手段以軟化及鞏固為主。可以解釋為為何共軍同樣重視關鍵戰場在心理層面的心防作為，更重要還要為了中共政權的存續而戰，故爭取人民的心理認同是首要關鍵，而 1949 年後面對的戰爭已經不是奪取政權的戰爭，心理作戰的手段，須提升到國家對國家的層次，此時外交部與國際政治的重要性漸漸增加。而這樣的轉變過程，配合上共軍在發展戰術性心戰的過程中，漸漸的產生新型態的目的及結果，如使用電影來作為心理作戰的載體，除代表心理作戰從個人轉移到組織，從當下轉移到恆久。而共軍角色的改變，也代表心理作戰

¹⁶⁵ M. Taylor Fravel, "The PLA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Insights from China'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p. 254

¹⁶⁶ Lu Ning,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Dobuzinski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年), pp. 126

¹⁶⁷ 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S.), Volume 2, Issue 3, 03 April 1957, pp. 203-204.

¹⁶⁸ Moisés Naim, 陳森譯,《微權力》(The End of Power) (臺北:商周出版, 2015 年) 頁 53。

必須轉換另一種方式來呈現，從戰場殺伐到棉裡藏針，從刀光劍影、子彈橫飛到大國博弈，當不宜開火時，便開始找尋合法但更激烈的方式，來爭取及維護共軍的利益，以上均為心理作戰的探索模式。

在戰術心理作戰的發展逐漸成熟之下，隨著外在文化的演進而產生變化，最後開始朝向戰略性心理作戰方向轉變，其根本原因在於共軍利益的維護、與中共外事單位的資源爭奪及科技的根本變化。心理作戰與戰略文化是交互影響，現階段共軍心理作戰的戰略文化便是：爭取戰場主動、鞏固內部心防、確保共軍利益。要先將共軍認為是中共內的一個利益團體，首先、不論共軍採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捍衛中共政權，各種舉動均有助於自我建構或強化自我形象，以達到政治目的。這樣的過程便是戰略文化與心理作戰，產生自我建構的互動過程，而建構出來的形象又再一次回來影響共軍的行為。共軍以碰撞的模式對應敵人且獲得成功後，該經驗更強固共軍爾後行為，賡續採用了比傳統開火更能夠決勝心理壓逼模式。當共軍發現運用關係性影響力，且加上媒體的發散後，可以鞏固共軍的利益時，再不與中共又紅又專的政策衝突下，共軍便開始以透過媒體發言，保有自主彈性的競爭力。

伍、結語

組織利益在中共內部的競爭不斷，以日前中共《財新網》一名記者披露，武漢中南醫院在封城前，不斷向武漢市衛健委報告疑似病例，但多次被批「政治覺悟性不高」。¹⁶⁹且近期發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馬曉偉在內部會議資料內，提到肺炎人傳人的跡象，而相關的事蹟又被李群給否認。以及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利用個人推特（Twitter）轉發美軍帶入病毒至中共內，屢屢矛盾的跡證，中共本身存在組織的競爭，且因為競爭的特性，產生其戰略文化的特殊性，代表中共的文化層面對於行為的影響。

透過由共軍本身是利益團體的角度來觀察其與中共其他組織的互動及競爭過程，便可以清楚明白中共的對外行為為何有時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方向，不至於將全然不同的結果，直接導向是中共兩面手法如此單純。當明白中共需要花費資源來穩定共軍後，也能體會到我國軍隊國家化是多麼可貴的政治結果。

¹⁶⁹ 賴言曦/邱國強，〈武漢中南醫院早已通報病例 官方反批政治覺悟低〉，《中央社》，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004120112.aspx>。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一、專書

- 王春樹等，《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威懾理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頁 127。
- 王誠漢，《王誠漢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482。
- 王建華編著，《信息技術與現代戰爭》（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4 年）。
- 石之瑜，《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 年）。
- 倪創輝，《十年中越戰爭》（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9 年）。
- 陳崇北等，《威懾戰略》（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04。
- 范疇，《2020 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臺北：八旗文化，2019 年）。
- 譚傳毅，《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攻與防》（臺北：時英出版社，1999 年）。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美國國防部軍語詞典》（臺北：國防部，1995 年）頁 517-518。
- 國防部，《國軍軍語詞典》（臺北：國防部，2004 年）。
- 國防部，《國軍軍事思想》（臺北：國防部，2003 年）。
- 國防部，《政治作戰要綱》（臺北：國防部，2007 年）。
- 國防部總政戰部，《國軍心戰手冊》（臺北：國防部，1994 年）。
- 國防研究院敵情研究所編，《「匪俄關係與其動向之研究」參考資料彙編》（臺北：國防部敵情研究所，1969 年）。
- 孫波、李慶洲，〈心理作戰〉，《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 II），（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 年）。
- 沈偉光，《新戰爭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郝唯學、趙和傳主編，《心理作戰講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 年）。
-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534 - 535。
- 蘇彥榮等，《軍界熱點聚焦-高技術局部戰爭概論》（北京：國防大學，1993 年），頁 39。
-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出版社，1994 年），頁 123。
- 齊辛，《珍寶島事件真相（增訂本）》（香港：集思圖書公司，1969 年）。

二、專書譯著

- Andre Beaufre 著，紐先鍾譯，《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臺北：麥田出版，1999）。
- Jonathan Dermot Spence 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Third Edition)）（臺北：時報出版，2019 年），頁 220-222。
- J.F.C Fuller 著，紐先鍾譯，《戰略指導》（The conduct of war）（臺北：麥田出版，1999 年），頁 214。
- Moisés Naim, 陳森譯，《微權力》（The End of Power）（臺北：商周出版，2015 年）。

米爾頓海默。(2014)。大國政治的悲劇：麥田出版社。

矢板明夫 著，鄭天恩譯，《人民解放軍的真相：中共 200 萬私軍的威脅、腐敗與野心》(中國人民解放軍 2050 年の野望-米軍打倒を目指す 200 万人の「私兵」)(臺北：八旗文化，2019)。

三、期刊

陳義明，〈美軍心戰效能發展與運用-淺談國軍心戰效能之評量〉，《陸軍裝甲兵季刊》，第 240 期，2016 年。

黃恩浩，〈爭論中的國際關係戰略文化研究〉，《問題與研究》，第 51 卷第 4 期，2012 年 12 月。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

林廷生，〈解放軍的現代化與戰略文化：「積極防禦」的戰略思想與解釋架構〉，《全球政治評論》，第 50 期，2015 年。

郭雪真、洪陸訓，〈中共心理作戰的研發與戰備〉，《復興崗學報》，第 89 期，2007 年。

遲振海、汪玉軍，〈心理作戰、心理武器、心理訓練〉，《解放軍健康》(濟南市)，2003 年 5 月。

張魯征，〈對提高軍隊心戰能力的思考〉，《軍隊政工理論研究》(南京市)，2001 年 6 月。

童天，〈心理作戰在現代戰爭中的運用〉，《飛航導彈》(南京市)，2005 年，第 10 期。

李小光，周守珍，〈預備役部隊心理作戰運行機制探析〉，《華南國防醫學雜誌》(廣州市)，第 28 卷第 5 期，2014 年 5 月。

宋華等，〈現代心理作戰致傷特徵與思考〉，《華南國防醫學雜誌》，第 18 卷第 3 期，2004 年。

王崑義，〈中國潛艦入侵日本海域事件對台海安全的啟示〉，《臺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28 期。

解放軍報，〈心理作戰已經扣響戰略大門—新軍事革命與心理作戰學術研討會〉，《解放軍報》(北京市)，1998 年 3 月 10 日，第 6 版。

四、網路

丁揚，〈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社》，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

金虎，〈毛澤東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www.mod.gov.cn/big5/education/2015-09/09/content_4619684.htm。

郭建躍等，〈打響聯合反恐新戰役 “和平使命—2010” 實兵演練〉，《人民網》，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076/52982/12801864.html>。

陳正健，〈中印邊界爆衝突 兩軍互推砸石塊〉，《自由時報》，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27689>。

上報國際中心，〈中國殲 10 東海上空攔截美國 EP-3 險重演南海擦撞事件〉，《上報》，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1451。

自由時報即時新聞，〈美艦在南海遭中艦進逼險撞 兩艦衝突畫面曝光！〉，《自由時報》，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69084>。

黃子暘，〈滄美艦再入西沙 中國：如果發生碰撞 責任在美國〉，《新頭殼 newtalk》，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1-10/192680>。

李信漢，〈2006 年來首見 中國潛艦逼近美航母〉，《自由時報》，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29688>。

中央社，〈中國使館被炸 20 週年 官媒：現在誰還敢炸？〉，《聯合新聞網》，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800887>。

人民網-軍事頻道，〈羅援少將深度剖析中國反對美韓黃海軍演的五點依據〉，《人民網》，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42969/58519/12132612.html>。

閻紀宇，〈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 納入釣魚台〉，《端傳媒》，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6012>。

中共外交部，〈2010 年 6 月 22 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舉行例行記者會〉，《中共外交部》，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710763.shtml。

賴言曦/邱國強，〈武漢中南醫院早已通報病例 官方反批政治覺悟低〉，《中央社》，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004120112.aspx>。

貳、外文部分

一、專書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Katzenstein PJ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lison, G. T., & Zelikow, P.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Vol. 327): Little, Brown Boston.

Bonnie S. Glaser, "The PLA Role in China's Taiwan Policymaking,"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Cynthia A. Watson, "The PLA and the Taiwan Issue"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Lai, "The Agony Of Learning :The PLA' S Transforma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Carlisle : U.S. Army War College, 2012》.

Eric Hagt, "The Rise of PLA Diplomacy"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 Isaac B. Kardon and Phillip C. Saunders, "Reconsidering the PLA as an Interest Group"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Jonathan R. Adelman & Chih-Yu Shih,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war in Chinese politics*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3).
-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77).
- Jacobson and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weden: SIPRI, 2010》, P. 14.
- Keohane, R.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d, &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1).
- Ronald L. Tammen,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d, &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2001).
- U.S Department of defence, *Doctrine for join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U.S: Washington DC, 2003).
- U.S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2-5.3, *Doctrine for join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 (U.S: Alabama 1999).
-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Role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Crisis Behavior,"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RAND, 1998》.
-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in Policy and Crisis"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 M. Taylor Fravel, "The PLA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_making: Insights f ro

m China' 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In Editor by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 , PLA Influence On China' 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California, Routledge, 2015》 ,PP. 250-251

Nan Li, ” PLA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WASHINGTON :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Xu Ge, ” Steel Anchors Consolidating Maritime Frontiers: Record of the Republic' s Naval Battles” (Beijing: Haichao chubanshe, 1999) .

Van de Ven, Hans . Harold,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Lu Ning, ” The Dynamics of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 《Dobuzinski 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年》 .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二、期刊

Aaron Wildavsky,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s: Uses and limitation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6, Issue 2, (1994) .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W. Harold,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Routledge) Asian Security 9, no. 2 (May - August 2013) .

James Mulvenon, ”Rogue Warriors? A Puzzled Look at the Chinese ASAT Tes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oover Institution) , no. 20, (Winter 2007) ,PP.1-2

MIHIR BHONSALE, ” Understanding Sino-Indian Border Issues: An Analysis of Incidents Reported in the Indian Media” ,《New Delhi : ORF, 2018》 , 2018 年 2 月.

Michael D Swaine & M. Taylor Fravel, ” China' s Assertive Behavior—Part Two: The Maritime Periphery ”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oover Institution) ,No. 35 Summer 2011, PP.12-14.

Steve Smith ”A Road Is Made: Communism in Shanghai, 1920 - 1927,” 《England, Routledge, 2018》 , PP.158.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Ted Hop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S) , Vol. 23, No. 1, 1998, p. 199.

三、網路

Elizabeth Bumiller and Michael Wines, 〈Chinese Army Test Jet as Gates Visits〉,《The News Youk Times》, 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 , <https://www.nytimes.com/2011/01/12/world/asia/12fighter.html> .

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S) , Volume2, Issue3, 03 April 1957, pp. 203-204.

Martin Fackler,〈Japan Says China Aimed Military Radar at Ship〉,《New York Times》,
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nytimes.com/2013/02/06/world/asia/japan-china-islands-dispute.html>。

Michael D. Swaine, “Chinese Views and Commentary on the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檢索日期：西元 2020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ese-views-and-commentary-east-china-sea-air-defense-identification-zone>

第二場次

主題：「亞太區域安全的發展與影響」

時間：10：50 - 12：10

主持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系退休教授洪陸訓

論文發表：

4. 軍訓教官制度轉型與全民國防教育實施成效之研究

(田立德)

5. 中共文化統戰現況之研究：以習近平時期為例

(林冠萍、李亞明、蔡明朗)

6. 我國軍人不在籍投票可行性之研究：電子投票的適用性及配套措施

(盧怡君、程凱、陳憶綾)

軍訓教官制度轉型與全民國防教育實施成效之研究

台北市立松山家商教官室中校教官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田立德

摘要

軍訓教官在高中職以上的學校中，其所扮演的角色隨著時間演變。早期從軍事教育的軍人強勢身份、國防教育的講授、學生生活輔導的導師身份到校園安全的守護者。以軍人化身校園教官的角色，隨時必須要依國家制度的改變、教育體系的需求、社會的期望及學生家長的需要，不斷的改變教官所扮演的身份。因此，社會上對於教官的貢獻，各種正反面的批判與意見，立法院於 2013 年 6 月三讀高級中等教育法，通過附帶決議：「有關教官之職能雖已朝向多元，對於校園安全與國防教育有其貢獻，教育部在學生安全及校園安定無虞之下…並與國防部會商於八年內讓教官回歸國防體系」；另 2020 年 6 月 30 日教育部部長於軍訓教官晉任典禮鄉媒體明確表達：「配合立法院決議，教官 2023 年全面退出校園，2017 年後就沒有新任教官。目前約為 2600-2700 位，教育部早表明，希望能有更多教官，未來轉為全民國防教育的師資。」，此即說明了教官離開校園或轉型校安人員已成既定政策和事實。

眾所周知，「教育是最廉價的國防」，軍訓教官在全民國防教學、學生生活輔導與校園安全上有其重要性的角色與地位，然而因既定政策、民意傾向、教育變革與全民國防教育推動的影響，使得軍訓教官體系在校園的存續面臨重大之衝擊，而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轉由「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培育合格師資接手，銜接上是否順利無虞，此為本研究主要探討課題，因為傳遞正確的國防知能是我國全民國防教育的重要目標，成功讓學生了解國防的重要性才是真正達成教育的目地。

關鍵詞：軍訓教官、全民國防教育、全民國防教師

壹、前言

2013年6月27日報載：「高中軍訓教官退出校園問題擾攘多年，立法院朝野黨團26日協商「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多數立委訴求訂定「教官回歸國防體系」的落日條款，執政黨團及教育部折衝後，作成附帶決議，¹要求教育、國防兩部「會商於八年內讓教官回歸國防體系」，亦即2021年起，高中職校園內將不再有教官。」²；2019年8月20日報載：「全國約3000名教官112年退出校園，屆時教官授課的高中全民國防教育將改由教師授課，教育部統計所需教師363人。教育部規畫108學年起至110學年度由五所大學開設學士後學分班，招收對象包括儲備教師、退役軍官等，預計培育600名國防教師。教育部表示，師培過程會有人員流失，儲備量會大於需求量。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劉專委表示，「高中職學生必修全民國防教育兩學分，目前由教官授課，未來教官退出校園後，由合格教師授課，推估約需三六三人。」³；2020年6月30日媒體報導：「配合立法院決議，教官2023年全面退出校園，2017年後就沒有新任教官。目前約為2600-2700位，教育部早表明，希望能有更多教官，未來轉為全民國防教育的師資。教育部學特司科長黃惠玲表示：「我們很鼓勵，可是當然這也是有人個人意願的一個考量。因為師資是一個考慮，今天轉型為學務、創新人力也是一個考慮。」⁴。

上述3則新聞報導皆說明了「軍訓教官離開校園」已為政府既定政策，而議題也多次受到立法院及社會各界之高度關注，自民國2006年10月起教育部推動「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轉型方案」，大學校院教官離退後轉置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人力，教官員額開始逐年減少，立法院也曾多次做出相關的決議。軍訓教官退場已成定局，教育部正積極規劃替代人力方案，包括培訓校安人員以接替原本的校園執勤(學生上放學交通引導、學生糾紛處理、及有關反毒或交通安全等業務執行)及維護校園安全工作(現在很多高中職或是大專都有聘任校安人員協助校園危機應變處理)；另外即是全民國防教育的師資培育，未來將取代教官擔任全民國防教育的教學者。眾所周知，全民國防教育是最廉價且有效的國防投資。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的範疇已由傳統的軍事安全，擴及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等綜合性安全趨向。為使全體國民能夠理解國防安全的內涵，具備「國防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責」的認知，形成「全民關

1 立法院102年6月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第31條附帶決議「現行高級中學建立軍訓教官制度，有關教官之職能雖已朝向多元，對於校園安全與國防教育有其貢獻……。教育部在學生安全及校園安定無虞之下，應對軍訓教官在總量管制下，採退多補少、漸進將訓育、校園安全等各項相關經費逐年編列聘用專業人員，並與國防部會商於8年內讓教官回歸國防體系，充實國防實力，達成轉型目標。」

2 「12年國教附帶決議 教官8年內退出校園」，自由時報新聞網，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691620>，(檢索日期：2020/8/17)

3 「教部將培育600國防教師 接棒教官」，聯合新聞網，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885/3998265>，(檢索日期：2020/8/17)

4 「教官2023退出校園 教部：協助未來轉教職」，公視新聞網，網址：<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85038>，(檢索日期：2020/8/17)

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全民國防共識。⁵本文主在探討軍訓教官轉型後，現行高中職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能否全面由全民國防教師(經過正式師資培訓合格者)接手執行，並結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落實「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⁶全民國防教育屬「長期性、整體性」工作，需賴全民共同關注、共同參與、共同支持，方能達成目標，⁷其中，現行軍訓教官所擔負的教育任務尤為重要。軍訓教官在全民國防教學、學生生活輔導與校園安全上有其重要性的角色與地位，然而因既定政策、民意傾向、教育變革與全民國防教育推動的影響，使得軍訓教官體系在校園的存續面臨重大之衝擊，而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轉由「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培育合格師資接手，銜接上是否順利無虞、無縫接軌，此為本研究主要探討課題，因為傳遞正確的國防知能是我國全民國防教育的重要目標，成功讓學生了解國防的重要性才是真正達成教育的目的地。⁸

貳、我國全民國防教育學校教育之演進推展

一、緣起

民國 1949 年政府播遷來臺，國民政府鑒於文武合一教育，對民族的盛衰影響深遠，乃於民國 1951 年決定恢復學生軍訓。教育部與國防部會頒「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計畫」，並由國防部選拔一批優秀軍官幹部擔任軍訓教官；當年 9 月由臺灣省 8 所師範學校先行試辦，民國 1952 年 4 月教育部公布「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事精神體格及技能訓練綱要」，同年 9 月預備軍官第 1 期開訓，此為大專畢業生服預備軍官役的開始。民國 1952 年 10 月 31 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學生軍訓工作遂由救國團負責主管。民國 1953 年 7 月，全省高中全面實施軍訓，專科以上學校亦於民國 1954 年開始實施。民國 1960 年國家建設逐漸步入正軌，政府為使學生軍訓制度化，乃於 7 月 1 日明令學生軍訓移歸教育部主管，正式納入教育體系。⁹

但隨著民主政治發展，政府所有事務均須回歸法制面，而國防法法制化問題也受到重視與討論。¹⁰因此經過長期研討及立法過程，訂定了我國全民國防知運作體系，其中包含了《國防法》、《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全民國防教育準備法》等 3 法，《國防法》為母法，而全民國防需要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全民國防教育準備法來加以具體實現。

¹¹《國防法》是依據《憲法》第 137 條於 2000 年 1 月 29 日公布實行，其中包含了我國

⁵ 莊坤輝，〈我國全民國防教育推展之研究-以社會教育為例〉(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頁 30。

⁶ 行政院公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全民國防教育〉，第 024 卷 第 039 期，頁 1。

⁷ 吳振樹，〈我國全民國防教育法立法過程與執行初期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41。

⁸ 李寶俊，〈中國新安全觀〉，〈中國外交〉，2001 年，頁 114。

⁹ 翁明賢，〈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發展與軍訓教育的重構〉「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2001 年 10 月)，頁 123-124。；黃盛忠，〈學生對國防通識教育學習滿意度之研究-以臺東縣高中、職校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頁 25。

¹⁰ 吳傳國，〈全民國防，大學暨在職教育授課參考〉(臺北市：總政戰局，2012 年 12 月)，頁 8。

¹¹ 金嘉銘，〈我國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之探討-以學校教育為例〉，「2019 淡江戰略學派年會全民國防教育論

全民國防的定義和內涵，該法第 3 條對全民國防所做的詮釋：「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¹²該法中相關全民國防法規介紹、明確完整動員法治體系以及工作推行依據，換言之，國防法的頒行，為我國國防體制定位為「全民國防」確立了法源依據。¹³

民國 2001 年 11 月 14 日政府公布「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該法第 14 條第 2 項「為結合學校教育增進國防知識，教育部應訂定各級學校軍訓課程之相關辦法。」成為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實施軍訓教育之依據。¹⁴為使全民國防的理念更加落實，增進全民之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健全國防發展，確保國家安全，政府在西元 2006 年實施《全民國防教育法》及西元 2010 年公佈《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正式成為我國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法源依據。¹⁵相關法規的公佈與實施，使我國在「全民國防教育」的概念與落實上，有了具體的法制規範，也正式宣告我國全民國防教育在法制規範下，透過全民國防教育，使全體國民都能夠瞭解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重大意義，且對國防事務更加理解。期間因軍訓教官功能及軍訓制度在體制及性質上有了重大改變，95 學年度軍訓課程改名國防通識課程(其特色為抽離軍訓護理及排除實彈射擊課程，並改採學分制區分成必修及選修各 4 學分課程)¹⁶，2009 學年度再度更名為「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隨著時代潮流變遷，軍訓課程大幅修訂，名稱也由軍訓課程、國防通識課程乃至於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課程演變的結果，教育目標從基礎軍事技能訓練，轉變為全民國防常識灌輸與觀念建立，在課程核心上，有極大轉變。為增進民眾國防安全認知，強化自我防衛意識，有效爭取全民共同支持並參與國防建設最好的基礎，¹⁷故全民國防教育成為正式教育的一環。然而西諺有云：「教育是最廉價的國防」。為落實「全方位、全民參與、總體防衛、民眾信賴」的全民國防理念，因此落實學校教育、深化國防理念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二、現行高中職全民國防教育課程

現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是我國教育部希望延長基本教育年限，將高中、高職、五專的前 3 年納入並統整，以提升國民素質與國家實力，並以「全人教育」、「核心素養」

文發表會」(新北：淡江大學，2019 年 5 月 16 日)，頁 300-301。

12 國防法，〈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s://law.moj.gov.tw/>，(檢索日期：2020/8/17)

13 莫大華，〈平民防衛與台澎防衛作戰：臺灣主戰場的經營〉「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2001 年 10 月)，頁 227。

14 黃盛忠，〈學生對國防通識教育學習滿意度之研究-以臺東縣高中、職校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碩士論文，2009 年)，頁 25。

15 陳津萍，〈全民國防-高中暨社會教育授課參考〉(臺北：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11 年 12 月)，頁 53-54。

16 湯文淵，〈我國全民國防教育戰略觀〉(臺北市：幼獅出版社，2006 年 7 月)，頁 81。

17 曾慶華，〈全民國防理念之落實〉，《中華戰略學刊》(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04 年 12 月)，頁 42-43。

為發展主軸。以 2014 年發布的課綱總綱為依據，其核心素養是培育「終身學習者」，其分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¹⁸十二年國教原定自民國 107 學年度逐年實施，後修改為自 108 學年度逐年實施，簡稱 108 課綱。108 課綱的基本精神是倡導素養導向教學，突破原有的學科知識框架，讓學生發展出九大新能力，讓知識不再只是知識，而是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學生從小學、國中、高中與高職的學習路徑，也將更加注重培養個人興趣性向。而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亦配合 108 課綱實施精神以素養導向教學實施。

依據《全民國防教育法》，學校教育應與其他國防教育措施共同「增進全民之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健全國防發展，確保國家安全」。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旨在透過培養學生對社會與國家的責任感，養成行動力以實踐對國家的認同與支持，並建立謀求國家安全與發展之相關概念。¹⁹長遠而言，亦著眼於培養未來之國防人才，為國防建設與國家安全奠定基礎。為發展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課程綱要配合學生認知發展，並整合全民國防、國際情勢、國防政策、防衛動員及國防科技等五大主軸，在內容上力求結合生活經驗、社會時事及國內外議題，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全民國防教育特色在於從安全的角度連結個人與社會及國家，增進學生對於國家相關作為之了解，並擴展學生之國際觀。教學方式則著重引導學生主動發現國防事務與生活密不可分，並透過討論的互動歷程，讓學生思考與領會個人與團體之參與對於國家的發展與影響；另透過各類防災演練與實作活動，強化團隊合作的精神，培養同理關懷與溝通互動的能力。另為落實「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課程綱要將以結合生活的課程內容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全民國防知能，促進學生與社會人群的互動，追求公平正義與安定和平的社會環境，達到國家永續發展的目標。²⁰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全民國防教育》，以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必修 2 學分為基礎，融入並銜接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相關課程，達成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連貫與統整精神；現行五大主軸順序調整，從「建立國家安全的概念」，輔以「防衛技能的實務操作」，到「體現和平的重要性」，連貫每一主題的關聯性。²¹在課程架構上，將學習內容區分五大向度區分為：

1. 全民國防概論：包含「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全民國防的意涵」及「全民國防理念的實踐經驗」。

18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 年 11 月，頁 1。

19 沈明室、楊繼宇，〈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全民國防〉（臺北：幼獅出版社，2016 年），頁 32。

20 行政院公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全民國防教育〉，第 024 卷 第 039 期，頁 1。

21 沈明室，〈全民國防教育-高中課本〉（臺北：幼獅出版社，2019 年），頁 2-3。

2. 國際情勢與國家安全：包含「全球與亞太區域安全情勢」及「我國國家安全情勢與機會」。
3. 我國國防現況與發展：包含「國防政策與國軍」及「軍備與國防科技」。
4. 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包含「全民防衛動員的意義」、「災害防救與應變」及「射擊預習與實作」。
5. 戰爭啟示與全民國防：「臺灣重要戰役與影響」。

在實務操作上，以強化學生對於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的相關概念及技能操作；校園災害防救課程內容結合在地情境，權衡各地災害風險之差異，發展因地制宜的教材與教學，培養學生災害防救之能力；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科技、生命、安全教育等 19 項議題學習目標。選修課程方面，鼓勵學校採取多元選修方式，配合其他領域、科目教學活動，進行跨領域、科目專題的學校本位課程；學校可配合營區開放或相關演習，自行設計與全民國防教育有關的實務課程與戶外教學活動。²²

因應 108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實施後，其中部分課程內容調整為「全民國防概論」、「國際情勢與國家安全」、「我國國防現況與發展」、「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及「戰爭啟示與全民國防」，為維護學生折減軍事訓練期間之權益以及符合兵役法第 16 條規定，教育部會銜國防部、內政部於 109 年 6 月 10 發布修正「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辦法」，其中增訂 108 學年度起入學高級中等學校、五專前三年或相當層級進修學校新生適用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課程總時數維持 40 小時，至多折減軍事訓練期間 5 日。

就現行 108 課綱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教育目標分析旨在透過培養學生對社會與國家的責任感，養成行動力以實踐對國家的認同與支持，並建立謀求國家安全與發展之相關概念。為發展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新課綱配合學生認知發展，並整合全民國防、國際情勢、國防政策、防衛動員及國防科技等五大主軸，在內容上力求結合生活經驗、社會時事及國內外議題，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本科目之特色在於從安全的角度連結個人與社會及國家，增進學生對於國家相關作為之了解，並擴展學生之國際觀。

參、我國軍訓教官制度緣起與轉型

一、現行教官制度的源起演進

22 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全民國防教育-學科課程地圖〉，王信惠、周昇鴻、詹宗龍、劉曉樺等編著，頁 212，網址：<http://ad.pymhs.tyc.edu.tw/nss/p/index>，（檢索日期：2020/8/17）

軍訓教官在高中職以上的學校中，其所扮演的角色隨著時間演變。早期從軍事教育的軍人強勢身份、國防教育的講授、學生生活輔導的導師身份到校園安全的守護者。以軍人化身校園教官的角色，隨時必須要依國家制度的改變、教育體系的需求、社會的期望及學生家長的需要，不斷的改變教官所扮演的身份。因此，社會上對於教官的貢獻，各種正反面的批判與意見，從不同時期文的探討、教育改革研討會、媒體報導、校園研討會…等時而所見，例如部分人士認為教官應更積極的扮演校園守護者的角色、或教官是家長以外學生最想尋求幫助的對象，也有學者、專家認為教官應讓校園自主，全面退出校園的建言或話題亦時有所聞。

如上節所述，我國軍訓教育的發展自 1951 年恢復學生軍訓迄今已有一段很常的發展歷史，我國軍訓教育源於民國初年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張，係以德國教育為參考下所引進，創始於 1928 年，目的在振奮民族精神，抵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²³遷臺初期，為因應臺海情勢，於 1951 年恢復高中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制度。遷臺初期，學生軍訓之重點在基礎軍事訓練，其目的為培養青年學生戰鬥精神與知能，並協助學生生活管理事宜。2001 年 11 月公布「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4 條規定，教育部應訂定各級學校軍訓課程之相關辦法。2004 年 7 月針對現行軍訓組織型態、軍訓教官角色定位、人力運用及法規制度等進行軍訓制度改進，以配合 2005 年 2 月公布之「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7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先後於 2006 學年度及 2009 學年度起實施「國防通識」與「全民國防教育」等教學課程，希望能透過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將軍訓教育法制化，深植全民國防教育理念，並使軍訓教官融入校園文化，提升其教學、輔導及服務之效能。學生軍訓制度之實施，主要以「教育部組織法」第四條、「大學法」、「高級中學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為現行軍訓制度之依據。²⁴許多學者的研究及文獻上所陳述，在探討軍訓教官的演進時，大都會提到這段歷史。目前均依據民國 2010 年 5 月頒布之「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及其相當層級之進修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之師資由具課程內容專業之該教育階段合格教師擔任；師資不足時，得由教育部認可經全民國防教育人員培訓合格之教官擔任，據此作為高中職軍訓教官存在於校園之法源。²⁵

軍訓教官的角色定位與功能的問題，一直為外界所關注，自軍訓制度自解嚴以後，不斷地成為教育界爭論不已的焦點。然而，軍訓教官的不僅是全民國防教育的教學者，還附帶維護校園及學生的安全事宜，在當前校園多元發展過程中，更是扮演著默默付出的耕耘者角色。立法院於 2013 年 6 月三讀高級中等教育法，通過附帶決議略以：「有關教官之職能雖已朝向多元，對於校園安全與國防教育有其貢獻，教育部在學生安全及校

23 教育部軍訓處，《學生軍訓五十年》（臺北市：幼獅出版社，1978 年），頁 2。

24 陳正年，〈從高中職軍訓教官到校安人員的角色轉變——以高雄市高中職校為例〉（嘉義縣：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論文，2018 年 7 月），頁 24-26。

25 湯文淵，《我國全民國防教育戰略觀》（臺北市：幼獅出版社，2006 年 7 月），頁 161。

園安定無虞之下…並與國防部會商於八年內讓教官回歸國防體系」，此政策已說明教官離開校園已是既定事實，然全民國防教育係為培育人民基本素養，增進全體國民國防知識及防衛國家意識，政府遂於 2005 年訂頒「全民國防教育法」，並列於高級中等學校必修科目之一，然在軍訓教官逐漸退出校園的影響下，授課師資將逐漸減少的問題必須值得注意。

二、推動全民國防合格教師取代教官

因應立法院陸續決議，確定教官在 2023 年全面離開校園，教育部表示維護學生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責任，教育部已推動推動學務創新轉型計畫，亦是「校安中心儲備人員培訓實施計畫」，規劃每年辦理培訓，預計全面改聘用校安人員取代教官，按期程讓教官退出校園的方向不變，循序漸進滿足高中職校進用校安人員的需求；另針對全民國防教育部分，屆時教官授課的高中職全民國防教育將改由教師授課，現今高中職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要修 2 學分的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均由教官授課。不過 2023 年教官全面離開校園，未來高中職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將由合格教師來任教，因此教育部必需解決師資的問題。教育部統計所需教師 363 人。教育部規畫 108 學年 8 月起至 110 學年度由五所大學開設學士後學分班，招收對象包括儲備教師、退役軍官等，預計培育 600 名國防教師。教育部表示，師培過程會有人員流失，儲備量會大於需求量。

目前教育部已核定淡江大學、政治大學、中正大學、中興大學及中山大學等五所大學開設「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108 至 110 學年度開始招生並授課，預計可培育六百名合格教師，只要曾修習國防教育科系、修完教育學程、退役教官等都可參加。包括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全民國防課程 28 學分，共 54 學分，約兩年修完。²⁶教育部雖於日前針對「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第八條辦理修頒，律定 2023 年前全民國防課程須由「全民國防教育人員培訓」合格教師擔任；師資不足時，得由教育部認可之相關培訓合格軍訓教擔任或協助教學，惟現況因軍訓教官現採遇缺不補之政策及在面臨師資培育不易情形下，勢必部分學校授課權益亦將受到影響。

肆、教官轉型後全民國防教育實施成效之探論

我國軍訓教育實施迄今，所需國防課程師資幾由國防部支援而由教育部統一分發。因學校教師之聘任有一定之法律保障及依循必要的法制程序；教育單位人員之運用亦依「師資培育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律規定任用。而軍訓教官之派任則係依「全民國防教育法」所授權訂定之辦法，由教育部會同國防部辦理遴選，致軍訓教官之師資資格及派任程序備受適法性質疑。由於大學軍訓教官聘任已依大學法規範及遇缺不

26 「教部將培育 600 國防教師 接棒教官」，聯合新聞網，網址：<https://udn.com/news/story/6885/3998265>，(檢索日期：2020/8/17)

補政策，逐漸回歸大學教師之相關聘任程序；至於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全民國防教育師資，亦將於 2013 年 6 月三讀高級中等教育法附帶決議，產生結構性的變化。²⁷

雖然國內已有政治大學等五間大學開設「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培育全民國防教育師資，但能否完全教授現行高中職 108 課綱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實值得探究，以下就針對現行教官授課與未來全民國防教師授課預判所見相關問題做一探討。

一、課程部分章節授課方式問題

「全民國防教育」推廣範疇包括學校教育、政府機關的在職教育、社會教育，以及國防文物保護宣傳教育等 4 大領域。在深耕學校教育這部份，多年來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及聯絡處為落實全民國防教育融入現行高中職校課程，規劃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教學活動，目的在使全民國防教育脫離僅在課堂授課的刻板印象，朝向活動多元化目標發展；而當前軍訓教官在高級中等學校部份所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時，除了於課堂內對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的講授外，更已透過靈活的教學設計，以多元的教學方式進行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例如：國防培育班簽約設置、參觀國軍戰史古蹟、安排漆彈射擊、全民國防有獎徵答等教學活動，以及各學校自行辦理的運動競技、國軍營區參訪、愛國勵志歌曲競賽及儀隊競賽等動靜皆宜的活動。²⁸而高中職校學生中斷多年的實彈射擊體驗再次於 2007 年恢復，更是希望透過多元的教學活動，以落實學校國防教育，走出紙上談兵的窠臼。全民國防教育是雖為最廉價的國防，但也是卻是最高效的國防投資。惟有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操，從學生時代即建立國家至上的正確觀念，培養國際性宏觀視野和憂患意識，如此人民才能體認全民國防的重要性。

觀察現行五所開設「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之大學，渠等規劃開設課程類別大致上分別為「國家安全」、「國際情勢」、「全民國防概論」及「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演練」等，其國防師資培育課程與現行高中 108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目「全民國防概論」、「國際情勢與國家安全」、「我國國防現況與發展」、「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戰爭啟示與全民國防」等內容差異不大，但有關「防衛動員與災害防救」課程中包含「全民防衛動員的意義」、「災害防救與應變」及「射擊預習與實作」，其中「射擊預習與實作」在「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開設課程裡並未規畫此課程，在我國因應國家兵役制度變革，國防部及內政部於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告：「83 年次以後出生之役男，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由原

27 立法院，〈高中(職)軍訓教官退出校園之修法芻議〉，郭憲忠，第十屆第一會期，立法院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249&pic=187465>，(檢索日期：2020/8/17)

28 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8 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9 年 9 月)，頁 144。

本應服1年現役（或替代役），改為接受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²⁹因役期之縮短更顯學校深化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的重要，其中學生實彈射擊體驗射擊活動更是年度重大工作，實彈射擊活動在實施前需要事先審慎規劃、並於活動前落實執行射擊預習及安全教育等課程，使其能在安全無虞之下，親身感受射擊現場之震撼與體現防衛技能之重要，達到強化青年學子全民國防意識之目的，而高中職學對於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的回憶多半亦是親身參與實彈射擊。是以2023年後教官離開校園，課程仍保留「射擊預習與實作」，而全民國防師資班亦無此專業課程培訓，未來該課程將以何方式授課，實值得相關單位重視。

二、協助國軍招募及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活動部分

「全民國防」在政府多年來一直大力提倡，尤其在民國85年台海危機之後，更受各界重視，並認為「全民國防」是以軍民一體、文武合一的形式，不分前後方、平時戰時，將有形武力、民間可用資源與精神意志合而為一的總體國防力量。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的意義在於「納動員於施政、寓戰備於經建、藏熟練於演訓」，使全國民眾建立「責任一體、安危一體、禍福一體」的共識，達到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全民國防的最高理想。³⁰是以國防部每年均會辦理相關活動來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例如：全民國防知性之旅、國軍營區開放、寒暑期戰鬥營、全民國防有獎徵答、南沙研習營、全民國防相關圖文設計或徵稿等，同時教育部或各縣市亦會辦理相關活動來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然不論是國防部、教育部或是縣市規畫之活動，目前在學校大多由軍訓教官來負責協助推動，絕大多數軍訓教官均來自於軍中，是類活動均會不遺餘力配合辦理。屆時由「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培育合格的師資係以正式老師任用，主要工作為全民國防教育授課非推動全民國防教育，除非兼任相關行政工作，否則是否配合上述單位辦理活動協助推動全民國防，也是有待相關部門探究。

近幾年國防部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暨國軍志願役招募宣導，均會配合高中職以上學上活動，例如：升學博覽會、校慶活動、運動會等，蒞校設置招募攤位。希望藉由國軍靜態裝備陳展、動態射擊體驗及招募攤位設置，拉進國軍與師生距離，幫助學校學子認識國軍，進而了解部隊服役環境，以及部隊創新變革作為，都是為了使年輕學子認識國軍，進而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投身軍旅，然相關活動以目前現況來看，在各學校均由教官室來協助負責辦理。雖然就業務屬性來說國軍人才招募屬於生涯輔導規劃之一環，係輔導室業務，然校內各級人員均會認定國軍單位與軍訓教官同屬軍人，所以刻板印象把國軍招募歸類給教官室負責，而國防部亦經常邀集教官辦理說明會或研習，透過政策宣達

²⁹ 政治中心，〈役男僅受訓4個月 審計部：影響戰力〉，《蘋果日報》，2015年8月27日，版A7。

³⁰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全民國防簡介〉，政戰資訊服務網，網址：<https://gpwd.mnd.gov.tw/>，（檢索日期：2020/8/17）

及意見研討，期能集思廣益，建立軍訓教官協助執行招募工作的能量，讓教官在學校利用課堂、集會或相關場合協助國軍人才招募。³¹如前所述全民國防教師主要工作為全民國防教育授課非協助國軍招募，其是否會額外配合國防部或人才招募中心辦理相關活動，實有待國防部相關單位研商未來國軍走入校園活動的執行問題。

伍、結語

軍訓教官的角色定位與功能的問題，一直為外界所關注，自軍訓制度自解嚴以後，不斷地成為教育界爭論不已的焦點。然而，軍訓教官的不僅是全民國防教育的教學者，還附帶維護校園及學生的安全事宜，在當前校園多元發展過程中，更是扮演著默默付出的耕耘者角色。³²立法院於 2013 年 6 月三讀高級中等教育法，通過附帶決議略以：「有關教官之職能雖已朝向多元，對於校園安全與國防教育有其貢獻，教育部在學生安全及校園安定無虞之下…並與國防部會商於八年內讓教官回歸國防體系」，因應立法院陸續決議，確定教官在 2023 年全面離開校園，軍訓教官現行的工作，在校園安全部分，教育部已推動推動學務創新轉型計畫，預計全面改聘用校安人員取代教官，按期程讓教官退出校園的方向不變，循序漸進滿足高中職校進用校安人員的需求；另針對全民國防教育部分，屆時教官授課的高中職全民國防教育將改由合格正式教師授課，現行教育部已核定淡江大學、政治大學、中正大學、中興大學及中山大學等五所大學開設「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學分班」，108 至 110 學年度開始招生並授課，預計可培育 600 名合格教師。

一般教育、國防教育目的不同，課程與教學方式自然不同，師培過程應培養教育所著重的思辨能力，以符合教育理念。全民國防教育回歸合格教師上課後，在教育現場上或許可以有真正名副其實的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與教學。而教育部安排二軌制的師資培育，顯然其中一軌是為了現役教官取得教師資格而設計。但此倒也無可厚非，畢竟現行國防教育是這些現役教官在上，在教學的銜接上，會有一定的熟悉，不至於全是新手教師。然而現行全民國防教育法的主管機關還是國防部，全民國防教育人員的培訓和在職訓練屬於國防部掌理，這和教育部師資培育是否有所衝突？未來要如何畫清楚職掌？可能要政府先弄清楚全民國防教育的定位。另外，教育、軍訓目的不同，課程與教學方式自然不同，師培過程應培養教育所著重的思辨能力，以符合教育理念。

31 〈國防部邀集軍訓教官講習 積極提升招募成效〉，《軍聞社網站》，2013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s://mna.gpwb.gov.tw/>，(檢索日期：2020/8/17)

32 謝宗甫《軍訓教官退出校園政策之影響評估》(高雄：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7 年)，頁 12-13。

參考文獻

一、 專書部份

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2019)。《中華民國 108 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

沈明室(2019)。《全民國防教育-高中課本》。臺北：幼獅出版社。

沈明室、楊繼宇(2016)。《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全民國防》。臺北：幼獅出版社。

吳傳國(2012)。《全民國防，大學暨在職教育授課參考》。臺北：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陳津萍(2011)。《全民國防-高中暨社會教育授課參考》。臺北：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湯文淵(2006)。《我國全民國防教育戰略觀》。臺北：幼獅出版社。

教育部軍訓處(1978)。《學生軍訓五十年》。臺北市：幼獅出版社。

二、 期刊論文

曾慶華，〈全民國防理念之落實〉，《中華戰略學刊》（臺北：中華戰略學會，2004 年 12 月），頁 42-43。

三、 學位論文

陳正年，2018。《從高中職軍訓教官到校安人員的角色轉變 —以高雄市高中職校為例》。嘉義縣：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振樹，2009。《我國全民國防教育立法過程與執行初期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宗甫，2017。《軍訓教官退出校園政策之影響評估》。高雄：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學程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莊坤輝，2013。《我國全民國防教育推展之研究-以社會教育為例》。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盛忠，2009。《學生對國防通識教育學習滿意度之研究-以臺東縣高中、職校為例》。臺東：國立臺東大學碩士論文。

四、 研討會論文

莫大華，2001/10。〈平民防衛與台澎防衛作戰：臺灣主戰場的經

營〉，「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頁 227。

翁明賢，2001/10。〈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的發展與軍訓教育的重構〉，「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頁 123-124。

金嘉銘，201-5/16。〈我國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之探討-以學校教育為例〉，「2019 淡江戰略學派年會全民國防教育論文」發表會。新北：淡江大學。頁 300-301。

五、 官方文件

行政院公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全民國防教育〉，第 024 卷第 039 期，頁 1。

六、 報紙

政治中心，2015/8/27。〈役男僅受訓 4 個月 審計部：影響戰力〉，《蘋果日報》，版 A7。

七、 網路資源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全民國防簡介〉，政戰資訊服務網，網址：<https://gpwd.mnd.gov.tw/>。

郭憲忠，〈高中(職)軍訓教官退出校園之修法芻議〉，第十屆第一會期，立法院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249&pid=187465>。

王信惠、周昇鴻、詹宗龍、劉曉樺等編著，〈全民國防教育-學科課程地圖〉，頁 212，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網址：<http://ad.pymhs.tyc.edu.tw/nss/p/index>。

國防法，《全國法規資料庫》，網址：<https://law.moj.gov.tw/>。

「12 年國教附帶決議 教官 8 年內退出校園」，《自由時報新聞網》，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691620>。

〈國防部邀集軍訓教官講習 積極提升招募成效〉，《軍聞社網站》，2013 年 12 月 5 日，網址：<https://mna.gpwb.gov.tw/>。

「教部將培育 600 國防教師接棒教官」，《聯合新聞網》，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3998265>

「教官 2023 退出校園教部：協助未來轉教職」，《公視新聞網》，
網址：<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85038>

中共文化統戰現況之研究：以習近平時期為例

政戰學院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林冠萍

政戰學院中軍所副教授 李亞明

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 蔡明朗少校

摘要

中國大陸崛起後，躍升為世界強國之一，逐漸嶄露其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在對臺政策上，不離其擅長之統戰方式。1987年，我國政府開放赴陸探親、旅遊後，兩岸交流隨之頻繁，在經貿、文化交流上更趨熱絡。自習近平主政後，強化對於中華文化的發揚，對臺文化統戰工作上，則重視中華文化認同、兩岸一家親等情感連結，另外也透過文化交流方式，滲透臺灣青年及基層民眾，透過各項惠臺措施分化社會。

基於此，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首先從中共文化統戰的概念及發展進行概述，繼則對於習近平主政下，中共對臺文化統戰之作法及現況做一綜整，再者，剖析中共文化統戰目的及其影響，最後提出我方因應作為做為結論。

關鍵詞：文化統戰、文化認同、兩岸一家親、兩岸交流

壹、前言

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在經濟、軍事、外交各個層面上，躍升為全球主導國家之一，逐漸發揮其影響力。

¹2017年10月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提出在2035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時要建成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強國。²實際上，中共期望建設的不僅是一個具有軍事、經濟實力的強國，還要運用中華文化發揮其文化的影響力，如同中共在西方國家廣設的孔子學院，即是中共藉由中華傳統文化的包裝，向外輸出具有中共黨的意識及價值觀的工具。³

習近平上任後，在多個場合強調對於中華文化的提升及弘揚，他對中華文化的重視被評為是「1949年以來的中國政治家，將中華優秀文化置於人類共有精神財富的坐標系中，這樣的思想價值是不多見的。」他將中華文化透過現代化創造，成為推動民族復興的戰略資源。⁴習近平將中華文化當作是「根」與「魂」，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貫徹於執政中，包括在中國夢以及內政外交各個方面。⁵

1987年，我國政府當局開放大陸探親、旅遊，形同為兩岸間隔絕的高牆開啟一扇通行的門，使兩岸交流逐漸熱絡，發展至今，雙方的經貿、文化交流往來，更為深入。中共對於兩岸關係，在習近平指導下，著重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與拉近兩岸民眾的心理距離，⁶事實上，中共在對臺政策上，始終扣連著統戰工作，分化我國社會，除了政治統戰、經濟統戰、軍事統戰外，更運用兩岸具有共同的中華文化進行統戰工作，如培植赴陸就讀臺生進行引臺拉臺的統戰工作、⁷舉辦相關中華文化營隊或旅遊尋根，闡揚同根同源的情結，⁸甚至是藉由宗教交流進行分化臺灣內部社會的作為。⁹

¹ 楊永明，《亞洲大崛起：新世紀地緣政治與經濟整合》（臺北市：捷徑文化，2018年6月），頁192。

² 〈〈中共十九大〉習近平：2020全面建立小康社會 推動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東森財經新聞網》，（2017年10月18日），<https://fnc.ebc.net.tw/FncNews/headline/9698>，（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³ 〈美瞄準孔子學院，反擊中共海外統戰〉，《大紀元時報》，（2020年8月18日），<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0-08-18/17648181>，（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⁴ 熊玠，〈傳統文化是獨特戰略資源-《習近平時代》選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6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617/c376186-28453910.html>。檢索日期：2020年6月11日。

⁵ 齊先予，〈美學者：傳統文化是習近平的「戰略資源」〉，《新紀元》，（2016年7月14日），<https://www.epochweekly.com/b5/488/16707.htm>。檢索日期：2020年6月11日。

⁶ 〈以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引領新時代對台工作〉，《人民網》，（2018年4月8日），<http://dangjian.people.com.cn/BIG5/n1/2018/0408/c415590-29912774.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30日）。

⁷ 〈北京「引台拉台」培植台青從事統戰〉，《自由時報》，（2020年8月30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96407>，（檢索日期：2020年8月30日）。

⁸ 〈直擊中國統戰最前線，文化夏令營成「台生洗腦營」〉，《蘋果日報》，（2019年9月11日），<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190911/K4V2K555GQZF6KEZVI6GZXBjPM/>，（檢索日期：2020年8月30日）。

⁹ 吳介民，〈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收入吳介民等著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市：左岸文化，2017年），頁33。

中共為實現其統一的目標，對臺灣採用和戰兩手策略，宣稱不放棄武力犯臺，藉由大規模軍事演習、軍機繞臺等恫嚇政府當局及臺灣民眾，另外，又透過宣揚兩岸一家親、同根同源、血濃於水等訴諸親情作為，拉攏臺灣民心，貫徹其統戰目的，分化敵方，有利己方之指導。

本文在探討習近平上任後，對臺運用文化統戰之作為，首先，對文化統戰概念及其發展脈絡作一闡述，再者，歸納中共對臺文化統戰的策略及影響，最後，提出我方的因應之道。

貳、文化統戰的概念與發展

一、統戰的歷史脈絡

統戰一詞乃是源自統一戰線的簡稱，又稱聯合陣線，被中共視為是革命勝利、建設、改革及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中共視其統戰理論是承襲自馬克思主義，融合中國經驗後，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理論，自中共的創建者及歷屆領導人，均指出統戰理論及概念的重要。

毛澤東指出為了戰勝敵人，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確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在統一戰線的過程中，運用「既聯合又鬥爭，既統一又獨立的兩面策略」；¹⁰周恩來認為統戰的具體方法是求同存異及團結多數，「同」是指不同的階級、階層、政黨、組織等在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基礎上的統一性，「異」是指這些不同的階級、階層、政黨、組織等在利益和要求上的差異性。¹¹換言之，要利用雙方所具有的共同條件，達成共識，使矛盾雙方在協調後，達成實現共同利益的結果，在這過程中，是要聯合別人，而不是受別人同化或影響。¹²周恩來對統戰的求同存異說，將同與異的矛盾特點與馬克思主義中唯物辯證法的矛盾法則相呼應。

身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是由工人、農民、勞動者及社會主義愛國者所組成之政治聯盟，成為推動中共改革開放的力量；江澤民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提出統一戰線是中共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推廣大聯合大團結，爭取人心，凝聚力量；胡錦濤時代，則強調要加強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並加強鞏固及壯大；習近平認為要發展及鞏固愛國統一戰線，將統一戰線及統戰工作置於共產黨的重要位置。¹³從中共創建者及歷屆領導人對統戰理論的重視，可以了解到統一戰線的概念深刻影響中共在治理及統治的過程。

中共官方在統戰理論的發展，從出版的圖書，可見其內容。在《中國統一戰線教程》，

¹⁰ 中共中央統戰部等編，《中國統一戰線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

¹¹ 鄧小明，〈周恩來統戰工作的特點探析〉，《文教資料》，第3期，2006年，頁51-52。

¹²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論統一戰線〉，《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04。

¹³ 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中國統一戰線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4。

統一戰線定義是指不同階級、政黨及團體，為了達成共同目標，立基於共同利益之下所形成之聯盟。¹⁴在《黨政幹部統一戰線知識讀本》中，統一戰線的定義係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實現各個時期特定的戰略目標和任務，團結本階級各個階層和政治派別，併同其他階級、階層、政黨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標下結成的政治聯盟。」¹⁵從前述對統戰的定義在於以團結所有可團結的力量，包括不同階級、政黨等，以形成政治聯盟為強調重點。

2015年5月18日，中共制定頒布《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條例內對統戰定義為「統一戰線，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愛國者的聯盟。」¹⁶此為中共官方關於統一戰線工作的第一部法規。此時期對統戰的論述，是要以共產黨為主要領導，結合不同階級、政黨，建立共同利益為基礎的聯盟。

綜合前述，中共對於統戰的發展，從各領導人及出版圖書中均可看出重視程度，統戰隨著中共政權的建立及時代背景的改變，其本質意涵不變，統戰即是為了達成共同目標，凝聚團結的力量，連結不同的組織，以壯大自身力量，進而減少，或孤立主要敵人，藉由拉攏，無形中改變目標對象的認知，擴大自己的聯盟。

二、文化統戰的概念與發展

毛澤東在早期領導中共時，將文化視為重要的一環，他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但同時又能指導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¹⁷實際上，毛澤東提出的背景在於當時中國的民眾不識字者眾多，知識水平較低，另一方面在偏鄉地方對於藝術上也較缺乏，他希望透過一切可用的力量，來改造團結民眾；另一方面，面臨當時對日抗戰的時空背景下，運用文化的影響力，宣傳愛國意識以連結知識分子，推展統戰工作，因此，當時文化統戰的作用除了克服落後文化，還包括團結知識分子為目的。¹⁸

文化統戰的概念，最早源自毛澤東在1940年時「新民主主義論」中：「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並為它們服務的。在中國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樣，有一個統一戰線，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¹⁹此為文化統戰概念的雛型；1942

¹⁴ 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中國統一戰線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0。

¹⁵ 中共中央統戰部，《黨政幹部統一戰線知識讀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6年），頁1。

¹⁶ 〈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人民網》，（2015年9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23/c64107-27622040.html>，（檢索日期：2020年2月24日）。

¹⁷ 〈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華智庫園》，（2012年4月17日），<http://www.zhzy.com/news/?2729.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5日）。

¹⁸ 林卓才，〈新時期文化統戰簡論〉，《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2期，1999年，頁6-9。

¹⁹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699。

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相對應於軍事戰線的文化戰線概念，他指出要戰勝敵人不僅是依靠著手裡有武器的軍隊，更要有文化的軍隊來團結、教育群眾以戰勝敵人，²⁰面臨對日抗戰背景下，在此次講話中，毛澤東提出要組織文藝工作者團結人民的向心，說明文化統戰的目的及方式；在 1944 年「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演講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文化統戰的任務為「聯合一切的舊知識份子、舊藝人、舊醫生來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等文化統戰的指導，²¹亦即藉由文化工作團結群眾、改造群眾，由此可觀察出，在毛澤東時代即開始形成文化統戰的最初概念，透過聯合不同的文化及團結文藝界人士來實行文化統戰。

文化是一種價值觀、理念，可以對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成員形成整合的力量，以凝聚向心及歸屬感，此外，文化所具有的傳染及同化力，可以影響社會大眾。²²文化統戰一詞從字面分析之，是以文化來做統戰工作，是指將文化與統戰視為核心以聯合人民的工作。²³事實上，統戰工作為主要目的，文化則是用以包裝統戰以降低政治色彩，藉由文化的力量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

中共的文化統戰是運用中華文化進行統戰工作，由於文化大革命使中共面臨文化斷層，後續在中共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發展，繼而重拾中華文化，²⁴並成為中共推展統戰工作的媒介。中共在對臺文化統戰工作上，運用中華文化的緣由在於臺灣多為大陸漢族遷居，因此傳承著中華文化，運用共有的文化對臺進行統戰工作，強化臺灣民族的文化認同，進而推動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²⁵因此，對於中共文化統戰的定義可以歸納為，以實現一定目標為訴求，運用文化作為一種方式以開展統戰工作。

參、習近平主政後，中共對台文化統戰的策略

習近平在 2019 年「告臺灣同胞書」40 週年之際，明確指出要深化兩岸交流與發展，與臺灣同胞共圓中國夢及兩岸統一的願景，²⁶中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中共政協會議中，有關涉臺工作，提出要深化與臺灣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各界人士交流交往，²⁷由此觀察，兩岸交流是中共對臺工作的重點之一。隨著中共國力強盛，軍事實力的提升，中共

²⁰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頁 865。

²¹ 林卓才，〈文化統戰探源〉，《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1 期，2000 年，頁 25-28。

²² 陳登源，〈「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文化統戰策略〉，《瀋陽大學學報》，第 19 卷第 2 期，2017 年，頁 161-165。

²³ 李海威，〈新時期文化統戰的內涵及價值〉，《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2 期，2015 年 4 月，頁 52-54。

²⁴ 張穎，〈文化統戰視野下民營企業家之身份認定〉，《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178 期，2012 年 8 月，頁 95。

²⁵ 許立坤，〈論文化統戰工作的基本任務研究〉，《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2009 年，頁 40-44。

²⁶ 〈【告臺灣同胞書 40 周年】習近平 4240 字談話全文看這裡〉，《中時新聞網》，（2019 年 1 月 2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02002101-260409?chdtv>，（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5 日）。

²⁷ 〈中共政協工作報告 對台只提 39 字〉，《聯合新聞網》，（2020 年 5 月 21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4580647>，（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5 日）。

也漸將重點轉向推展文化軟實力，兩岸關係中，軍事實力已明顯傾向中共，文化方面，中共更是致力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欲凸顯其正統地位。中共在慣用的和戰兩手策略中，操控其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但不變的是其自詡的三大法寶之一—「統戰工作」更是深入臺灣基層，除了社會大眾認知的政治統戰、經濟統戰、軍事統戰外，其文化統戰工作更是掠過政府當局，直接滲透在臺灣各階層，發揮其目的，以下分述中共對臺文化統戰之策略。

一、強調中華文化認同

文化價值先於個人出生並長期存在於社會生活裡，塑造了個人，進而為個人所繼承流傳。²⁸在民族或國家發展中形塑其特有文化價值，影響內部成員，進而使成員產生認同，這些共同的文化、歷史、習俗形成個體的情感融合，而成為文化認同，²⁹進而發展為民族歸屬感。³⁰

中華文化在五千年的傳承下，具有豐富的內涵，習近平上台後，多次公開強調要弘揚中華文化，提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個自信，³¹其中最根本為文化自信，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2014年，習近平參加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中指出：「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³²他強調文化認同除了是團結民族的重要因素，更是鞏固中華民族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事實上，習近平對於文化的重視在於強調文化認同，推進國家認同與政治認同，另一方面，則運用文化認同，凝聚民族向心，以穩固中共政權。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對於文化認同的強調，不僅透過公開場合談話，更運用青年營隊等活動，強化臺灣青年對中華文化認同。2019年的「台胞青年千人夏令營」及「中華兒女文史體驗營」營隊，主要為兩岸交流活動，但內容多以強調中華文化認同為訴求，拉攏臺灣青年認同中共治國理念。³³此外，中共對臺統戰工作始終不懈，為了強化引臺拉臺的青年統戰工作，透過大陸當地組織「臺灣青年驛站」，培育對臺工作的青年幹部。

²⁸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頁149-150。

²⁹ 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5期，1997年，頁88。

³⁰ 〈堅定文化自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光明日報》（2019年07月04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9-07/04/nw.D110000gmrb_20190704_1-06.htm，（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³¹ 〈從「三個自信」到「四個自信」—論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構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7月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6/0707/c49150-28532466.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5日）。

³² 〈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年9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30/c64094-25763749.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5日）。

³³ 〈《蘋果》獨家直擊 夏令營洗腦台生〉，《蘋果日報》，（2019年9月12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0912/GWE4ALACJ304VV6RAQNQ5M2DOE/>，（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中共對於參與組織的成員，強化其對中共治國理念的認同，透過研讀習近平思想等書籍，展示對中共的認同及愛國信念。³⁴

對中共而言，文化認同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部分也是海外統戰工作的方式。³⁵在兩岸關係中，運用中華文化認同，以凝聚兩岸人民的情感連結，進一步發展為對中共的認同，影響中共對於兩岸統一的進程。

二、倡導兩岸一家親

自明清以降，大陸東南沿海居民陸續移居臺灣，進而定居臺灣；另一方面，國民政府遷台後，兩岸在政治因素下，使得部分民眾因而與大陸親屬分開，直至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始得往來。

習近平在 2013 年與連戰會面時，提出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因此，兩岸關係發展中，希望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在具有共同文化、血緣關係下，共同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³⁶2014 年，中共兩會開幕式中，則是首次將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寫入工作報告中。³⁷2019 年，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 40 週年之際發表談話，內涵主要訴諸兩岸間的血緣連結，營造出民族主義愛國情懷，習近平共提出五點主張，最終目的均在於兩岸統一。

事實上，大陸歷屆領導人都曾提及骨肉同胞、血緣關係相關詞彙來描述兩岸同胞關係，中共多次強調兩岸一家親，在於運用一家人的思維，以親情的柔軟攻勢，彈性處理兩岸間的分歧，³⁸主要目的在兩岸一家親的概念下，推展互信理念，促進兩岸關係和緩以進一步推動兩岸統一。

三、頒布惠臺措施

兩岸關係隨著時代背景不同而呈現緊張或和緩狀態，但中共在對臺工作上始終未曾鬆懈，操作其慣用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不放棄武力犯臺、軍機繞臺等威懾我國民眾，另一方面則頒布相關惠臺措施拉攏、利誘我國工商業及各界人士。

特別的是，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布「關於促進兩岸經

³⁴ 〈中國吸收台生培訓對台統戰幹部 先被要求讀「習思想」〉，《自由時報》，(2020 年 8 月 29 日)，<http://m.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75490>，(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³⁵ 韓士海，〈新時代文化認同視角下海外統戰工作路徑選擇〉，《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92 期，2018 年，頁 40。

³⁶ 〈習近平總書記會見連戰一行〉，《人民網》，(2014 年 2 月 18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4/0219/c1024-24398451.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9 日)。

³⁷ 〈兩岸一家親 陸對台大政方針〉，《中時新聞網》，(2014 年 3 月 13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13002130-260301?chdtv>，(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³⁸ 〈習近平“兩岸一家親”理念的內涵與踐行路徑〉，《臺灣中評網》，(2018 年 4 月 1 日)，<http://www.crntt.tw/doc/1049/9/2/3/10499239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992398>，(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該措施被簡稱為「惠臺 31 條措施」，內容包括有經濟、文化、醫療等相關措施，提供給臺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臺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同等優惠。惠臺措施中，臺灣人能與大陸人公平競爭，其實也是要凸顯兩岸一家人、一家親，不分你我的認同關係。在文化產業部分，對於臺灣專業人才的吸收、參加中華文化活動計畫、放寬電影、圖書的限制，加強青年學生的交流，³⁹目的在拉攏青年學子與各界專業人士，這可觀察到中共的目標對象逐漸轉以基層民眾為主。

「告臺灣同胞書」內容中曾提及寄希望於臺灣人民，也寄希望於臺灣當局，不過，習近平於「告臺灣同胞書」40 週年之際公開闡述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未再提臺灣當局，這顯示中共的目標主以臺灣人民，而非以政府當局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繼惠臺 31 項措施後，中共在 2019 年 11 月 4 日另頒布「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內含 26 條，另稱「26 條措施」，標榜與大陸地區民眾同等待遇。⁴⁰對於學界、青年學子、藝術工作者、運動員等提供相應優惠待遇。中共在頒布惠臺相關措施，並稱臺灣企業同大陸企業、臺灣同胞同大陸同胞待遇，深化兩岸的融合與發展，實際上是為了施惠臺灣民眾，造成社會分裂，達成其統戰之目的。

四、致力兩岸宗教文化交流

中共學者林其銓從中華文化六親和睦及五倫內涵發展為親緣、地緣、神緣、業緣、物緣的五緣文化⁴¹，進而形成人際關係網絡，凝聚群眾向心，⁴²中共將五緣文化所形成的關係網路，延伸為推展統戰工作的工具，⁴³尤其在兩岸民間信仰交流中，神緣成為中共對臺統戰策略，中共藉兩岸同根同源關係，透過共同的宗教信仰轉化為文化認同，⁴⁴發揮統戰作為。

臺灣民間信仰的繁盛，從大小宮廟林立可見一斑，據內政部統計資料登記有案約有 1 萬 2 千餘間宮廟，⁴⁵此數據尚不包括未登記之私人神壇。臺灣民眾所信仰的神祇眾多，

³⁹ 〈國台辦 31 條惠臺措施全文〉，《中時新聞網》，(2018 年 3 月 1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01000200-260210?chdtv>，(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⁴⁰ 〈中國大陸推出惠臺 26 條 同享國民待遇〉，《CTWANT》，(2019 年 11 月 6 日)，<https://www.ctwant.com/article/13173>，(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⁴¹ 六親指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婭。五倫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五種倫常關係。五緣係指親緣、地緣、神緣、業緣、物緣。親緣指宗族親戚關係；地緣指鄰里鄉黨關係；神緣指共同宗教信仰關係；業緣指同學同行關係；物緣指以物為媒介，實質是以經濟為主要內容的關係。參考自林其銓，〈五緣文化與世界華商經貿網絡〉，《經濟縱橫》，第 3 期，1995 年，頁 52。

⁴² 林其銓，〈五緣文化與亞洲的未來〉，《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第 2 期，1990 年，頁 118-127。

⁴³ 俞建軍，〈淺析閩文化五緣要素在構建和諧統戰文化中的定位與功能作用〉，《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1 期，2010 年，頁 13-16。

⁴⁴ 嚴志蘭，〈閩台五緣關係與台商在福建的發展〉，《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第 4 期，2013 年，頁 93。

⁴⁵ 〈全國寺廟統計表〉，《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網》，<https://religion.moi.gov.tw/ChartReport/Index?ci=1&cid=2>，(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舉例來說如媽祖、保生大帝、關聖帝君、開漳聖王、神農大帝等在臺灣均具有廣大信眾，這些神明的起源均源自大陸地區，隨著大陸地區居民移居臺灣而將信仰一併帶入。

以具廣大信眾的媽祖而言，全臺各地均設置有媽祖廟、天后宮等廟宇，所構連起的社會網絡足以影響地方關係。中共運用民間宗教文化，推動宮廟組織、村里之間與信仰群眾的交流，進而影響兩岸互動，其中以 2000 年宗教直航事件最受矚目。當時，宮廟主委提出代表媽祖信徒的請求，希望政府開兩岸宗教直航，引發關注，⁴⁶被視為透過民間信仰影響兩岸政治的實例。媽祖是兩岸共通的宗教信仰，在清代隨著大陸福建沿海居民移入臺灣，成為移民屯墾時的中心信仰，其後演變為地域性的宗教文化，不僅聯繫著人與神，也連結起人與人間的關係，形成龐大的網絡連結。每年各地的媽祖繞境進香，其中尤以每年三月白沙屯拱天宮及大甲鎮瀾宮的繞境活動更是全台知名的民俗活動盛事，被稱為「三月瘋媽祖」。⁴⁷媽祖信仰所帶來的信眾廣泛，繞境活動熱絡，也間接吸引信眾紛紛參加福建莆田湄洲媽祖祖廟的參拜活動，在臺灣更由鎮瀾宮主導成立臺灣媽祖聯誼會，從事兩岸宗教交流。⁴⁸媽祖聯誼會雖非官方組織，但具有對臺灣各地媽祖宮廟的影響力。

綜上所述，中共以文化包裝其統戰目的，對象也漸以社會基層民眾、青年學子為對象，歸納其對臺文化統戰的作法，主要在運用兩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價值及血緣關係，並將臺灣民眾重視之民間信仰列入其統戰工具，藉此利誘、拉攏臺人向心。

肆、中共對臺文化統戰之評估

一、聚焦臺灣人民，影響臺灣當局

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繫於兩岸領導階層的互信與兩岸人民的認知。⁴⁹自 1980 年代中期，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後，兩岸交流往來漸趨頻繁，無論兩岸關係緊繃或和緩，文化交流並未中斷，中共方面著眼於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拉攏臺灣民心是其對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此外，中共在觀察世界強國，發現綜合國力的提升不僅依靠軍事實力的建構，更仰賴文化軟實力的推展，透過傳播核心價值觀及中華文化，強化中共在國際的影響力。⁵⁰其中，中共在對臺工作上，運用文化推展統戰工作，強調兩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價值。習近平自上台後，多次透過公開場合闡述兩岸一家親的血濃於水關係，實際目的

⁴⁶ 古明君、洪瑩發，〈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收入吳介民等著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市：左岸文化，2017 年），頁 312。

⁴⁷ 〈大甲媽出巡 經濟產值驚人〉，《中央社》，（2013 年 3 月 30 日），<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topic/432/201303300028.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⁴⁸ 〈《兩岸媽祖緣》文化交流活動在津啟動〉，《中時電子報》，（2019 年 6 月 3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603002692-260409?chdtv>，（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⁴⁹ 張五岳，〈中共「十九大」後的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經濟前瞻》，第 174 期，2017 年 11 月，頁 38-42。

⁵⁰ 〈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中的若干重要關係〉，《人民網》，（2017 年 1 月 20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7/0120/c40531-29038315.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則是藉由同胞情取代兩岸在政治上的歧見。再者，中共採取有計畫、大規模的對臺灣人民釋放利多的惠臺措施，以柔性攻勢作為，拉攏人民向心，造成社會分裂，繼而影響政府當局施政。

事實上，中共頒布各項惠臺措施，將臺灣企業同大陸企業優惠，臺灣人民同大陸人民待遇，除了是利誘、拉攏臺灣民眾外，更是一種將臺灣視為大陸一份子的意識形態表現，儘管兩岸尚未統一，此舉也是中共要強化臺灣為大陸領土的一部分的宣示。另外，透過惠臺措施凸顯大陸在整體經濟發展的強盛，貶損我國在經濟發展上的和緩，藉以施壓政府當局，分裂臺灣社會。

二、吸收專業人才，造成社會階層對立

兩岸關係發展中，中共也開始重視對臺文化產業合作的發展，以中共惠臺措施中，發布多項對於青年學子、學界甚至是藝文界人員的優惠，可以觀察中共對於專業人才的吸收，從經濟產業漸轉往文藝界。中共在吸收這些產業的人才，進行培植再運用「臺人拉臺」的概念，培養親中勢力，以宣傳對臺政策。

另外，中共對於青年統戰工作更是不遺餘力，透過臺生交流團體，培養親中的臺灣青年幹部，再透過「引臺拉臺」，擴充青年團體，深化對臺青年統戰工作，青年學子是國家未來棟樑，也將是影響政府決策的多數族群，若能強化青年學子對中共的認同與向心，將提升中共推動兩岸統一的目標。

三、以文化認同推進政治認同

兩岸統一是一種國家認同、政治認同的統一，其前提奠基於文化認同的基礎，中共認為運用文化認同以增進兩岸交流，能達到尋根固本的作用，當中就是要運用兩岸共同的中華文化，凝聚臺灣人民向心與歸屬感。⁵¹實際上，是要運用文化認同推進中共的統一進程。

中共運用中華文化，形塑大中華的思維，欲消弭兩岸間的隔閡與差異，實際上，兩岸間的政治制度差異，加上中共始終未曾正視我國主權的存在，是造成兩岸分歧的原因之一。

四、以宗教信仰干預臺灣政治

兩岸宗教信仰交流，緣起於臺灣政府當局開放臺人赴陸探親旅遊之際，繼而使臺灣各宮廟陸續前往大陸進行謁祖進香活動，其中最為知名的即為湄洲媽祖進香，據統計湄洲媽祖祖廟的建設，以臺灣民眾捐贈為多數，⁵²可見媽祖信仰在臺灣民眾心中的重要性。

⁵¹ 辛美君，〈從「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文化認同是促進國家認同最本源的共鳴〉，《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4期，2018年，頁117-120。

⁵² 〈【湄洲媽祖起底】全球信眾3億人 湄洲媽祖廟臺灣人捐最多〉，《鏡週刊》，(2017年9月20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919fin015/>，(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媽祖文化不僅影響地方關係，更觸及我國民主選舉。⁵³各地媽祖宮廟成為參選人角力的舞台，暗指信仰可能是影響選舉的重要關鍵。2015年11月30日，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率團來台參訪，直奔台中大甲鎮瀾宮參拜，並與宮廟委員及大甲區29個里里長實施閉門會談，會談並未外開放，⁵⁴由於時值臺灣總統大選期間，根據學者古明君、洪瑩發的研究指出，海協會長陳德銘在會談中提及希望大家考量兩岸關係，做出最佳選擇。⁵⁵由此看出，中共名義上呼籲兩岸宗教交流不涉及政治，但實際上，也看出民間信仰成為中共對臺統戰工作的其中一環。

伍、結語

中共已然躍升全球強國之一，在經濟、軍事實力方面的發展有目共睹，對於文化的交流推展亦不遺餘力。習近平主政後，在兩岸關係發展的指導，係維持深化融合與交流，對於臺灣民眾則以兩岸一家親、共同文化等訴諸情感的交融，以拉近兩岸的心理距離。然而，隨著臺灣執政當局的輪替，中共對臺統戰的力度不減，反採深入基層，以臺人拉臺來分化群眾的方式，伺機推動有利於中共之言論及風向。統戰為中共執政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其慣用手法，造成敵方內部分化與矛盾，達成其獲得利益與政治目的之方式，因此，中共對臺統戰工作未曾停歇，對我國而言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文化的影響是需要時間的積累，不過其效果卻是深入而久遠，不可否認的是，兩岸在中華文化薰陶下，自然發展為其核心的價值，然而，由於政治制度的不同，也造成兩岸人民價值觀上的差異。中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推動對臺文化統戰工作，在兩岸一家親的理念中，從內心深層建立臺灣民眾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昇華為對中共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

此外，中共也透過各項文化交流發揮其統戰目的，目標對象也鎖定在青年學子及基層民眾，發揮統戰分化敵人的作用。基此，在中共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其對臺政策絕不脫離統戰工作，為了使兩岸同胞的認知一致，文化統戰工作勢必成為中共對台工作的重

⁵³ 〈板橋慈惠宮拜媽祖求選舉順利 蔡英文：臺灣主權守得住〉，《聯合新聞網》，(2019年8月11日)，<https://udn.com/news/story/12702/3982761>，(檢索日期：2020年3月13日)；〈太平媽祖遶境藍綠白不缺席 李佳芬趕最後一刻到了〉，《聯合新聞網》，(2019年11月2日)，<https://udn.com/vote2020/story/12702/4141076>，(檢索日期：2020年3月13日)；〈媽祖、關公、玉帝、城隍爺…選將不端牛肉卻逼神明背書〉，《聯合新聞網》，(2013年3月30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9/4066715>，(檢索日期：2020年3月13日)。

⁵⁴ 〈直奔鎮瀾宮 陳閉門會里長〉，《聯合新聞網》，(2015年12月1日)，https://udndata.com/ndapp/Story?no=8&page=1&udndbid=udnfree&SearchString=s6%2B8d7vKK6TptME%2BPTIwMTUxMjAxK6TptME8PTIwMTUxMjAyK7P4p089wXCmWLP4fLhnwNmK6bP4fMFwplix37P4fFVwYXB1cg%3D%3D&sharepage=20&select=1&kind=2&article_date=2015-12-01&news_id=8202550，(檢索日期：2020年3月13日)。

⁵⁵ 古明君、洪瑩發，〈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收入吳介民等著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市：左岸文化，2017年)，頁312。

要方式。

文化交流中應重視雙方的互信與互惠，尊重彼此的價值與信念，不應以一貫的思維理念強加於他人身上。對此，我國政府應正視中共對於青年及基層民眾文化統戰的作為，尤其青年學子做為未來國家的主人翁，若在中共傳達的政治資訊下影響其認知，進一步重構對於中共的認同，勢必對我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在基層民眾上，中共的文化統戰則可能對我社會進行分化，擾亂民眾對於國家的信念。因此，我國政府必須以理性、客觀來分析中共文化統戰的手法，透過公開資料向社會大眾說明，堅定我國政府的立場與態度，避免落入中共分化的圈套。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中共中央統戰部，《黨政幹部統一戰線知識讀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6年）。
- 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中國統一戰線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 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中國統一戰線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 中共中央統戰部等編，《中國統一戰線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 吳介民等著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新北市：左岸文化，2017年）。
-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
- 楊永明，《亞洲大崛起：新世紀地緣政治與經濟整合》（臺北市：捷徑文化，2018年）。

二、期刊

- 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5期，1997年。
- 李海威，〈新時期文化統戰的內涵及價值〉，《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2期，2015年4月。
- 辛美君，〈從「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文化認同是促進國家認同最本源的共鳴〉，《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4期，2018年。
- 林其鈺，〈五緣文化與世界華商經貿網絡〉，《經濟縱橫》，第3期，1995年。
- 林其鈺，〈五緣文化與亞洲的未來〉，《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第2期，1990年。
- 林卓才，〈文化統戰探源〉，《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期，2000年。
- 林卓才，〈新時期文化統戰簡論〉，《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2期，1999年。
- 俞建軍，〈淺析閩文化五緣要素在構建和諧統戰文化中的定位與功能作用〉，《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1期，2010年。
- 張五岳，〈中共「十九大」後的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經濟前瞻》，第174期，2017年11月。
- 張穎，〈文化統戰視野下民營企業家之身份認定〉，《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178期，2012年8月。
- 許立坤，〈論文化統戰工作的基本任務研究〉，《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20卷第2期，2009年。
- 陳登源，〈「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文化統戰策略〉，《瀋陽大學學報》，第19卷第2期，2017年。
- 鄧小明，〈周恩來統戰工作的特點探析〉，《文教資料》，第3期，2006年。

韓士海，〈新時代文化認同視角下海外統戰工作路徑選擇〉，《黑龍江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92 期，2018 年。

嚴志蘭，〈閩台五緣關係與台商在福建的發展〉，《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第 4 期，2013 年。

三、網頁

〈直擊中國統戰最前線，文化夏令營成「台生洗腦營」〉，《蘋果日報》，2019 年 9 月 11 日，<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190911/K4V2K555GQZF6KEZVI6GZXBJPM/>，（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30 日）。

〈〈中共十九大〉習近平：2020 全面建立小康社會 推動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東森財經新聞網》，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s://fnc.ebc.net.tw/FncNews/headline/9698>，（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兩岸媽祖緣》文化交流活動在津啟動〉，《中時電子報》，2019 年 6 月 3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603002692-260409?chdtv>，（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蘋果》獨家直擊 夏令營洗腦台生〉，《蘋果日報》，2019 年 9 月 12 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0912/GWE4ALACJ304VV6RAQNNQ5M2DOE/>，（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告臺灣同胞書 40 周年】習近平 4240 字談話全文看這裡〉，《中時新聞網》，2019 年 1 月 2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0102002101-260409?chdtv>，（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5 日）

〈【湄洲媽祖起底】全球信眾 3 億人 湄洲媽祖廟臺灣人捐最多〉，《鏡週刊》，2017 年 9 月 20 日，<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919fin015/>，（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大甲媽出巡 經濟產值驚人〉，《中央社》，2013 年 3 月 30 日，<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topic/432/201303300028.aspx>，（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3 日）。

〈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 年 9 月 30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30/c64094-25763749.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5 日）。

〈中共政協工作報告 對台只提 39 字〉，《聯合新聞網》，2020 年 5 月 21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4580647>，（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5 日）。

〈中國大陸推出惠臺 26 條 同享國民待遇〉，《CTWANT》，2019 年 11 月 6 日，<https://www.ctwant.com/article/13173>，（檢索日期：2020 年 8 月 29 日）。

〈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人民網》,2015年9月23日,
<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23/c64107-27622040.html> , (檢索日期:2020年2月24日)。

〈中國吸收台生培訓對台統戰幹部 先被要求讀「習思想」〉,《自由時報》,2020年8月29日,
<https://m.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275490>, (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太平媽祖遶境藍綠白不缺席 李佳芬趕最後一刻到了〉,《聯合新聞網》,2019年11月2日,
<https://udn.com/vote2020/story/12702/4141076> , (檢索日期:2020年3月13日)。

〈以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引領新時代對台工作〉,《人民網》,2018年4月8日,
<http://dangjian.people.com.cn/BIG5/n1/2018/0408/c415590-29912774.html> , (檢索日期:2020年8月30日)。

〈北京「引台拉台」培植台青從事統戰〉,《自由時報》,2020年8月30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96407> , (檢索日期:2020年8月30日)。

〈全國寺廟統計表〉,《內政部全國宗教資訊網》,
<https://religion.moi.gov.tw/ChartReport/Index?ci=1&cid=2> , (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兩岸一家親 陸對台大政方針〉,《中時新聞網》,2014年3月13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13002130-260301?chdtv> , (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板橋慈惠宮拜媽祖求選舉順利 蔡英文:臺灣主權守得住〉,《聯合新聞網》,2019年8月11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2702/3982761> , (檢索日期:2020年3月13日)。

〈直奔鎮瀾宮 陳閉門會里長〉,《聯合新聞網》,2015年12月1日,
https://udndata.com/ndapp/Story?no=8&page=1&udndbid=udnfree&SearchString=s6%2B8d7vKK6TptME%2BPTIwMTUxMjAxK6TptME8PTIwMTUxMjAyK7P4p089wXCmWLP4fLhnwNmk6bP4fMFwplix37P4fFVwYXB1cg%3D%3D&sharepage=20&select=1&kind=2&article_date=2015-12-01&news_id=8202550 , (檢索日期:2020年3月13日)。

〈美瞄準孔子學院,反擊中共海外統戰〉,《大紀元時報》,2020年8月18日,
<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0-08-18/17648181> , (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國台辦31條惠臺措施全文〉,《中時新聞網》,2018年3月1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01000200-260210?chdtv> , (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堅定文化自信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光明日報》，2019年07月04日，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9-07/04/nw.D110000gmrb_20190704_1-06.htm，
(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從「三個自信」到「四個自信」—論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構行〉，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7月7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6/0707/c49150-28532466.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5日)

〈習近平“兩岸一家親”理念的內涵與踐行路徑〉，《臺灣中評網》，2018年4月1日，
<http://www.crntt.tw/doc/1049/9/2/3/10499239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992398>，(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習近平總書記會見連戰一行〉，《人民網》，2014年2月18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4/0219/c1024-24398451.html>，(檢索日期：2020年3月9日)。

〈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中的若干重要關係〉，《人民網》，2017年1月20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7/0120/c40531-29038315.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9日)。

〈媽祖、關公、玉帝、城隍爺…選將不端牛肉 卻逼神明背書〉，《聯合新聞網》，2013年3月30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39/4066715>，(檢索日期：2020年3月13日)。

〈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華智庫園》，2012年4月17日，
<http://www.zhsky.com/news/?2729.html>，(檢索日期：2020年8月25日)。

熊玠，〈傳統文化是獨特戰略資源—《習近平時代》選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6月17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617/c376186-28453910.html>。
檢索日期：2020年6月11日。

齊先予，〈美學者：傳統文化是習近平的「戰略資源」〉，《新紀元》，2016年7月14日，
<https://www.epochweekly.com/b5/488/16707.htm>。檢索日期：2020年6月11日。

我國軍人不在籍投票可行性之研究：電子投票的適用性及配套措施

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盧怡君

陸軍官校資訊系副教授程凱

陸軍官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陳憶綾

摘要

自從 2018 年地方九合一選舉結合公投之投票亂象以來，再度湧起我國選舉制度的檢討聲浪，除了選舉流程、投開票所數量及公投是否與大選結合的相關問題外，其中對於「不在籍投票的實行與適用方式」亦引起廣泛的討論，從民調中我們可知社會大眾對不在籍投票已有一定程度的需求度與認同度，而立法機關對於不在籍投票也有相當多次的提案討論，然而我國在實質的制度改革上卻毫無進展。本文參考其他國家的執行實例與配合我國選區制度現況，以軍人族群提出以電子投票作為我國實施不在籍投票的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顯示軍人族群對於不在籍投票的認同度可有效提升對於電子投票之接受度，從電子投票的安全驗證機制切入可為不在籍投票可信度的基本基礎的建立，並從選務技術層面上，電子投票可有效解除傳統紙本投票在實施不在籍投票時衍生之難以克服之問題，例如：不同選區之選票分類與運送等，長遠來看對選務人力與選舉成本的效率也將有所提升。

關鍵字：不在籍投票、電子投票、紙本選票、選舉

*陸軍官校政治系講師。Email:clairelu0980910026@gmail.com。

**陸軍官校資訊系副教授。Email:chainkai@ieee.org。

***陸軍官校政治系助理教授。Email:cylhkj@yahoo.com.tw。

壹、緒論

不在籍投票為民主國家保障公民基本選舉權力的一種投票制度，全球已有將近三十個國家實施，包含美歐多國和鄰近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甚至菲律賓、馬來西亞也都在列，因此實施不在籍投票已成為一個普遍的民主潮流趨勢。我國多年來持續研議實施不在籍投票之可能性，且自1995年起，內政部即開始研修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不在籍投票一直都被列入討論，同時中央選舉委員會對於不在籍投票議題多年來亦持續投入研究，而立法院關於不在籍投票專法的提案與研討更可說是層見疊出。由於不在籍投票在許多國家均有實行的先例，而各國實施不在籍投票的方式不盡相同，大抵可分為通訊投票、轉移投票、代理投票、指定投票所投票、提前投票及電子投票(包含網路投票)¹。其中本文特別想要探討的是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電子投票應用於社會之深度廣度也愈趨明顯，加以許多已開發國家莫不以科技化政府作為政策導向，世界各國將所有原本紙本作業改以電子化取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這波熱潮也蔓延至民主政治的選舉中，電子投票隨之發展並實作應用在真實的選舉中。目前以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的評估結果，認為在實施不在籍投票的初步選項中，轉移投票或提前投票會是較有可能的作法²，也會較適合軍人特殊工作需求。然而未來也會以結合國家E化政策及長期選務效率來考量，我們期待以軍人族群實施電子投票作為台灣實施不在籍投票試行的優先選項，故本文內容首先對於目前推行以電子投票方式執行不在籍投票的國家其近年現況簡述，接著說明電子投票作業系統在身分驗證與安全機制的相關流程與作法，進一步結合台灣不在籍投票的相關研究及議案討論中的實行問題，並且對於軍人族群在不在籍投票與電子投票認知及接受度實施一初步調查，以此研討台灣實施不在籍投票結合電子投票的可行性。本文的參考依據包括目前已實行不在籍投票之國家的現行做法及相關文獻以及電子投票的實用機制及應用案例的相關文獻。

「電子投票」在廣泛的定義中，泛指可透過多種電子化的方式，讓人決定其意圖的方法。而從使用電子化的方式又可做進一步區分為：(1)依靠電子投票機器的『電子投票』(Electronic Voting, E-Voting)，(2)依靠網際網路的『網路投票』(Internet Voting, I-Voting)³。電子投票(E-Voting)泛指無論是否採用紙張，所有用於協助投票的電子化設備，皆可稱之為電子投票；而常見可用於協助投票的電子化方式則有 Electronic Voting Machine (電子投票機)、Punch Card (打卡機)、Optical Scan (光學掃描)以及 Lever Machine (拉桿機)…等(NDI 2013)。這類型的電子化投票設備皆放置於固定的投開票所，用於協助使用者進行快速投票，並於投票結束後，透過投開票機的統計迅速得到選舉結果。網路投票

¹ 以下筆者將對電子投票類型有所區分，本文討論之電子投票為所謂使用電子投票機器投票的方式。

² 陳俊華，「中選會：總統大選試辦不在籍投票有難度」，中央社電子報，2019年5月27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1905270102.aspx>，檢索日期：2019年8月24日。

³ 王明禮、林靜嫻、李怡秋與黃百力，「投開票電子化作業之規劃」(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6)

(I-Voting)則是指不限定選舉人必須到特定的投開票所才能夠進行投票行為，採用的方式有透過網際網路或行動電話的文字簡訊(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進行⁴。若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選舉人必須登入選務機關的網站，並透過數位憑證的方式讓選務機關進行身分認證無誤後，才能投票。目前採用的國家相當少，最著名的實例是2007年3月愛沙尼亞的國會選舉全面採用網路投票進行，此亦為全球首例，而在2019年3月愛沙尼亞國會選舉創下了一項新的紀錄，幾乎有一半的投票在線上完成的，比率高達44%⁵。而英國則曾在2002年試辦透過行動電話簡訊進行投票，但僅止於試辦性質，並未大規模推廣使用。

表1 電子投票與網路投票的差異比較表⁶

投票類型 差異性	電子投票 E-Voting	網路投票 I-Voting
是否須前往固定場所投票	選舉人必須前往固定場所實施投票	選舉人可在任何有網路的地方實施投票
是否需事先提出申請	不用事先提出申請	需要事先提出申請
是否已有多數國家使用	已有多數國家實施採用	少數國家實施
使用的普及程度	較為廣泛	較為稀少
身分認證上的困難	較為簡單	較為困難
驗證機制的方式	部分電子投票可有紙本收據當成驗證資料	僅有數位化的選票資料

⁴ 劉芳梅，「英國的地方選舉將試行 SMS 電子投票」，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http://www.find.org.tw/0105/news/0105_news_disp.asp?news_id=1988，2002，檢索日期：2019年7月8日。）

⁵ 黃彥鈞，「愛沙尼亞線上投票比率創紀錄，占總票數近半」，科技新報，2019年3月12日，http://www.find.org.tw/0105/news/0105_news_disp.asp?news_id=1988，檢索日期：2019年7月8日。

⁶ 郭建邦，「適用於我國電子投票之機制設計與研究」，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25。

目前電子投票廣為世界各國採用，但技術及使用方式上卻存在相當的差異性。選擇使用電子投票的國家，有些仍在使用，有些國家已嘗試過但放棄了；還有其他國家正在對電子投票實施測試或計畫進一步的試用。電子投票受到各國採用的主要原因可大約歸納為以下三點：一、為了讓計票作業更為順暢，減少選舉爭議，例如美國；二、利用電子投票增加投票率，或至少維持投票率不下降，例如英國和愛沙尼亞；三、開發中國家推行電子投票主要是讓弱勢或邊遠地區的選民參與，增加選舉透明度及選舉結果的正當性，例如巴西及委內瑞拉。

表 2 目前已使用電子投票的國家

電子投票的使用	國 家
在全國範圍內使用	巴西、愛沙尼亞、印度、委內瑞拉
在某些地區使用	加拿大、美國、秘魯、阿根廷
已經通過測試	不丹、英國、義大利、挪威、哈薩克斯坦、澳大利亞、尼泊爾，菲律賓、澳大利亞、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爾、俄羅斯，蒙古、尼泊爾、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芬蘭、索馬利亞、瑞士
已經停止	比利時，法國，荷蘭，德國，巴拉圭，日本

資料來源：參考網頁自行整理⁷

⁷ Jeremy Laukkonen, “Which countries use electronic voting?” *Lifewire*, <https://www.lifewire.com/which-countries-use-electronic-voting-4174877>, (accessed July 8, 2019)
 E-Voting.CC.2015.” World map of electronic voting 2015.”
<https://www.e-voting.cc/en/it-elections/world-map/>.(accessed by July 11,2019)

表 3 目前採用電子投票的國家使用狀況

國家	實施現況	電子投票的類型	使用區域
美國	<p>1. 在每個州都使用光學掃描機，有時僅用於不在籍選票。</p> <p>2. 有些州在每個地方都有 DRE 投票機，其他州使用紙本投票和 DRE 投票機混合使用。</p> <p>3. 網路、電子郵件和傳真進行投票主要限於特定的軍事人員。</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光學掃描 · DRE⁸ · 有限的網際網路和傳真 	州，郡和區級別
加拿大	<p>1. 聯邦選舉是以紙本選票進行的。</p> <p>2. 某些市級使用光學掃描和 DRE 投票機，某些省級與市級中已使用了網路投票。</p> <p>3. 電子投票僅用於市級，而不是聯邦級別。</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光學掃描 · DRE · 網際網路 	省、市級
阿根廷	<p>1. 於 2004 年首次實施電子投票。</p> <p>2. 2016 年通過了額外的選舉改革立法。</p> <p>3. 為 2017 年全國大選從韓國購買了 DRE 投票機，但出於安全考慮，它們未被使用。</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DRE 	某些地區
巴西	<p>1. 於 1996 年在有限制的實施了 DRE 投票機。</p> <p>2. 於 2000 年擴展到在全國各地使用 DRE 投票機，並在全國各級使用電子投票。</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DRE 	全國範圍

⁸ direct recording electronic voting machine(直接紀錄投票機)，簡稱 DRE。

	<p>3. 於 2011 年，開發基於生物識別技術的新型投票機。於 2012 年開始在選舉過程中實施生物識別。</p> <p>4. 在 2018 年完全取消紙本選票和可通過選票驗證的紙本追蹤系統。</p>		
秘魯	<p>1. 於 2013 年首次實施電子投票機，並在未來幾年內擴大到覆蓋全國約 14% 的選民。</p> <p>2. 使用觸摸屏 DRE 投票機。</p>	·DRE(觸控式)	某些地區
委內瑞拉	<p>1. 於 1998 年實施了電子投票。</p> <p>2. 在全國各地使用觸摸屏 DRE 投票機，可以列印選民可驗證的紙質記錄。</p> <p>3. 投票結果也以電子方式傳輸，而不需將機器集中。</p>	·DRE(觸控式)	全國範圍
愛沙尼亞	<p>1. 於 2005 年首次在地方市級選舉實施網路投票。</p> <p>2. 於 2007 年，網路投票擴大到全國議會選舉。</p> <p>3. 2009 年歐洲議會選舉也使用了網路投票。</p> <p>4. 傳統紙本投票仍實行中，但無論任何選舉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投票都是透過網路投票完成。</p> <p>5. 2012 年單獨成立電子投票委員會。</p>	·網路投票	全國範圍
印度	<p>1. 於 1982 年首次在印度使用電子</p>	·DRE ·有限制的網路投票	全國範圍

	投票機，但直到很晚才被廣泛使用。 2. 於 1999 年部分採用 DRE 投票機。 3. 於 2002 年在全國範圍內使用電子投票。 4. 使用攜帶式按鈕 DRE 投票機，需使用電池供電。 5. 有限制的使用網路投票。		
--	---	--	--

資料來源:參考網頁自行整理⁹

貳、電子投票作業流程及技術分析

採用電子投票技術必須考慮民眾對於電子投票的接受度，由於所有的投票過程皆在電子投票機中進行，因此，如何讓人信任所圈選的候選人確實被電子投票機所記錄，則是個重要的議題。實施電子投票應合乎以下的要求：

- 一、合法性：具有投票資格之人，經合法認證後即可參與投票。
- 二、隱私性：每張投出的選票，除了本人之外，任何人皆無法使用手段得知其圈選內容，也無法追蹤是誰所投。
- 三、公正性：所投出之選票，須確保內容無法被修改。
- 四、完整性：電子投票機能確實記錄每張所投出之選票，並確保其內容無法被修改及計算票數正確。
- 五、正確性：每張投出之選票，其內容皆可被證明為有效，且投票人所圈選之內容與電子投票機所紀錄之內容須一致。
- 六、強固性：電子投票機須能容忍使用者在少量錯誤操作行為下，機器仍能持續運作。
- 七、不可重複性：不能出現重複投票之情事發生。

⁹ Jeremy Laukkonen,, “ Which countries use electronic voting? ” *Lifewire*, <https://www.lifewire.com/which-countries-use-electronic-voting-4174877> (accessed July 8, 2019)

ACE. The Electoral Knowledge network, <http://aceproject.org/ace-en/focus/e-voting/countries> (accessed July 8, 2019)

八、可驗證性：電子選票應可接受任何人的驗證證明其為有效。

九、可稽核性：應具有於投票結束後驗證計算結果與電子投票圈選之計算對比之機制。

以上九項為實施電子投票過程中應被滿足的需求(蔣麗君 2012)，針對此需求條件為基礎，將技術考量之面相分為四個部分：

一、電子投票與投票人之關聯性為何？

二、電子投票之正確性與驗證性如何得知？

三、電子投票之廢票如何處理？

四、電子投票機如何驗證？

電子投票的技術分析依照所提出的四個考慮面向來做討論：

一、電子投票與投票人之關聯性為何？

傳統的紙本投票上不會有任何投票者的資訊，電子投票也必須達到無記名並確保其隱私性的需求。為了達到電子選票之內容任何人無法用不正當手段獲得以及無法追蹤等要求，可以透過相關管理規範，限制電子投票機或使用方式，並避免有保存或記錄個人資訊的情事發生，讓投票作業單純化，避免造成民眾的不信任感。而在技術層面上，可以利用秘密分享的機制，將電子選票的圈選內容加密保存，且解密金鑰則分別由「地區選務機關」、「中央選務機關保管」，只有同時使用兩方所持之金鑰，才能解開電子選票並驗證其內容¹⁰。

秘密分享機制的動機是源自於金鑰的安全管理，所發展出來的密碼學技術，此方法往往存在於商業或軍事應用中。舉個例子說明：銀行所提供的保險櫃中，多半都存放著客戶的重要資產，倘若只有一把金鑰，則金鑰的保管就是個問題，且可能發生監守自盜的情形，又或不管在哪方保管人手上，一旦金鑰遺失或是失竊時，保險櫃便無法開啟。這時銀行業者為了取信客戶且證明能夠善盡保管之責，就可以透過秘密分享機制，將保險櫃的這把金鑰分成三份，由客戶、保險櫃管理者、銀行經理分別保管，各所擁有的金鑰皆無法單獨開啟保險櫃。當客戶需開起保險櫃時，必須知會銀行經理及保險櫃管理人員，三份金鑰共同使用才能開啟之。利用這樣的機制，可確保銀行內部人員無法擅自開啟客戶的保險櫃，而客戶也能安心的將貴重資產存放於保險櫃中，這是秘密分享機制的優點。¹¹

¹⁰ Marti´n Isbelia, “2004 Venezuelan Presidential Recall Referendum (2004 PRR): A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lectronic Voting Data Transmissions.” *Statistical Science*, 2011, 26(4):528-42。

¹¹ 王旭正、李榮三、許富皓，*資訊安全與智慧、行動網路安全應用實務*，台北：博碩文化 2015。

以秘密分享群體關係的方式為應用，也舉個實際的例子：目前有許多的計畫在執行時都有一位計畫主持人，負責有關該計畫的一切聯絡事宜。但若計畫主持人而後因另謀高就或是自行創業，往往會涉及商業機密或是無人知曉整體計畫之運作而造成計畫停止執行。若是多派幾位計畫主持人共同參與，與該計畫有關之運作都必須多位主持人(不須全部)共同合作才能處理。藉此免除只有單一位主持人而發生的問題。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化，秘密分享的技術亦擴展到很多領域與實務系統，如影像、語音、雲端應用…等領域，是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技術。

1979年，Shamir (1979)首先提出一秘密分享概念，此方法稱作 secret sharing scheme 分享計畫，往後許多相關研究皆是以其為基礎做延伸。密碼系統必須使用金鑰來保護一些秘密文件，因此一個密碼系統要真正安全可靠，除了密碼系統本身在設計上要考慮到種種攻擊之外，如何保護系統的金鑰，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公開金鑰密碼系統內，所有的公開以及秘密金鑰均須安全而妥善的保管，一個比較直接的想法便是找一把系統主金鑰(master key)來保護管理這許許多多的金鑰，但是又該如何來管理這把異常重要的系統主金鑰呢？一般而言我們可能會有以下幾個想法：

(一)找一個可信任的人來保管。

(二)將此主金鑰複製幾份，分給好幾個可信賴者來保管。

(三)將此主金鑰分成幾個小金鑰，分給幾個可信賴者來保管，需這幾個人集合在一起，才能拼湊出完整的系統主金鑰。以上幾種保管主金鑰的方法都有一些缺點存在。第一個方法如果所託非人，那後果便不堪設想了，即使這個人確實是可信賴的，但若此遺失了主金鑰，或者在某一些原因之下離開了系統(例如:死亡)，那麼整個密碼系統的維護便面臨重大的危機，所以此法可行性不高。第二種方法當然比較不容易遺失，但是因金鑰保管者人數增加，發生背叛的危險性也相對增高，因此可行性也不高；第三種方法的可信度明顯提高，因為所找出的幾個可信賴者同時背叛的機率實在太低，但若這幾個保管主金鑰的人，只要有一人不願意來拼湊出主金鑰的話，那後果便不堪設想了。

為了克服以上幾種保管方法的一些缺失，1979年，在現代密碼學極為有名的學者 Shamir 提出秘密分享方案(secret sharing scheme)的構想與方法來解決主金鑰管理的問題，這個方案的構想如下：¹²

(一)將密碼系統主金鑰透過某種方法分成 n 把小金鑰(shadow)，分別交給 n 個人來保管。

¹² Shamir A. "How to share a secre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2(11), pp. 612-613.

(二)保管小金鑰的這n個人中之任意k個人會合($k \leq n$),可共同推導出密碼系統的主金鑰。

(三)知道任意 $k-1$ 把(或更少)的小金鑰，無法得知有關主金鑰的任何訊息。

上述之秘密分享方案由於是用來保護系統主金鑰的一個方案，所以又稱為金鑰保護方案(key safe-guarding scheme)；又由於只要擁有不少於 k 把小金鑰即可推導出主金鑰，換言之， k 把小金鑰是推導出主金鑰的一個門檻，所以也稱為門檻方案(threshold scheme)¹³。

二、電子投票之正確性與驗證性如何得知？

這個考慮面向主要是當民眾透過電子投票機完成投票後，必須確保沒有任何人能竄改已投出的選票內容，且每張已投出之電子選票皆可被證明為有效以及確實記錄所圈選之內容，同時所圈選的內容能正確地記錄到所圈選候選人的得票數。另外，電子投票技術還須包含可稽核之清算機制，可於投票結束後驗證記票結果是否與電子投票所圈選之結果相符，這樣才能確保電子投票之正確性與驗證性。在技術層面上可採用選票有效票紙(VVPAT)的方式來審核追蹤，透過 VVPAT 列印出選民剛剛按鈕投票的紙本選票，上面記錄選民的姓名及所投的候選人等資料，以便需要驗票時可供查驗比對。

VVPAT 為了提昇選民對於電子投票系統的信心，Rebecca Mercuri 提出了選民有效投票紙的審核追蹤(Voter Verified Paper Audit Trail, VVPAT)這樣的概念¹⁴。所謂的 VVPAT 是在直接紀錄電子投票機(Direct Recording Electronic Method, DRE)系統上提供一個可以輸出紙本審核紀錄的列印設備，選民可以藉由輸出的紙本紀錄來確認投票機是否已經根據自己的意願，正確的紀錄下投票結果。由於原本的 DRE 系統並無提供這樣的設計，所有的投票紀錄只存在於電子設備內部，當選舉爭議產生時無法提供一個可以用來人工檢驗的驗證方式，一般選民只能以信任投票機不會有舞弊情形產生的前提下來進行投票，在選民對於電子設備的信任不足的情況下，往往會對於電子投票的記錄結果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因此藉由 VVPAT 這樣的一個概念，除了在 DRE 系統上以電子紀錄來儲存投票結果，另外列印輸出紙本紀錄以供選民確認，在確認無誤後將紙本紀錄回收。紙本紀錄可視為重要之確認依據，因此具有正確性，包含 X.800 建議書¹⁵所要求之完整性、不可否認性、身份確認性(當然是確認該次選舉之選票，而非選舉人身份)。而紙本紀錄之內容應與 DRE 系統互相獨立，機器若無問題其

¹³ 楊吳泉，*現代密碼學入門與程式設計*，(台北:全華圖書，1996)，頁 105-110。

¹⁴ Ansari, Pitipatana, Ehsan, Chao Zhang, Aridaman K. and Yun Q. Shi. "Evaluating Electronic Voting Systems Equipped with Voter-Verified Paper Records." *Security & Privacy, IEEE* 6(3):30 - 39.

¹⁵ 為國際電信聯盟電信標準化部門(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縮寫 ITU-T)所指定安全通信及相關機制的國際標準。

內容應與 DRE 系統的電子紀錄一致¹⁶。

三、電子投票之廢票如何處理？

傳統投票方式中所出現的爭議票及廢票，在電子投票中將不會出現。但是否將廢票選項加入電子投票介面中，則視當時選舉方式而定，在技術上來講，提供投票者圈選廢票之選項，並不會增加額外的技術難度。

四、電子投票機如何驗證？

電子投票機的驗證為電子投票過程中重要的一項工作，因不像傳統的人工作業方式，所以電子投票機的設計，必須包含自我檢驗及訊息告知功能，讓選務人員與投票者能夠知道電子投票機是否正常運作。在技術層面上，應做到：功能模組的自我檢測、傳輸時通訊協定的檢測、資料傳輸時的保護檢測、選票資料儲存時的檢測¹⁷。

參、不在籍投票結合電子投票案例

不在籍投票制度又稱為「缺席投票」(absentee voting)是指允許暫時缺席於其居住地的合格選民在大選中投票的方法，這樣的設計也是國家保障公民基本參政權的一種投票機制，申請不在籍投票的選民通常會具備以下條件：

- 在選舉日時，選民必要性的必須缺席於自己的投票站。
- 身體的疾病或殘疾導致無法出席投票站。
- 軍人或受其扶養照顧之眷屬。
- 暫時居住國外的公民。

¹⁶ 吳正義，「選民可即時檢驗之電子投票系統設計」，義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2009。

¹⁷ Ben Goldsmith, and Holly Ruthrauff, "Overview of Electronic Voting and Counting Technologies" 2013, https://www.ndi.org/sites/default/files/l_Intro.pdf (accessed July 12, 2019)

表 4 參考各國實施不在籍投票的方式

名稱	實施方式	常用族群
通訊投票 (Postal Voting)	以郵寄方式代替親自投票	現役軍人、駐外公務員、海外公民
代理投票 (Proxy Voting)	委託他人代表投票	不識字或失明之公民
事先投票 (Advance Voting)	選舉人投票日不在國內或選區，允許其在選舉前數日先行投票	不在戶籍地工作、求學之公民
設置特別投票所 (Polling Booths in Special Institution)	針對特定身分之選民在其工作或生活之場所設置投票所	監獄受刑人、療養院老人、不良於行之病患
移轉投票 (Constituency Transfer)	選民向選務機關申請在其生活所在地選舉區投票	不在戶籍地工作、求學之公民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¹⁸

目前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實施不在籍投票，軍人則是必定會被納入的族群，而電子投票則是現代國家實施不在籍投票時會被考量的方式，在不會增加過多選務機關無法負荷的成本的基礎下，如果能夠使不同族群的公民都能方便行使其參政權，電子投票是一個必然的選項¹⁹。即使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社會問題，導致在做法上各國有其差異，本文以下列舉數個可供參考之案例作為研討。

¹⁸ 楊惟任，「我國實施不在籍投票制度之可行性研究」，*醒吾學報*，49:85-108。

¹⁹ Prandini and Marco Ramilli. "A Model for E-voting Systems Evalua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Definition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e-Service Journal* 8(3):42-72.

美國

美國不在籍投票的作法已行之有年，但各州實施的不在籍投票方式卻有所差別，而電子投票方式最常使用的族群是所謂軍人或無法在戶籍投票的海外公民，聯邦政府 1986 年通過「在役軍人及海外公民不在籍投票法」(Uniformed and Overseas Citizens Absentee Voting Act, UOCAVA)，規定「不在住所之著制服服勤投票者（即海外軍人）」及「海外投票者」有特殊權利以不在籍方式，在聯邦公職選舉中登記與投票。2009 年通過的聯邦軍事和海外選民權利法案(MOVE)，要求各州至少以一種電子格式(電子郵件，傳真或線上交付系統)向 UOCAVA 選民提供空缺的不在籍選票。

表 5 美國各州不在籍投票方式的實施方式之現況

實施方式	實施地區
選民僅能使用郵寄方式回傳選票	19 個州。 阿拉巴馬州，阿肯色州，康乃狄克州，喬治亞州，伊利諾伊州，肯塔基州，馬里蘭州，密西根州，明尼蘇達州，新罕布夏州，紐約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南達科他州，田納西州，佛蒙特州，弗吉尼亞州，威斯康辛州和懷俄明州。
允許選民使用傳真回傳選票	7 個州。 分別為阿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馬州，羅德島州和德克薩斯州。
允許選民使用電子郵件或傳真回傳選票	19 個州及特區。 德拉瓦州，哥倫比亞特區，夏威夷，愛達荷州，印第安納州，愛荷華州，堪薩斯州，緬因州，馬薩諸塞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內布拉斯加州，內華達州，新澤西州，新墨西哥州，北卡羅來納州，奧勒岡州，南卡羅來納州，猶他州。
允許選民使用網路回傳選票(透過相關入口網站)	4 個州。 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密蘇里州和北達科他州。
選民可使用移動投票應用程式	截至 2018 年僅有西維吉尼亞州使用區塊鏈技術提供移動投票應用程式，並僅限於 UOCAVA 選民。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²⁰

²⁰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s Legislatures,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f Ballots” <http://www.n>

在選舉前至少 45 天，各州必須向選民提供有關選舉的詳細信息。另外，任何州的 UOCAVA 選民若未收到州政府所提供的選舉資訊或備用選票，也可以使用「聯邦自行填名不在籍選票」(Federal write-in absentee ballot, FWAB)，即「空白選票」投票。各州政府接受此空白選票上的所有符合規定的選舉項目。它可以使用「聯邦投票援助計劃」(Federal Voting Assistance Program, FVAP)的線上選票標記工具進行電子標記，然後列印簽名並回傳給當地的選舉官員²¹。

表 6 美國使用電子選票之各州回傳方式統計：

州名	郵件	傳真	網路門戶 (web portal)	使用者
阿拉斯加		<input type="radio"/>		UOCAVA voters
亞利桑那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UOCAVA voters
加利福尼亞		<input type="radio"/>		UOCAVA voters
科羅拉多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UOCAVA voters，且在郵件等更安全的方法不可行的狀況下
德拉瓦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UOCAVA voters
特區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UOCAVA voters
佛羅里達			<input type="radio"/>	UOCAVA voters
夏威夷	<input type="radio"/>			
愛達荷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只有受到由國務卿宣布"國家或地方緊急

csl.org/research/elections-and-campaigns/internet-voting.aspx (accessed July 10, 2019)

²¹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s Legislatures,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f Ballots" <http://www.ncsl.org/research/elections-and-campaigns/internet-voting.aspx>

				事故"影響的公民
印第安納	○	○		UOCAVA voters
愛荷華	○	○		只有面臨危險地區的 UOCAVA voters 及海 外軍事人員
堪薩斯	○	○		UOCAVA voters
路易西安納		○		UOCAVA voters 及殘 障選民
緬因	○	○		UOCAVA voters
麻薩諸塞	○	○		UOCAVA voters
密西西比	○	○		UOCAVA voters
密蘇里	○	○	○	服役於敵對地區的 UOCAVA voters
蒙大拿	○	○		UOCAVA voters
內布拉斯加	○	○		UOCAVA voters
內華達	○	○		UOCAVA voters
紐澤西	○	○		UOCAVA voters，仍需 郵寄選票紙本
新墨西哥	○	○		UOCAVA voters
北卡羅來納	○	○		UOCAVA voters
北達科塔		○	○	UOCAVA voters
奧克拉荷馬		○		UOCAVA voters
奧勒岡	○	○		UOCAVA voters
羅德島		○		UOCAVA voters

南卡羅來納	○	○		UOCAVA voters
德克薩斯		○		在有立即危險的敵對地區或由美國總統宣布為戰區的地區服的軍事人員(或其家屬)
猶他	○	○		UOCAVA voters 及殘障選民
華盛頓	○	○		UOCAVA voters
西維吉尼亞	○	○	○	UOCAVA voters，2018年，西維吉尼亞州為福澤資格的UOCAVA選民提供移動投票(mobile voting)選擇，這是此方式的首批選民。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²²

²²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s Legislatures,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f Ballots” <http://www.ncsl.org/research/elections-and-campaigns/internet-voting.aspx>

日本

日本於 2002 開始實施電子投票，以地方選舉作為試行，然而經過了十多年的實施，各地方陸續放棄，最終在去年畫下句點²³。日本在推動電子投票的政策及執行面，其實是有若干問題存在的，可能最終也導致了此政策的失敗。以下為日本電子投票實施的相關問題：

- 一、最初推行的動機是當時的執政者在歐美國家相繼推動的 e 化政策有著不落人後的心態，加上媒體炒作的政策需求，因此政府的整體規畫相當不足。
- 二、由於國家並沒有詳細的整體計劃，地方試行的狀況容易因為政治利益考量，進而影響存廢，例如自民黨與民主黨對電子投票的立場就是利於反對與贊成的兩方。
- 三、政府並未積極推廣，或許是成本因素，也可能是沒有顯著的政治利益。
- 四、實施的方式始終是獨立機組的作業，沒有連線的功能就無法凸顯電子投票的優勢。
- 五、日本自二戰後人民沒有一個統一的身分識別系統，在這樣的架構下推動電子投票，在身分認證上即是一大困難。²⁴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機器電子投票的進程上已經止步，但日本已於 2016 年開始使用統一的身分認證卡，名為「My Number Card」並且在 2018 年時，筑波市也以此身分認證卡試行區塊鏈的網路投票系統²⁵。

²³ The Mainichi, "Last municipality in Japan scraps electronic voting system" Japan's National Daily, 2018,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180404/p2a/00m/0na/023000c> (accessed by July 20, 2019)

²⁴ 俞振華，「實施電子投票成本效益分析架構之研究—以日本、韓國與菲律賓電子投票推動情形為例」，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研究，2012。

²⁵ Samburaj Das, "In a First, Japanese City Deploys Online Blockchain Voting System", CCN.com USA, 2018, <https://www.ccn.com/in-a-first-japanese-city-deploys-online-blockchain-voting-system/> (accessed by July 20, 2019)

Matthew Beedham, 2018, "Japan is experimenting with a blockchain-powered voting system" <http://thenextweb.com/hardfork/2018/09/03/japan-city-blockchain-voting/> (accesses by July 9, 2019)

愛沙尼亞

由於愛沙尼亞政府對於公民的公共服務電子化程度已達 99%，因此電子投票的方式也與其 E 化政務息息相關，也是最早實施網路投票的國家，結合於愛沙尼亞普及化的身分證制度，而其不在籍投票也是與網路投票配合進行的。

選擇網路投票的選民必須在選舉日前 10 到 4 天至選舉主頁上投票，投票時間為全天候可進行，需要注意的是選舉日當日無法進行網路投票的。愛沙尼亞的網路投票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用政府發的類身分證或自然人憑證的身分卡，插入電腦的讀卡機之後，進入投票網站，輸入密碼即可看到屬於使用人該選區的候選人，選擇候選人之後再輸入另一組代表電子簽章的密碼，即可完成投票，並且收到完成投票的確認通知。第二種方式為在電腦網站上輸入使用的手機號碼，收到簡訊後，使用者必須輸入一組密碼至手機，然後就可以在網路上進行投票。之後會再收到另一則簡訊，使用者輸入第二組密碼之後，便完成投票。選民在網路投票時間截止前，都可以更改自己的投票。

選民可以在其全國選舉委員會的網站上獲知選舉訊息並且申請網路投票，而網路投票必須使用配有密碼的身分證或者手機 ID，並只能在電腦上進行，選民申請網路投票作業的同時，也會進行身分的查驗。

以下為流程簡介：

- 一、使用身分證或手機 ID 於配有防毒軟體的電腦進行。
- 二、至全國選舉委員會的網站下載選民應用程式
- 三、認證身分(身分證或手機 ID)
- 四、選擇候選人，並使用數位簽章確認
- 五、選舉結果會立即加密送到中央伺服器
- 六、選民可透過智慧行動裝置確認他們的投票
- 七、選舉只能由分散於全國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各自所配有的安全金鑰聚集在一起時打開
- 八、選票計算會在選民個人資料與投票分離的狀況下進行，以確保投票的不記名原則，而選民也不可以分享他自己的相關數位認證資訊²⁶。

²⁶ Internet voting in Estonia. <https://www.valimised.ee/en/internet-voting/internet-voting-estoni>

韓國

目前韓國的電子投票系統為國家選舉委員會與三星集團共同研發，選民持身分證或駕照前去投票所，全國連線的電腦確認選民身分後，選民進行投票，投票紀錄儲存在電腦以及印出紙本，然後投票結果會儲存在隨身碟，連同紙本投票之選票送到區域的計票中心。如果發生選舉爭議，他們可以用紙本紀錄加以確認²⁷。而在不在籍投票的部分，韓國針對因為工作或者其他因素，無法在選舉日當日或者在戶籍地投票的選民，提供「事前投票」的選舉機制，如下表²⁸(Li Zheng Ying 2019):

表 7 韓國事前投票選舉機制

事前投票	
在籍投票 (無法在選舉當日投票)	不在籍投票 (在任何一個非戶籍地的投票所投票)
1. 攜帶身分證在規定時間內(正式投票日前)，至全國的任一投票所進行投票。	
2. 事前投票的規定投票時間結束後，依據戶籍地與投票地的差異，對選票進行封存。	
3. 於正式投票日一起結算選票結果。	

a(accessed by July 8, 2019)

²⁷俞振華，「實施電子投票成本效益分析架構之研究—以日本、韓國與菲律賓電子投票推動情形為例」，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研究，2012。

²⁸李正英(Li Zheng Ying)，「韓國歷史與現行政治制度、選舉，以及政治文化介紹」，creatrip: <https://www.creatrip.com/blog/4047>，檢索日期:2019年7月10日。

肆、軍人不在籍投票結合電子投票可行性之分析

不在籍投票對於我國是早有發想的作法，若能付諸實行對於民主發展中人民參政權的體現具有其憲政上突破與進步的意涵。然而不在籍投票的實施確有其可能產生的問題與弊病，高永光(2004)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就不在籍投票方式與選民投票的自由意志表現之關係而言，以提前投票與移轉投票最能充分展現選民的投票自由意志；而代理投票係委託他人進行投票的行為，則是最無法保障選民本人投票的自由意志呈現。就實施對象而言，在國外的工作者、求學者或軍人則較無法實施移轉投票，也較難實施特設投票所投票。就選務的行政量而言，以代理投票造成選務機關的負擔為最少；通訊投票對選務的行政量負擔為最大。就可能造成的選舉舞弊而言，以提前投票、特設投票所投票以及移轉投票的舞弊可能性較低；而通訊投票及代理投票的舞弊機會較大。從各國的做法與經驗，可以歸納出實施不在籍投票的優點有：

- 一、增加選舉的便利性及完整性
- 二、可減少辦理選舉的行政成本及社會成本
- 三、可提升政治參與及投票率
- 四、公民權的保障

缺點有：

- 一、可能影響秘密選舉的原則。
- 二、增加選舉舞弊及訴訟的機率
- 三、增加選務的行政工作量

雖然電子投票已在許多國家行之有年，在我國卻是一個嶄新的作法。每個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是與其體制、文化甚至國土大小息息相關，因此不在籍投票與電子投票結合的優點，我們僅能就理論面推敲，盡量考量諸多限制，使其結合與實施更為周延。

不在籍投票結合電子投票的優點：

- 一、提供不能在選舉日或者戶籍地投票的選民更高的投票機動性，也能夠減少民眾往返戶籍地必須花費的時間與金錢。
- 二、提供行動不便的選民投票的方便性。
- 三、提高投票率及降低廢票率。

四、降低實施不在籍投票所需耗費之選務成本，可有效簡化身分核對的程序以及不同選區投票的複雜度，並可直接產生電子選票，取代傳統的紙張選票，減少相關行政業務與成本。

五、在開票程序中，可大幅減少計票的時間與人力，不會有無效票或是爭議票的認定問題，亦有驗票機制可避免爭議產生。

若能更進一步結合遠距離電子投票(網路投票)

六、無論選舉次數或規模的增加，選舉的成本並不會因此增加。

七、選民的投票完全不受限於地理區域(海外投票)。

八、政府可以更容易地在網路上公佈各種選務以及候選人的資訊²⁹。

台灣現行投票制度的變革，無論是在討論不在籍投票作法或甚至實施電子投票，都有必須要克服的影響因素，而選民對於政府與制度的信心是最難克服的問題。不在籍投票在我國已是研討多年的議題，直至 2018 年的「九合一」大選前的立法院修法仍有討論。

²⁹ Robert and Melanie Volkamer.” Observing Threats to Voter’ s Anonymity: Election Observation o f Electronic Voting”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Electronic Voting and Participation* Nr.01.

表 8 我國立法院對於不在籍投票提案研討之歷程

2002 年	立法委員黃德福等人提出「台北市繼高雄市市長選舉不在籍投票暫行條例草案」
2003 年	立法委員黃德福等人提出「總統副總統不在籍投票暫行條例草案」 立法委員林政義等人提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立法委員委員盧秀燕等人「不在籍投票法草案」
2005 年	親民黨黨團「總統副總統不在籍投票法草案」 立法委員丁守中等人擬具不在籍投票法草案
2007 年	國民黨黨團擬具「不在籍投票法草案」逕付二讀，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2008 年	立法委員丁守中等人擬具「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2013 年 -2014 年	立法委員丁守中等人擬具「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2016 年	立法院舉辦修憲委員會公聽會，相關議題：四、從開放及保障人民參政權談修憲降低選舉權年齡至十八歲、確立不在籍投票制度之必要。 立法院第 8 屆修憲委員會將不在籍投票列入修憲提案討論無共識，予以保留，送院會朝野黨團協商，當年度會期仍有多次提案。
2017 年	立法委員林為洲等人擬具「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2019 年	立法委員許毓仁等人擬具「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³⁰

³⁰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2002-2019，〈不在籍投票法案提案〉，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網站：<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檢索日期：2019年7月15日。

這些多次在立法院出現的提案與討論，最終不是消失於無解的黨團協商，就是止步於持反對立場的立法委員所提出的復議案。早在 2010 年內政部即對不在籍投票實施過民意調查³¹，結果顯示有七成八的民眾贊成政府規劃推動「不在籍投票」，然而多年來，立法機關在此議題上的延宕不前反映出不在籍投票在我國選舉制度的改革中的問題是政治上的算計大過於實際國家應執行政策與民眾需求的考量。開放不在籍投票是否對其政黨有所助益，選舉能否得利，成為立法機關檢視審查選舉制度的改革的主要依據，然而公民選舉權的保障不才是一個選舉制度應該朝向前進的方向嗎？觀察了立法院歷年來政黨間對於不在籍投票立場的表達，對於不在籍投票的立法主要歧見是海外公民的選舉權爭議，然而以去年九合一大選為例，工作、學習地或者居住地與戶籍地不同的選民對於不在籍投票的需求遠大於立法院中難以化解的政黨心結-海外公民投票。若能換個角度，以國內選民需求為考量跨越政黨惡鬥形成共識，有限度地以選舉類別、區域或選民族群來研擬入法，相信也能達到順應民意的政治目的。

除了政黨間信任度不足，民眾對於不在籍投票會產生的選舉公正性問題最大的疑慮可能是來自於實施不在籍投票會增加選舉舞弊的操作機率，關於實施「不在籍投票」會不會增加選舉舞弊情形，內政部的民意調查顯示，約有八成五民眾認為不會增加選舉舞弊情形，另有三成七民眾認為會增加選舉舞弊情形，以此延伸，為保障選舉之秘密性不受外力干擾，選民對於海外投票普遍持保守態度，有八成二的民眾表示贊成不在籍投票地點暫不在海外實施。另外民眾對選務機關的中立性，選舉訴訟裁決的司法機關的獨立公正的信任度也是考驗。然而基本上，台灣選民對於不在籍投票的實施仍是表現樂觀的態度。對於經常以民主開放自詡的台灣，至今尚未實施不在籍投票實屬憾事，然而整體而言，無論是政府相關部門、立法機構以及學者專家的研究調查，不在籍投票的討論已趨成熟，大致上的共識為：1. 不在籍投票為世界各國民主趨勢，台灣應從善如流。2. 在民主參與度的考量上，不在籍投票的實施對於公民投票權的保障及投票率的提高，從各國經驗的評估上都是呈現正面影響。因此在對於不在籍投票的入法討論上，若能聚焦於國內選民之公民權保障與投票需求性，相信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從政治層面來看，電子投票的目標即是要於有效提升公民的政治參與度，增加投票率，對於民主進程的推動也是一項品質的提升。電子投票對於已經習慣傳統人工執行投票流程的台灣人來說，仍然存在一些需要了解與跨越的問題。在 2018 年九合一大選前，雖然多數民眾認為電子投票機可以增加投票便利性並改善計票方面的問題，但對於該投票方式的安全性及

³¹內政部，2010，〈「我國推動不在籍投票」民意調查〉，內政部民政司網站：https://www.moi.gov.tw/dca/01news_001.aspx?sn=4763，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

選舉結果的信任度仍有所疑慮。民眾對於現行投、開票方式的滿意度較高，雖然認為在現行方式下，技術性問題（指計票錯誤）及安全性疑慮（指人為舞弊）仍然存在，但多數民眾對於現行投、開票方式所得出的選舉結果的信任度較高。另外，雖然多數民眾贊同科技所帶來的便利性，數位落差的確是一些不常接觸數位產品的民眾較無法認同電子投票的原因。³²

然而去年的大選亂象後，除了檢討中選會在選務工作上的規劃未盡周延，投票期間的危機處理機制鬆散外，當時的行政院也提出研擬實施電子投票的可行性。從政治因素來分析，我國實施電子投票可能會涉及的影響有以下：

一、政治文化的信任度

以目前傳統的紙本投票及人工計票方式，台灣民眾仍會對於選務相關工作產生若干懷疑或者時不時會有候選人質疑開票結果。尤其是軍人族群若在營實施電子投票，是否會遭受壓力也是會被高度質疑的情況。然而對於國家整體進步及人民有益的政策是政府應全力去宣導與推動的，即使民眾在短時間內仍會對投票方式的改變有所疑慮，政府若能在觀念及政令的宣導教育及實際執行面的策畫修正投入積極的努力，相信民眾對於電子投票的信任度會有所改善。另外，台灣選舉在政治上的動員與競爭經常是充滿了激情與民粹，新的投票方式在政治利益的傾軋下的可接受度會是如何？政治人物在許多國家政策的推動上通常是成敗的關鍵，無法預估電子投票對選民投票傾向，或者開票結果的影響，不管是執政或在野的政黨或許都會有所疑慮，政治人物對於電子投票的關注或立場表述都會去影響其支持者的傾向，也會形成推動電子投票的助力或阻力。

二、政治參與的保障性

從各國推動電子投票的經驗觀察，選民的投票意願基本上與投票的便利性成正比，除了便利性最高的網路投票外，其他的電子投票方式也或多或少能夠在選民的投票便利性方面有所助益。然而對大多數的選民而言，電子投票並非趨使其投票與否的關鍵因素，真正能使電子投票在投票率上能大有斬獲的是結合不在籍投票的、實施。我國軍人每至選舉期間即使全面性調整了戰備執勤任務，還是有少部分軍人因為特殊任務而無法返鄉投票，更遑論軍人必須在配合部隊任務留守的有限時間下舟車往返的行使投票權。另外，目前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規定，選舉工作人員申請在工作地投票僅限於與戶籍地同一直轄市及縣（市），使得在選舉當日擔任相關勤務的人員形同被剝奪了投票的權利。再加上其他也適用不在籍投票的族群，如外地工作、求學者、行動不便者與受刑人等等，都需要以不在籍投票的方式來保障及提升這些族群的政治參與，而電子投票的方式即

³² 俞振華，「實施電子投票成本效益分析架構之研究—以日本、韓國與菲律賓電子投票推動情形為例」，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研究，2012。

為可行性與便利性均優的做法。

三、選民投票的秘密性

選舉中的不記名原則是保障選民的自由權，目前我國的原住民選區中有三千多個投開票所，原住民的選舉權人是在 3 人以下，以現行傳統紙本投票方式，無論是否實施不在籍投票都會產生秘密投票的問題，除非以集中開票之方式，否則難以保障選舉人的參政權利，然而此舉勢必將增加選務工作的複雜性與成本，但這卻是電子投票能輕易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實施電子投票的過程中，選民身分的認證卻也是公民權保障的一環，並且在選舉的流程中，選票的可查驗性也是必要的因此兼顧保密與驗證是電子投票的硬體或軟體設備的功能中必須要能達到的³³，在本文中關於電子投票的技術分析中已說明我國的科技層面對此要求是可達成的，而以上的問題對於軍人實施不在籍投票而言使用電子投票機相對會比網路投票安全性來的高。

四、政策與行政的支持度

我國於 2001 年即成立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簡稱 NICI 小組)，將電子化政府、網路化社會列為其工作要點³⁴，2017 年又將其改制為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簡稱 DIGI+小組)，目的即在建立數位國家的架構³⁵。以此觀之，台灣對於建構電子數位化社會的規劃早有預見，然而在發展數位民主的腳步卻十分緩慢，尤其在與民眾最為息息相關的投票方式上仍停留於最原始傳統的的狀態。或許由於選舉相關制度的變革總是牽動著太多政治上的算計與考量，引發的爭議讓執政者寧願選擇忽視也不願從更宏觀便民的角度來改革，即使是發生像去年九合一大選的慘痛經驗，中選會仍然也只以「增加投開票所，尋覓較大的投開票所空間，進行選務分流」保守不願治本的方式回應³⁶。從近年諸多重大國家政策(如：募兵制、勞基法修正、年金改革)的推動來看，執政者的決心往往才是改革的關鍵。以我國的科技實力評估，在民主數位化與選舉電子化的遲滯不前，相信目前欠缺的是執政者大刀闊斧改革的意願。

根據 2012 年內政部所實施的不在籍投票民調中發現經常在戶籍地以外縣市工作、求學或

³³ Robert and Manuel J. Kripp.” Generic Tools and Policies for an Electronic Democracy”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Electronic Voting and Participation* Nr. 02.

³⁴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行政院中華民國 90 年 4 月 9 日台 90 經字第 02147411 號函發布。

³⁵ 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https://www.digi.ey.gov.tw/cp.aspx?n=BC0C253FE9E3A3E5>，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0 日。

³⁶ 謝君臨，2019，〈防九合一大選亂象 中選會：將適度增加投開票所〉，自由時報電子報，4 月 1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45407>，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0 日。

居住的民眾有超過 66%比例會願意在政府辦理不在籍投票時提出申請，而對於實施不在籍投票的整體贊成率更高達近八成。在適用對象的部分，有 65%的民眾贊成應從選舉工作人員擴大至其他族群，認為應優先納入不在籍投票適用對象的族群依序為「在外縣市工作的人」(77%)、「在外縣市求學的人」(68%)、「執行勤務的警察」(66%)、「在營服役軍人」(64%)、「選務工作人員」(57%)、「隨同在外縣市工作或求學者的家屬」(55%)、「在外縣市就醫安養的人」(51%) (內政部，2012)。在思考優先納入上述族群實施不在籍投票勢必要考慮的問題是選務工作的量與複雜度均增加，而軍人的工作地點相對其他族群固定集中，且幾乎無須另外租借場地辦理，在辦理不在籍投票結合電子投票的實施，更能省去在選民的身分驗證、投計票方式等選務工作的執行能較傳統方式便捷，並更能保障我國憲政公民權的落實。

從成本效益層面來看，除了電子投票機台硬體的添購，還需考慮開發投開票系統軟體及相關建置，以及設備維護費用，以利設備確保維持其完整性與安全性。另外，將電子投票機配送並安全設置於投票所之費用也須納入考慮。從此問題來考量電子投票先以不在籍投票族群來實施，而在推動上最符合行政效率及成本效益的族群即為軍人，除了不會一次性增加龐大硬體購置及維護成本外，也能在縮小範圍及吸收軟體系統與實際執行需求的落差與問題，對症下藥，有效率的修正能為電子投票在我國實施提供更可期的未來。另外，一般在籍民眾投票不需主動申請，不在籍民眾則需花費時間申請在非戶籍地投票，申請程序的便利性將影響民眾之投票成本，軍人在申請作業上可由軍方通依調查管理，減少選務行政工作的負擔。另外，對於各戶籍所在地與不在籍投票地彼此之投票民眾資料認證與彙整，無疑會是個龐大的行政作業，在選舉前相關行政單位會增加不少工作量，進而造成額外負擔。目前台灣的選舉人名冊由戶政機關透過戶役政資訊系統編造，已是由電子方式產出，可結合軍方的電子人事作業，應用電子資訊系統辨識驗證選舉人身分及領票，可化解傳統選舉人名冊核對及軍人不在籍投票身分認證問題。

現今科技進步，資安問題日趨嚴重，民眾對於電子投票方式是否有足夠之信心，將是對於實施電子投票具有重大之影響。通常問題可能為：電子化的造假、投票時無法匿名化、機台當機而無法投開票等。民眾如果對於選務工作的信賴感薄弱的話，對於選舉結果將容易產生質疑，甚至變成敵對政黨攻訐的理由，一旦事態擴大為政治衝突，所消耗的社會成本將難以估計。也因此使電子投票先從需求性、協調性、配合性最高的軍人不在籍投票開始實施，作為信心度指標的初步評估，先避免掉民眾的普遍疑慮，並從小眾實施中降低失誤風險增加修正空間，以此建立民眾對於電子投票的信心。此外不在籍投票以電子投票方式進行，是新的政策，政府除了擬定行銷策略，增加宣傳管道，推動軍人實施不在籍電子投票試行相信能提高民眾對於電子投票的信任度與接受度。國家政策的制定與推動，政府的積極度是很大的關鍵，例如不在籍投票已存在長時間的諸多討論，表示應是有實施需求層面的問題，應納入

重要政策評估執行，卻每每僅在選舉過後成為相關單位的一句淡淡地檢討改進就再度石沉大海，除了立法機關的提案外，政府部門應有責任推動對於國家人民有幫助的相關政策，而非被動式的消極檢討。以去年九合一大選亂象為例，中選會僅以增加投開票所來因應，此法只徒增選務工作的繁重，卻無法具體的從長遠改善整體選舉流程問題。擴大不在籍投票的選族群勢必為目前的純人工的選務工作帶來更複雜沉重的選務負擔，中央選舉委員會自 2005 年每 4 年擬定一次的中程施政計畫中均將選務工作電腦化列為優先發展議題，卻仍必須在每次選舉時將大量人力投入在選票的印製、清點計算、投票時民眾身分的核對及選票分發、人工開票的誤差核對、傳統紙本選票的封箱繳回等等作業，因此立法機關於修法時應可考慮進一步採用先進設備，例如：電子投票或網路投票之方式，短期或需投入設備及訓練的成本雖高，但長遠而言，對於憲法所保障之公民權提升、選舉制度的改革與選務工作的進步相信會有很大的助益。

表 10 傳統紙本投票與電子投票實施之比較表

	優點	缺點	建議
傳統紙本投票（現行方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是目前所熟悉的方式，執行過程不用另外宣導。 2. 投票及選舉結果產生方式較獲人民信任。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人工計票的曠日廢時耗費於選舉的時間成本過大。 2. 選民於選票上印上記號，若蓋錯位置或有汙損，即無法塗改，形成廢票。有效票及廢票的認證疑慮。 3. 選票佔空間，無法永久保存。 	盡量獲得選民之認同進而採用較先進的投票方式。
不在籍+紙本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投票方式改變不大。（移轉投票） 2. 短期選務金錢成本較電子投票低。（通訊投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有洩漏選民意向疑慮，影響秘密投票原則。（移轉投票） 2. 選務工作複雜度提高。（通訊投票） 3. 選民須申請。 4. 增加選民資料認證與彙整的行政成本。 	盡量獲得選民之認同進而採用較先進的投票方式。
特定族群不在籍+電子投票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增加政治參與，提高投票率。 2. 避免選務人員因不同選區結合不在籍投票，造成選票發放失誤的問題。 3. 提高選務工作效率及減少選務人員之投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需投入選民推廣、選務人員教育以及立（修）法成本。 2. 安全性及可信度易受質疑。 3. 需克服數位落差問題。 4. 軟、硬體建置及後續 	訂定不在籍投票專法規範

	<p>入成本。</p> <p>4. 針對特定族群推廣效率較高，例如軍人。</p> <p>5. 實施範圍較小，成本較低，且較能有效控管徒法狀況。</p> <p>6. 無爭議票或廢票。</p> <p>7. 不需印製選票且選票儲存容易。</p> <p>8. 可為全面實施電子投票之前哨。</p>	<p>設備維護保管成本較紙本投票方式高。</p> <p>5. 實施人數少，電子投票之選舉效益未能有效展現。</p>	
全國+電子投票	<p>1. 增加政治參與，提高投票率。</p> <p>2. 避免選民身分認證與選票發放之失誤。</p> <p>3. 提高選務工作效率及減少選務人員之投入成本。</p> <p>4. 能較大展現電子投票之選舉效益。</p> <p>5. 無爭議票或廢票。</p> <p>6. 不需印製選票且選票儲存容易。</p>	<p>1. 需投入選民推廣、選務人員教育以及立(修)法成本。</p> <p>2. 需投入大量軟、硬建置成本，以及後續設備維護、保管成本。</p> <p>3. 安全性及可信度易受質疑。</p> <p>4. 需克服數位落差問題。</p>	以現行法規配合修法執行
紙本+電子投票(並行)	選舉人可以挑選認同之投票方式	<p>1. 增加投開計票作業的前置工作</p> <p>2. 計票速度需視採用電子投票人數多寡，才</p>	修改既有法規，並明訂兩者並行的落日條款，藉以確保政府資源不

		能得知是否有縮短計票時間	重複投資
		3. 人力資源浪費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伍、軍人不在籍投票結合電子投票的意向調查

表 10 為基本屬性分析，本研究研究對象均為軍人，總人數為 250 人，有效問卷人數為 204 人，以男性居多，佔 74.5%，女性佔 25.5%；年齡以 21-25 歲居多，佔 53.9%，26-30 歲次之，佔 17.2%；教育程度以大學學歷居多，佔 73.0%；投票經驗以已投過票者居多，佔 84.3%；對於是否聽過電子投票，則以偶爾聽到居多，佔 33.8%，經常聽到次之，佔 20.1%。有鑑於軍人工作場域之性別比例差異，本問卷之施作以男性職業軍人比例較高。

表 10 基本屬性

(N=204)					
變項	n	(%)	變項	n	(%)
性別					
男	152	74.5	教育程度		
女	52	25.5	高中職以下	15	7.4
年齡					
			專科	13	6.4
21-25 歲	110	53.9	大學	149	73.0
26-30 歲	35	17.2	研究所	27	13.2
31-35 歲	11	5.4	您是否聽過電子投票		
36-40 歲	18	8.8	經常聽到	41	20.1
41-45 歲	16	7.8	偶爾聽到	69	33.8
46-50 歲	2	1.0	沒意見/不知道	18	8.8
51-55 歲	6	2.9			

56歲以上	6	2.9	不太常聽到	39	19.1
投票經驗			沒有聽過	37	18.1
未曾投過票	32	15.7			
已投過票	172	84.3			

從表 11 來看，受測人員對「電子投票之認知」得分為 12.45±2.94 分(滿分 20 分)，受測人員對「電子投票之意向」得分為 13.59±4.76 分(滿分 30 分)，受測人員對「不在籍投票實施」之得分為 10.63±3.14 分(滿分 25 分)，受測人員對「以電子投票實施不在籍投票」之意向得分為 10.30±3.31 分(滿分 25 分)。可知受測人員在電子投票已有一定程度的認知，且願意進一步嘗試以電子投票來進行投票；而不在籍投票之實施部分，由於本問卷受測人員為職業軍人，而國軍推動已多年推動三安政策，職業軍人於戶籍地及駐紮地奔波情形漸少，可能導致不在籍投票實施的需求降低，影響施測結果。

表 11

受測者對電子投票之認知、意向、不在籍投票實施及電子投票方式與不在籍投票實施之意向分佈 (N=204)

變項	Mean ± SD
電子投票之認知	12.45±2.94
電子投票之意向	13.59±4.76
不在籍投票實施	10.63±3.14
以電子投票實施不在籍投票之意向	10.30±3.31

以表 12 來看，受測人員對電子投票之意向與不在籍投票實施呈正相關($r=0.38, p<.01$)，即電子投票之意向愈高，其不在籍投票實施愈認同；受測人員對電子投票之意向與電子投票方式與不在籍投票之意向呈正相關($r=0.58, p<.01$)，即電子投票之意向愈高，其電子投票方式與不在籍投票之意向愈高；受測人員對電子投票之意向與電子投票之認知呈正相關($r=0.27, p<.01$)，即電子投票之意向愈高，其電子投票之認知愈了解；受測人員對不在籍投票實施與電子投票方式與不在籍投票之意向呈正相關($r=0.58, p<.01$)，即不在籍投票實施愈認同，其電子投票方式與不在籍投票之意向愈高；受測人員對不在籍投票實施與電子投票之認知呈正相關($r=0.18, p<.01$)，即不在籍投票實施愈認同，其電子投票之認知愈了解；受測人員對電子投票方式與不在籍投票之意向與電子投票方式無相關性。

可知受測人員無論對不在籍投票及電子投票的了解與認知越多，在其雙方面的回應都是正面的，而其中可發現贊成實施不在籍投票的人員中也有贊成實施電子投票的傾向，並且願意支持以電子投票實施不在籍投票，但反過來看，電子投票的了解與否卻無法反映出這些民眾對於以電子投票實施不在籍投票的意向，可能的原因或許是民眾對於電子設備使用於選舉的信任度的影響。不過，整體分析而言，支持實施不在籍投票的民眾會較了解電子投票也傾向於支持電子投票，因此，在我國投票方式的相關政策的改革與推動上，先從不在籍投票的實施去結合電子投票相信會是的較好的著力點。

表 12

受測者對電子投票方式與不在籍投票實施之意向行為之相關分析
($N=204$)

項目	電子投票之意向	不在籍投票實施	電子投票與不在籍投票之意向	電子投票之認知
電子投票之意向	1			
不在籍投票實施	.375**	1		
電子投票與不在籍投票之意向	.577**	.581**	1	
電子投票之認知	.269**	.179*	.113	1

註：採 Pearson 相關，* $p<.05$ ** $p<.01$

陸、結論

我國不在籍投票的施行適用性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及行政考量上已經累積許多研究與討論，最後仍須回歸法律層面來規劃與執行。從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來看，規範選舉人於戶籍地投票之初衷應為選務方便所致，然為遷就行政機關之作業便利性而犧牲公民參政之權利，絕非所謂民主國家之優先考量。不在籍投票在適法性方面的探討從憲法層面觀之，依憲法 129 條保障人民的選舉權為人人平等，國家相關政策之方向亦應朝此努力，然我國由於政黨生態及政治利益考量，於不在籍投票是否擴及海外選民的議題上遲遲未能達成共識，若跳脫此一紛爭，以目前確有需求之選民為主要考量層面，至少能在此一層面為符合憲法精神而有所進步。而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明文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返國行使選舉權，以法律定之。此規定也正呼應了上述之爭議，即使朝野黨派形成共識，仍須完成修憲程序才能真正解套。然而在這議題以外的空間我們仍可以對於不在籍投票在現實的需求與考量上努力，例如以先國內有需求之族群做起。

今年因應了 2020 年的總統立委大選及公投法的修訂，不在籍投票在立法院及社會又是一番討論³⁷，多年來我國不在籍投票相關提案爭議以及中選會的評估考量往往脫離不了選舉的公平性以及不同類型選舉選票的分類、印製、運送、保存及選舉人過少之投票秘密性的問題，以中選會的評估來看，要考慮的有兩點：第一、有關公職選舉，係屬對「人」的投票，尚須考量選罷法專屬法律的完整性及社會的信任度。第二，不在籍投票的行使上會涉及整個選舉種類有關公民投票不在籍的部分，若單獨立法或可先予試行。然而不在籍投票的行使會涉及整個選舉種類及是否合併舉行選舉而有所不同。例如單獨舉行總統選舉時，採行不在籍投票在未來的選務配合上，應屬可行。但若與其他選舉，如立委選舉併行，考量到立委選舉票可能高達 76 種，實施不在籍投票會有一定之難度，社會意見亦仍分歧。(立法院會議記錄，2019)

以中選會的說法來討論，首先針對社會共識而言，內政部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於政府規劃不在籍投票的贊成度普遍高達 66%，而年輕族群(20-29 歲)與高學歷族群的支持度更是達到八成以上，中選會對於不在籍投票社會共識的疑慮令人有所不解。再者，以中選會的角色而言，對於不在籍投票實施與否應先以執行、技術、行政支援等客觀專業層面來評估可行性，以對社會信任度的臆測作為政策推動的考量點，而非實事求是的考慮國家公民權利之貫徹與發展，似乎失焦於其行政之中立專業性。最後，在選務的執行上，目前中選會對於不在籍投票的評估是以移轉投票方式來實施，並強調目前選務人員也以此方式實行不在籍投票，事實上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選務人員的工作地與戶籍地仍須在一選舉區

³⁷ 劉冠廷，「不在籍投票 中選會：公投可優先實施」，中央通訊社，2019 年 5 月 26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1905260068.aspx>，檢索日期：2019 年 9 月 2 日。

才能實施投票，此移轉投票的做法根本無法稱之為不在籍投票，何況以此方式仍舊無法克服多種選舉合併之選務問題。以現行傳統的紙本投票選舉方式，不同類型的選舉合併的相關選務作業的確是不在籍投票難以跨越的門檻，因此在思考可否以電子投票方式克服我國傳統紙本投票方式在實行不在籍投票時的窒礙之處時，軍人的群體性質對於我國實施不在籍電子投票的試行能夠成為很好的施力點。

以我國民主憲政之推動來看，公民權利的保障與伸張對於選民及民意機關代表均會是互利的結果，況且世異時移，考量社會的變遷性與複雜度，不在籍投票之入法無論在憲政公民權利的提升與便民利民的政策改革相信都會是一大進步。因此對於不在籍投票的實施立法院無論朝野已有先以修憲門檻維持海外公民仍需回國投票的初步共識，民意上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支持，在結合電子投票的部分，認同實施不在票投票的民眾會傾向於接納電子投票的方式，因此需要藉由軍人實施不在籍投票的助力，讓民眾更加認知電子投票在選舉上展現的可執行度，時代與科技的趨勢使我們無法忽視的，相較於其他民主國家我國的選舉制度已長久停滯無變革，結合我國之科技長才，希望在此推廣下，增加人民對於選舉制度的信任度，也有助於我國政治文化的轉型與成熟。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中央選舉委員會，2017，〈中程施政計畫(106至109年度)〉，中央選舉委員會編印。

(Jung yang shiuan jiu wei yuan huei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7. “Jung cheng shr jeng ji hua(106 jr 109 nian du)” [Medium Range Policy Plan (106-109)]. Jung yang shiuan jiu wei yuan huei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內政部，2010，〈「我國推動不在籍投票」民意調查〉，內政部民政司網

站:https://www.moi.gov.tw/dca/01news_001.aspx?sn=4763，檢索日期:2019年7月15日。

(Nei jeng bu[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0. “Wo guo tuei dung bu tzai ji tou piau min yi diau cha” [Promoting Absentee Voting polls in Taiwan]. Dept. Civil Affair, https://www.moi.gov.tw/dca/01news_001.aspx?sn=4763. [accessed July 15, 2019].)

行政院主計處，2012，〈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行政院主計處編印。

(Shing jeng yuan ju ji chu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2012. “99 nian ren kou ji ju jai pu cha tzung bau gau tung ji jie guo ti yau fen shi”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general report of the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in 2010]. Shing jeng yuan ju ji chu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2002-2019，〈不在籍投票法案提案〉，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網站:<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檢索日期:2019年7月15日。

(Li fa yuan yi shr ji fa yan shi tung [Legislative Yuan proceedings and speech system]. 2002-2019. “Bu tzai ji tou piau fa an ti an” [Absentee ballot bill proposal]. <https://lis.ly.gov.tw/lylgmeetc/lgmeetkm>. [accessed July 15, 2019].)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Li fa yuan di 9 jie di 7 hui chi nei jeng wei yuan huei di 21 tsz chiuan ti wei yuan huei yi ji lu[Record of the 21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Political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during the 9th and 7th Sessions].)

王明禮、林靜嫻、李怡秋、黃百力，2006《投開票電子化作業之規劃》，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Wang, Ming-Li, Lin, Jing-Xian, Lli, Yi-Qiu and Huang, Bai-Li. 2006. “Tou kai piau dian tz hua tzuo ya jr guei hua” [Planning of the electronic operation of voting]. Taipei: Shing jeng yuan yan kau huei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劉芳梅，2002，〈英國的地方選舉將試行 SMS 電子投票〉，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http://www.find.org.tw/0105/news/0105_news_disp.asp?news_id=1988，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8 日。

(Liu, Fang-Mei. 2002. “Ying guo de di fang shiuan jiu jiang shr shing SMS dian tz tou piau” [UK local elections to trial SMS e-voting].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http://www.find.org.tw/0105/news/0105_news_disp.asp?news_id=1988. [accessed July 8, 2019].)

郭建邦，2011，〈適用於我國電子投票之機制設計與研究〉，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Guo, Jian-Bang. 2001. “Shr yung wu wo guo dian tz tou piau jr ji jr she ji yu yan jiou” [Design and research for Taiwan’s electronic voting mechanism].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王旭正、李榮三、許富皓，2015，《資訊安全與智慧、行動網路安全應用實務》，台北：博碩文化。

(Wang, Xu-Zheng, Li, Rong-San and Xu, Fu-Hao. 2015. “Tz shiun an chiuan yu jr huei shing dung wang lu an chiuan ying yung shr wu”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mobile network security application practice]. Taipei: bo shuo wen hua.)

李正英(Li Zheng Ying)，2019，〈韓國歷史與現行政治制度、選舉，以及政治文化介紹〉[creatrip: https://www.creatrip.com/blog/4047](https://www.creatrip.com/blog/4047)，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

(Li Zheng Ying. 2019. “Han guo li shr yu shian shing jeng jr jr du, shiuan jiu yi ji jeng jr wen hua jie shau” [Introduction to Korean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Culture]. <https://www.creatrip.com/blog/4047> [accessed July 10, 2019].)

俞振華，2012，〈實施電子投票成本效益分析架構之研究—以日本、韓國與菲律賓電子投票推動情形為例〉，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研究。

(Yu ,Chen-Hua.2012. “Shr shr dian tz tou piau cheng ben shiau yi fen shi jia gou jr yan jiou—yi r ben, han guo yu fei liu bin dian tz tou piau tuei dung ching shing wei li”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Framework of Electronic Voting: A Case Study of the Promotion of Electronic Voting]. Jung yang shiuan jiu wei yuan huei wei tuo yan jiou[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高永光等，2004，〈不在籍投票制度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案。

(Gao, Yong- Guang etc. .2004. “Bu tzai ji tou piau jr du jr yan jiou” [Research on the Absent Voting System]. Nei jeng bu wei tuo yan jiou an[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esearch project].)

黃朝盟、王俊元、許耿銘，2004，〈數位民主之實踐與挑戰-網路電子投票之析探〉，《研考雙月刊》，28(4):67-77。

(Huang, Chao- Meng, Wang, Jun-Yuan and Xu, Geng- Ming. 2004. “Shu wei min ju jr shr jian yu tiau jan- wang lu dian tz tou piau jr shi tan” [The Practice and Challenge of Digital Democracy: An Analysis of Electronic Voting]. Yan kau huei shuang yue kan. Bimonthly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28(4):67-77.

楊惟任，2014，〈我國實施不在籍投票制度之可行性研究〉，《醒吾學報》，49:85-108。

(Yang, Wei-Ren. 2014. “Wo guo shr shr bu tzai ji tou piau jr du jr ke shing shing yan jiou” [Study of Implementing Abatement Voting System in Taiwan]. Shing Wu journal49:85-108.

蔣麗君，2011，〈應用電子選票於多選舉區不在籍投票之可行性研究〉，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研究案。

(Jiang , Li- Jun. 2011. “Ying yung dian tz shiuan piau yu duo shiuan jiu chiu bu tzai ji tou piau jr ke shing shing yan jiou” [Feasibility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Ballot Papers in Multi-election District Absence Voting]. Jung yang shiuan jiu wei yuan huei wei tuo yan jiou[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楊吳泉，1996，《現代密碼學入門與程式設計》，台北:全華圖書。

(Yang, Wu-Quan.1996. “Shian dai mi ma shiue ru men yu cheng shr she ji” [Introduction to Modern Cryptography and Programming]. Taipei: Chuan Hwa Book Co.)

吳正義，2009，〈選民可即時檢驗之電子投票系統設計〉，義守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Wu Cheng- Yi. 2009. “Shiuan min ke ji shr jian yan jr dian tz tou piau shi tung she ji” [Design of real-time voter verifiable scheme in e-Voting System]. Master's thesis. I-Shou University.)

賴溪松，2009，〈電子投票機制與系統之安全性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Lai, Xi-Song. 2009. “Dian tz tou piau ji jr yu shi tung jr an chuan shing fen shi” [Security Analysis of Electronic Voting Mechanism and System].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search Report.)

貳、外文部分

ACE. The Electoral Knowledge network. 2019.

<http://aceproject.org/ace-en/focus/e-voting/onePage>(accessed by August 2, 2019)

Ansari, Pitipatana, Ehsan, Chao Zhang, Aridaman K. and Yun Q. Shi. 2008. “Evaluating Electronic Voting Systems Equipped with Voter-Verified Paper Records.” *Security & Privacy, IEEE* 6(3):30 - 39.

E-Voting.CC.2015.” World map of electronic voting 2015.”

<https://www.e-voting.cc/en/it-elections/world-map/>. (accessed by July 11, 2019)

Goldsmith, Ben and Ruthrauff, Holly. 2013.” Overview of Electronic Voting and Counting Technologies” https://www.ndi.org/sites/default/files/1_Intro.pdf (accessed July 12, 2019)

Internet voting in Estonia.2019.

<https://www.valimised.ee/en/internet-voting/internet-voting-estonia>(accessed by July 8, 2019)

Isbelia, Marti´ n.2011. “2004 Venezuelan Presidential Recall Referendum (2004 PRR): A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lectronic Voting Data Transmissions.” *Statistical Science* 26(4):528-42.

ITU-T X.800, “Security Architecture for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for CCITT

Applications” <https://standards.global-spec.com/std/749456/ITU-T%20X.800>
(accessed July 8, 2019)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s Legislatures, 2019,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f Ballots”
<http://www.ncsl.org/research/elections-and-campaigns/internet-voting.aspx>
(accessed July 10, 2019)

Prandini and Marco Ramilli. 2012. “A Model for E-voting Systems Evalua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Definition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e-Service Journal* 8(3):42-72.

Robert and Melanie Volkamer. 2006.” Observing Threats to Voter’ s Anonymity: Election Observation of Electronic Voting”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Electronic Voting and Participation* Nr. 01.

Robert and Manuel J. Kripp. 2009.” Generic Tools and Policies for an Electronic Democracy”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Electronic Voting and Participation* Nr. 02.
Shamir A. 1979. “How to share a secre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2(11), pp. 612-613.

本次研討會由



舉辦



政治學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